



著《我的经济改革观》一书中珍藏在家。

蒋一苇老师虽然已逝世3年了，但他那语重心长的教诲无不时每刻在我耳边萦绕，他那不朽的巨著无不时每刻指引着我去探索、去求真。蒋一苇先生是位伟大的战士，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过贡献，解放后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未消沉：“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始终不渝地为党为人民尽力多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始终战斗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最前沿！他是一位尊敬的导师，不仅教给了我很多理论知识而且赐赋了我人生的真谛！他是一位真挚的朋友，永远和我们一起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河中奋勇搏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蒋一苇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继承和发扬蒋一苇老师的开拓创新精神

陈佳贵

1993年1月24日中午，陈曦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一苇老师的病情恶化，十分危险，让我赶快到医院去。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医生刚刚抢救完毕，但一苇老师呼吸仍很困难，身体比前几天更虚弱了。下午4时，他的情况才稍有好转。当我们准备离开医院时，我特意坐到病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好好养病，说过两天再来看他。他虽然已不能讲话，但仍然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是听清了我说的话。回家后，我仍然放心不下，晚上9时许，又打电话去医院了解情况，得到的信息是他刚刚睡着了，我还真以为他又闯过了一关。可谁知他再也没醒来。1月25日5时零7分，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步，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独树一帜、享有极高声望的理论家，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然而，他留下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 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

一苇老师在1959年被错划为“漏网右派”，后于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并兼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他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忘我的革命精神，冷静的



理性思考，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

1979年初，改革刚刚开始。人们为城市改革从哪里开始，如何进行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深思熟虑，一苇老师提出整个经济改革的立足点应该是企业。他指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企业。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取代家庭成了社会经济的最基本单位，成了社会经济的细胞。在现代社会，企业既是生产力的直接体现者，又是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者，改革应当以搞活企业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于是他写了《企业本位论》初稿，作为内部材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1979年6月，他的《企业本位论》以《企业本位论刍议》为题在《经济管理》月刊上发表；8月，《人民日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为题，发表了它的摘要；经过补充修改，《企业本位论》正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的创刊号上。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企业界许多人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些人表示异议。有的人认为，《企业本位论》片面强调了搞活微观经济而忽视了宏观控制；有的人不同意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企业也不是商品生产者；也有的人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不能自负盈亏；还有的人认为“本位”的提法会助长企业搞本位主义。后来有的人甚至要把《企业本位论》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批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企业本位论》的思想，充分肯定它对推动改革所做出的贡献。蒋一苇老师在1979年发表的《企业本位论》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武器。实际上我国现在的改革就是围绕企业进行的。蒋老师是第一个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的人。继《企业本位论》后，10多年来，他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企业管理、企业改革、企业的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企业的领导制度、企业的联合和企业集团、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扬社会主义经济民



主、宏观管理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论著。特别是他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和《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等论著，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取得重大突破，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不少主张，如“两制四全”、“一、四、五”企业改革思路等，在企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广泛的赞同。

一苇老师还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不少的重大价值的建议。1982年初，他带领我们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到首都钢铁公司去搞调查。“首钢”是北京市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之一，改革后成效显著。当时它的试点期快结束了，社会上有些人对扩权试点有看法，有些人甚至把中央提出的“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的政策错误地理解为把大企业管住，把小企业放开，“首钢”领导对能否继续承包很担心。一苇老师早就主张，国家要把搞活大企业作为企业改革的重点，“首钢”的情况使他更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经过和“首钢”领导的多次讨论，拟定了一个在“首钢”实行递增包干的改革建议，以他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同志的名义上报国务院，不久这个建议被国务院采纳并付诸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同年秋天，他又带领我们这个调研组去重庆市，了解那里的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解放初期，重庆市一度是西南局所在地，经济管理权限比较大，经济也比较发达，曾经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后来逐步降到地级市的地位，经济权限大大缩小，条块分割十分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调研组通过和市里的领导、市级各有关部门以及企业的多次座谈，了解到许多这方面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扩大中心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与市里商量，决定仍然以他和林凌同志的名义给国务院建议，再一次要求国务院允许在重庆市进行中



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在关于在首钢实行递增包干的建议中已经提到在重庆市进行试点的要求）。这个建议上报国务院后，也很快获得批准，并付诸实施，效果很好。后来和重庆类似的大城市都采用了它的做法，扩大了经济管理的权限，变成了具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计划单列市。一苇老师还有不少建议被中央和有关省市所采纳，上面所提到的只是这些建议中的两个典型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在理论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坚持把理论用于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

### 锐意进取的开拓者

一苇老师不仅是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勇敢投身改革实践的社会活动家。他思想解放，开拓能力强，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并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迅速打开局面。

1978年，他参与创办了《经济管理》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传播管理知识、培训管理干部的经济管理类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深受经济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的欢迎。1979年，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在《经济管理》月刊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年，他创办了《工业经济管理丛刊》，开始专登内部研究报告、政策建议和经济管理参考资料，后来成为在内部发行的刊物，它对反映工业经济的研究状况，交流工业经济研究信息起了很好的作用。1981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经济年鉴》，这是第一本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年鉴类刊物。它以其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权威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最好参考书之一。1983年，为了对在职的管理干部进行培训，他发起创办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并在各地设立了60多所分校，学员达3万多人，不少学员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干部。经过3年学习，这些学员的管理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同志在本单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4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和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中心，前者后来发展成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他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组织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推动了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后者是我国部分大企业集资几百万元，以基金会的方式联合创办的一个以培训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为目标的研修中心，他任基金会会长兼管委会主任，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研修班，为企业培训了大批管理人才。同年，他还创办了《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后来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成为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更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他在其他同志的协助下，把经济管理杂志社发展成了经济管理出版社，并亲自兼社长和总编辑。这个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数量、质量和效益目前在同类出版社中已名列前茅，这与他当年为出版社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1985年，他还创办了《少年经济学家》，以启发青少年对经济和经济学的兴趣，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卸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他又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创办了《改革》杂志。1989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1991年他组建了中国企业文化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企业集团的组建等做了大量的设计咨询工作并亲自指导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试点，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8年到他逝世前的14年中，他几乎年年都参与创立一种新事业。而且这些事业绝大部分都获得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开拓进取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继承和发扬。

### 深受青年尊敬和爱戴的良师

一苇老师曾长期在学校任教，到研究所工作后，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会长，对我国企业管理学科、工业经济学



科和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公认的积极的贡献，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深受青年的尊敬和爱戴。他十分关心对青年的培养和教育，不仅自己尽量多带研究生，而且经常应大学之邀，向学生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形势和自己的学术观点，给他们讲授经济管理课程。他还帮助所里的年轻研究人员选课题，修改文章，向杂志和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为他们提供进修的机会，鼓励缺乏实际知识的年轻研究人员到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去兼职，以增加感性知识。凡是接受过他帮助的年青人，无不为他的热情、耐心和诚恳所感动，特别是我们这些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他的关心、培养和爱护更是十分感激。我们是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五届”大学生。到研究生院之前已在经济管理部门或企业工作了10年左右，有的已是科、处级干部。当时，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都想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多学些知识。一苇老师和其他所领导对我们很重视，十分爱护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千方百计地满足大家的要求，亲自给大家上课，开讲座；创造条件让大家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调查；帮助大家提高外语水平，把外语基础好的同学派到国外去进修；与大家反复讨论毕业论文的题目和提纲，使大家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我们这批人多数留在所里工作，但是家属仍留在外地，长期两地分居，困难很多，他又和其他所领导一起，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们的家属调进北京。

我自己更是得到了他的许多指教和帮助。我是他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1981年，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较早地提出了企业必须进行改革和进入市场，提高自己对市场的适应能力，适应市场的需要和变化。后来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一起，把这篇论文发展成一本书，改名为《企业经营与市场》，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他满腔热情地为这本书审稿、提出修改意见并写了序言。我到所里工作后，他让我当他的助手。



1982年，为了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业经济研究所决定成立工业管理室，他亲自兼任主任，并推荐我任副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不少重大课题的调查和研究。他和我共同主编了《工业组织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1985年，他被批准带博士研究生后，又动员我报考。我当时有些犹豫，认为读博士不合算，怕影响写文章、评职称。他劝我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要有长远打算，将来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要多学点知识，有个博士学位是必要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成了他的最早的两个博士研究生之一。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又和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闵建蜀教授联系，让我到那里进修和收集材料。我在香港期间，他还把他家的煤气罐借给我家用，帮我爱人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社会主义企业论》，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企业学》的书名出版时，他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1992年，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经济学院进修，知道他患了肺癌，打电话安慰他。他仍关心我的情况，嘱咐我注意身体，建议我不要老呆在学校里，要抽出时间多接触些实际，还要我去了解美国的一个钢铁企业实行职工参股的情况。直到春节前，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了，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还在挂念我回国后的工作问题，真使我十分感动。使我惭愧的是，我为他做的事却很少。我去美国前，他曾几次对我说，他想把他的学术观点系统化，写成一本专著，希望我能找两三个人帮助他完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做，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深感遗憾和内疚。受他生前的委托，我编辑了他的文集《我的经济改革观》，已于1993年6月出版。这本文集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纪念。



## 我永远崇敬与钦佩的蒋一苇老师

周绍朋

蒋一苇老师是对我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学术思想，如《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等被经济理论界同行以及企业界的广大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所熟悉。这里我不想去评述他的学术思想，只是想把他关心、教育我的一些事情和个人的感受写出来，以表达对他的缅怀之情。

一苇老师治学非常严谨，凡是他就认准了的理论，他就一直坚持到底，从不因为理论界风向的变化而随意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除非是在实践中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著名的《企业本位论》曾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他是在宣传本位主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一苇老师并未因为压力大而有任何动摇。他曾对我说：“这些同志根本没有看明白我的文章，没有弄清楚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很清楚，我是说，企业应该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给企业定性定位，然后再以企业为基准（即以企业为本位），来设计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这就像金本位、银本位一样，怎么是宣传企业本位主义呢？不能把本位与本位主义扯在一起！”事实证明，一苇老师是正确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论断，实际上就是吸收



了《企业本位论》的思想。

一苇老师不随理论界风向的变化而随意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者，又决不公开发表与党的决议相违背的言论。他曾教导我，有些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暂时没有公开发表的条件，就先不要公开发表，可以通过内部报告向中央反映，或者暂时不写这方面的文章，但决不能去违背自己的思想去瞎写一通。

一苇老师很少有与别人联合署名的文章，这并不是他不与别人合作，而是他从不在他没有直接参与写作的文章上署名。我先后跟着他学习 6 年，并且还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多年，我的不少文章都经他指导过，从定题目、定提纲，到亲自动手修改，但他从不愿署名。他和我共同署名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 1992 年 11 月 10 日《经济日报》上的《评我国现行企业劳动制度》一文。那时他已病得很重，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企业劳动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有一位领导同志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拿来给我，希望我提提意见，我提了几点意见，但提意见总不能像自己写文章那样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看来还得咱们自己动手写。”于是他给我定了文章的题目，以及应该写哪几部分，主要观点是什么，并征求我的意见。由于时间关系和他的身体状况，当时不可能谈得很详细。他在病床上每天上、下午都离不开吸氧和输液。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他时，他把一盘录音磁带给了我，说他把文章的主要内容都在录音带里讲了。他让我整理起草。我很快把文章写好后送到医院，他看后很高兴，并说，这篇文章很像他写的。我听了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想，这本来就是他的思想啊！作为他的学生，他在重病中，我帮他做点事还不应该吗？但他坚持让我和他共同在文章上署名。最令我不安的是，文章发表后不久，报社寄来了 220 元稿费，他托人将稿费全部捎来给我，还写了一张便条说：“稿子是你写的，稿费一定要全部收下。”我拿着便条和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一苇老师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80年代初，他就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他还是第一批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带出了不少学生。一苇老师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工作是极繁忙的。在我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时，有时，有问题也不忍心多去打扰他。后来，他看出了这一点，对我说：“我的事忙，永远没有个完，要想在我清闲时来找我是不可能的，让我找你们也很难，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不要管我忙不忙，尽管来找我。什么时候都行，吃饭时、睡觉前都行。”有时晚上我去他家里请教问题，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有时，我看时间太晚了，提出要走，他总是看看表说：“你家远，来一趟不容易，谈一会儿再走。”直到末班车才让我回去。

一苇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在研究和学习方法上的培养。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讲，研究问题一定要掌握大量资料，要采取古今中外法。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弄清楚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说的，包括过去是怎么说的，现在是怎么说的，中国是怎么说的，外国是怎么说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他还说，写文章要么让人痛，要么让人痒，最忌讳的是不痛不痒。所谓痛，就是要击中要害，击中时弊；所谓痒，就是要说出别人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

一苇老师在学术观点上决不要求学生和他一致。他说，最有本事的老师应该是他培养的学生能够把老师驳倒。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时，为一个问题，常常和他争论很久，在他认为我说得确实有道理时，他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研究问题，包括作报告、写文章，关键是自圆其想，自圆其说，自圆其写。想、说、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有时候想得好，但说起来又有矛盾；说得很好，写起来又有矛盾。要不断地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才能不断有所提高。

一苇老师的忘我工作精神，使认识他的人无不感动和敬佩。在



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其工作的繁忙程度自不必说，然而在他 65 岁卸去工经所所长职务以后，他身上的担子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了。他除了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外，还担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改革》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和学术部主任，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等大专院校的兼职教授，还被聘为第二汽车制造厂、深圳赛格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中国第二砂轮厂、北京市政府经济专业组等许多大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他的工作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几乎经常不停地在北京、深圳、重庆之间奔波。1991 年他还创建了中国企业文化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国外不少学术团体还常来邀请他去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对这许多工作，总是满腔热情，从不推脱，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中，他的健康状况实在不能适应他那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因而常常感冒发烧。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经常到医院吊一瓶葡萄糖加青霉素，进行输液治疗，一退烧就马上出来工作。记得 1990 年春，他从重庆到深圳，当时我正出差在深圳，他一下飞机就有些咳嗽，紧接着晚上就发高烧，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他自言自语地说：“出差在外边，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又生起病来，真是倒霉！”我很心疼他那瘦弱的身体，就对他说：“老师，您已经是 70 岁的老人了，这不是偶然的，您这样劳累，不停地奔波，即使年轻人都吃不消，不累病才怪呢！”他却回答说：“那么多事情，都在那儿摆着，不做怎么行呢？我最讨厌的就是生病！”结果只住了两天医院，还与来探望他的人谈了许多工作。刚一退烧，他就急忙出院，办完一些事，又赶回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像这种情况，对一苇老师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了。同志们看他太辛苦、太劳累了，总是劝他要注意身体，工作总是做不完的，要慢慢来，细水长流。他却说：“你们都这样劝我，我很感激，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细水长



流要看情况，像我这种情况，都年过 70，不是细水长流的问题，而是要有水快流了。年岁再大些，也许脑子就不管用了。”

蒋老师因患肺癌住院治疗一年多，但他从未停止过工作。1992 年夏天，他曾出院在家休养月余，每天还骑自行车去上半天班。无论是住院，还是在家，他照常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写文章，辅导博士生写毕业论文，作有关学术报告等等，一切照常进行。关于他的治疗方案，医生曾经设想过手术切除，他却问医生手术后还能否再继续工作。他说：“如果不能继续工作，只是躺在床上多活一段时间，我就不要手术。因为那样还不如不手术，我还能多工作几天。”1992 年 7 月，当蒋老师病情日趋严重，癌细胞转移到腿部，他又住进中日友好医院。这一消息传出后，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去医院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他每天除了放疗，还要多次服用镇痛药片，才能短时间减轻一些腿部的疼痛。他疼得不能忍受时，曾要求医生锯掉他的一条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同志和老朋友去看望他，只要吃过止痛药以后，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与来看望他的同志畅谈不已。他时刻关心着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关心着国内的经济改革进展情况和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有时医生和护士看见他休息太少，不得不出面干涉，就在病房门上贴了“谢绝探视”的条子。一苇老师看见条子以后，恳求医生把条子撕下来。他说：“同志们、亲友们从老远的地方跑来医院看我，他们关心我，我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不能让人家吃闭门羹嘛！那多对不起人，太不近人情了！”医生也只好依了他的请求，不再贴条子，而是更加耐心地劝告他多注意休息！1992 年 10 月底他因心脏病突发抢救后不久，我看望他，他对我说：“这几天好些了，前几天差点送了命。有件事又要你帮忙。前些天，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志来看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搞的电视讲座发表点意见，讲几分钟也行。我答应了，请你帮我拟个稿子。”我说：“蒋老师，你的病还没有好，劳累多了会影响你的身体。”他说：“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确实是个急待解决的大事，我应该讲讲，只讲几分钟，没



什么关系的。”我只好答应了老师的要求，但我心里更是感到十分不安。后来，他的病情又加重了，加上一些其他原因，这件事才没有做成。

一苇老师就是这样不顾病痛的折磨和摧残，无时不在关心着经济体制改革，关心培养青年一代，关心着他尚未完成的许许多多的改革事业。在我与蒋老师相处的 10 多年中，他对我的培养、教育和帮助，使我深切感受到他的身上确实有一股特别感人的力量，即使是在他古稀之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依然充满着朝气，依然置身于快速高效的工作节奏之中。

一苇老师对经济学很多方面的理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问题的精辟分析，远见卓识，他研究问题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准确性、实用性的特点，是与他数十年来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与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长期深入基层，大量地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一苇老师一生坎坷，曾含冤受屈 20 年之久。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丝毫不气馁，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努力奋斗，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方面提出过不少建议和主张，在改革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并被党和政府采纳，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一苇老师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以及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忘我的工作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弃旧创新的气概是永存的。他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后来人应进一步努力学习，并要继承和发扬的。

一苇老师的理论与精神永放光芒！



## 自古师生天地情

廖元和

蒋老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第一次见到蒋老，是在 1983 年的秋天。那一年，中央决定将重庆作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蒋老和董辅礽同志应邀到重庆作报告。市委小礼堂里座无虚席。蒋老在报告中系统地讲解了他的“企业本位论”、“中心城市论”和“经济民主论”思想，深刻地阐述了中央为什么选择重庆作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明确地指出了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军民分割问题的正确途径，给我以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一年，所学专业又非经济，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知之甚少。当时，我担任记录员，要负责把蒋老的录音讲话整理成书面文稿。当我把蒋老的讲话整理完毕后，又找来一些当时的经济学论文和有关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对照，发现蒋老的报告不仅思想深刻，新颖独到，而且逻辑严密，生动朴实。

1984 年秋，蒋老和周叔莲等十几名经济学专家来到重庆帮助重庆市委、市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我当时作为重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参加了发展战略报告的起草工作。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时，出现了争论和分歧。蒋老和其他几位专家提出要以“市场导向”原则作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当时，地方上的一些研究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对此很不理解，表示反对。在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主持的小型会议上，蒋老对为什么要以市场导向原则作为制定重庆市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作了深刻的表述和耐心的说服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提出和承认市场导向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 10 多年以前，提出“市场导向”的指导思想，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远见卓识，还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和胆略。1987 年，蒋老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当时，留美归来的周天豹同志英年早逝，我接替他负责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工作。这样，我和蒋老直接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从 1984 年到 1987 年，虽然时隔 3 年，但重庆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由于存在不同意见，市委领导要重庆社会科学院和另一个部门各自独立地拿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稿来。我当时将起草好的研究报告送给蒋老看后，他要我重写。他说，你起草的这个报告是折衷主义的产物，一方面有市场导向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倾向。我当时面有难色，蒋老就认真地给我讲解这个报告应怎样修改。同时，他还写了关于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我和陶维全同志联名在 1988 年《改革》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文《论中心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战略》，就是在蒋老这次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改革》杂志是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大型理论刊物。创办《改革》杂志，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给予蒋老很大的支持。在创刊号上，蒋老约请廖伯康书记写一篇文章。有一天，市委研究室的同志来找我帮忙对一篇文章提修改意见。我去后才知道，蒋老将廖伯康书记送往《改革》杂志的文章退了回来。蒋老认为，文章像一篇工作报告，理论性和科学性不够，需要作重要修改。按照常情，廖伯康同志是市委书记，给予了《改革》杂志很大支持，和蒋老的私交又很好，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算什么呢？然而，蒋老是学者，是真正的学者。他主编的《改革》杂志，入选的文章既不看职位高低，也不论个人关系亲疏，只以文章的科学水平决定取舍，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只有一个毕生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学者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同时，廖伯康同志也不以



市委书记自傲，而是充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胸怀，对退回的文章认真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蒋老每次到重庆来，都给我以很大帮助。在汇报工作之余，他还给我们讲解当时经济学界的最新理论动态和有关争论，指点我们改进研究方法。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现在虽然发表了一些文章，有一些思想火花，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要努力学习。1989年3月底，我到上海参加了中国东西部经济理论工作者对话会。4月1日，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代表大会。那次会议，可以说是鱼龙混杂、风云际会、波翻浪涌。会议途中，我到蒋老处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谈了自己的感受。蒋老深切地对我说：“中国现在存在三种倾向，既有‘左’，又有右，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很不容易啊！改革现在处于关键时候，有可能出现曲折。”尔后的历史进程再次证明了蒋老的远见卓识。在那些不寻常的岁月里，我和蒋老进行过多次交谈，是蒋老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1990年，我有幸考上了蒋老的博士生，在蒋老的指导下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学习经济学理论。那时，我每周和蒋老见两次面，每次他都要提出一些问题问我，然后根据我的回答进行讲解。令我印象极深的是蒋老指导学生独特的方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学生不一定要同意老师的观点，也可以反对老师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1991年2月，假期回到重庆，时值蒋老71岁寿辰，我买了一张生日卡作为礼物寄给蒋老，借以表达学生对自己老师的一点心意。在生日卡上，我写下了如下的三首小诗：

—

七十壮怀天下心，坚贞当年挺进情。  
巴渝朝晖燕赵霞，金秋明月胜三春。



## 二

经书雄文伴平生，勘破荣辱与浮沉。  
千秋笔墨留后世，一身正气昭来人。

## 三

自古师生天地情，山南海北感心声。  
它年耕耘芳草地，热血浇花报公门。

当我回到北京以后，蒋老在一张很大的宣纸上，用漂亮、遒劲的隶书亲自书写了下面这首诗赠给我，题目是《书赠廖元和学友》。

历尽坎坷诚可悲，欣逢乱世底层游。  
人生犹如驹过隙，滴水融入大江流。  
丹心付与民族恨，荣华富贵何所求。  
两袖清风唯一慰，三万学友砥中流。

然而，就在这时，病魔已在向蒋老侵袭。蒋老敏锐的思想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使我们都忽略了他的健康问题。这一年，蒋老曾4次准备到重庆社会科学院来，但临行前都住进了医院，终未成行。当时，我们都以为是老人常见的一般病。11月中旬，我到蒋老处，他笑着对我说：“小廖，医生检查我的肺部有一个包，看来，我的工作日程要改变了，准备收缩战线。我准备用3年时间将我的学术思想写成一部专著，书名就叫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导论。你来当我的助手，我们合作，我口授、你整理。以后我每天上午去医院治疗，下午到办公室来讲两个小时。”蒋老走后，其他同志告诉我蒋老患了肺癌，我大吃一惊。这以后，蒋老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到办公室来，向我讲授他的学术思想。在病中，他写下了10几页提纲交给我，我把过去所有的著作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阅读和整理，编成分类目录送给他，以便出他的著作文选。这一工作以后交给了陈佳贵同志，我集中精力记录和整理他的学术思想。



1992年的夏天，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看蒋老，他对我说：“关于我的学术思想专著的事暂时停下来，你抓紧时间写你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听了既感动又难过。完成学术思想专著是蒋老晚年的最大心愿，然而在重病中，蒋老置这一最大心愿于不顾，首先想到的是使自己的学生顺利毕业，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难过的是，蒋老可能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我按照蒋老的吩咐，将博士论文的大纲和内容送给他看，他表示同意并要求我对几处进行修改。他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下一次的难点和突破性发展可能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你在论文中要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点研究。1992年12月，当蒋老看到我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时离蒋老逝世正好1个月。

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蒋老又开始向我讲他的专著内容，讲《改革》杂志的前途，讲中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头脑异常清醒，思想是那样深刻敏锐。然而，蒋老还没有讲完他的学术思想就走了。真是“壮志未酬身先去，长使英雄泪满巾。”

当我夜半写作这篇未完的文章时，实在是心潮汹涌、思绪万千。蒋老，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完成您未了的心愿……！



## 严师益友，情谊忘年

丁敬平

1993年1月2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十分敬重的蒋一苇老师在这一天与世长辞了。当时我远在美国夏威夷。当丁易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噩耗时，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心情感到万分沉重，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用的电话就在会议室外边，当蒋老师的老朋友、美国原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军事力量指挥部战略司令官瓦西里将军及其他在座的人看到我的表情时，都十分诧异，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向大家说明了情况，瓦西里将军脸上的笑容立即就消失了，嘴里喃喃地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们《太平洋论坛》又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会后，他立即让秘书起草了一份唁电，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转交给蒋老师的亲属。我也给蒋老师的老伴陈曦同志写了信，表示我向蒋老师的哀悼。我爱人在北京代表我们全家参加了对蒋老师的悼念活动。

回想起来，我1992年那次有幸赴夏威夷参加《太平洋论坛》合作研究项目，还是蒋老师促成的。他与《太平洋论坛》是老朋友了。1992年夏，他收到瓦西里将军的信，让他推荐一位年青学者去他们那里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项目。蒋老师征得所里领导的同意推荐了我。那时他已患肺癌放疗出院，在家休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9月下旬。本来我们两家住得不远，来往方便，



但考虑到他的身体需要多休息，而且那时去看望他的人很多，我再去打扰对他不利，以后就没有再去，只是请他的亲人代我问候他，之后，我就去了夏威夷。没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

我与蒋老师的师生关系是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而开始的。1978年我报考工经所研究生，录取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学习。第二年。蒋老师担任我们的导师，当时他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中国大地开始掀起改革浪潮，而蒋老师一开始就成为战斗在最前列的一名尖兵。当年6月，他发表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刍议》一文，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当时作为一名研究生，起初对他并不了解，也不理解那篇文章的真正涵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不断地学习蒋老师所发表的许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著，在工作中的许多联系和互相接触，不断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了解，逐步觉察到他的理论中所闪烁出来的光辉，同时也感受到他对我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从而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忘年之交。虽然我也只是他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中普通的一员，但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是使我难以忘怀的，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 一、“要有独立的见解”

蒋老师治学的突出特点，在于“有独立的见解”。他提倡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不轻信于人，不盲从于人。虽曾为此吃尽苦头，经历磨难，但毫不动摇。正因为如此，当中国改革大潮涌起的时候，他才可能又一次挺身而出，并且始终走在这一潮流的前列。

“要有独立的见解”，也是蒋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年青人的一句话。1979年下半年《企业本位论》的发表，打破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上做文章的框框，提出了“以具有独立性的企业为基本单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思路。当时社会上反对者、观望者不乏其人，但赞成的人还是居多，许多人纷纷写信支持他的观点。其中，他也收到我



们研究生院一位同学的一封信，这位同学表示非常信服蒋老师的《企业本位论》，崇拜蒋老师的胆略和见识等等。蒋老师见信以后，在我们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封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强调大家要自己开动脑筋。他说，如果是自己不动脑筋，照搬我的理论的人，我将给他打零分。只要自己动了脑筋，有自己的见解，多少都应该打满分。这件事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至今想起来，他的教导是那么中肯，严厉而又温馨，沁人心脾。

1984年党中央针对当时出现的情况，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当时，正值我国经济理论界积极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进行城市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但有些人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成为一种政治运动，搞不好又整到自己头上，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向以往政治运动的方向滑，用过去的方式搞人人过关，一时人们的思想出现混乱，对改革开放形成了很大的干扰。

面对这一局面，当时作为工经所所长的蒋一苇老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所里把握着正确的方向。他一方面积极学习贯彻党的政策，检查和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和危害；另一方面从工经所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从1978年建所以来，在大政方针和思想观点方面，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也决不搞人人过关。他要求科研人员继续解放思想，把精力集中到深入探讨城市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问题上来。结果在所里很快就稳定了人心，大家继续朝着为改革做贡献这一目标而努力。事后，有人问蒋老师，您这样做不怕惹出麻烦吗？蒋老师淡然一笑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所谓自由化问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应该多纠缠。决不能搞过去那种人人过关，做那种有害于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的蠢事。

## 二、“研究企业的，必须为企业服务”

蒋老师自解放后，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企业、在基层度过的，  
208



对企业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对企业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之所以能在改革的前期就独辟蹊径，提出以企业为中心进行体制改革的观点，正是他经过长期实践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也因为如此，他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任工经所所长后，强调办所方针必须为中国经济的实践服务，为广大企业服务。他经常说：“研究企业的，必须为企业服务。”

1. 他为我所企业管理研究室确定了一个以企业为对象进行系列调查与分析研究的工作目标，要求大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深入下去，集中几个月时间，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在一系列案例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找出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企管室的同志们自1982年起，即对首都钢铁公司、成都刃具量具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及上海机床厂等企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前后历时7年，获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具有详尽的材料分析，以及由此而达到的理论深度，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许多学者把这些成果看作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典型案例。深入企业，从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中获取真知的作风，已在工业经济研究所深入人心，成为全所的一个优良传统。

2. 配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工业管理体制革新的需要，蒋老师任所长后即从企业管理室和工业经济室抽调力量，又新组建了工业管理研究室，以加强对我国工业管理体制的研究，其内容主要是配合企业改革需要进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环境与条件方面改革的问题，如利改税改革、行业管理、政企关系、企业集团、城市综合经济管理体制等等。蒋老师认为，必须先有试验，经过验证、改进和完善之后才可推广。他不仅积极向中央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并亲自率领工业管理室的同志多次去重庆参加试点工作，身体力行，不辞劳苦，长期在重庆与地方领导和群众一起为改革出谋划策。为了不增加市里和企业的负担，在生活上他从不讲究。记得有一次，工业管理研究



室的四五个同志在重庆嘉陵机器厂参与进行企业集团的改造试点 工作，在厂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工作没日没夜。重庆的夏日又十分炎热，每天的吃住都在该厂条件很一般的招待所里，并按规定付费。厂领导提出要给他们发一些补助费。蒋老师听后婉言谢绝了。有的同志很不理解。但蒋老师认为，我们的同志来此工作已有了科研经费支持，就不应再给企业增加负担了。他事事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处处为企业着想，其心之诚，可见一斑。

在所里，他不仅将“研究企业、为企业服务”列为研究所工作的一条宗旨，而且为企业办了一系列实事。例如，80年代初，他针对当时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管理干部急需学习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知识，急需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管理干部的状况，又根据干部人数众多，又不能脱产的特点，适时地创办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并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开设了分校，得到许多财经大专院校的支持，这种方式深受企业界的欢迎，工经所也由此结识了一大批企业界的朋友，双方都大有收获。因为种种原因，虽然“刊联大”停办了，但广大的“刊联大”学员现今已成为各地的经济部门和各个企业里的重要骨干了。

蒋老师在任工经所所长期间，仍兼管着《经济管理》刊物的出版，并将《经济管理》杂志社扩展成为经济管理出版社。他组织专家学者举办了多次具有重大影响的研讨会，还组织了关于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电视专题讲座，发起成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创办《中国经济年鉴》，承担许多大企业的咨询工作，与国内不少大企业及国外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使工经所的科研工作面向社会实际，并在宣传改革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这些都反映了他为发展改革事业顽强奋斗的精神。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1988年7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了《企业法》，中国经济信息公司要拍摄一部宣传《企业法》的录相带。蒋老师是企业改革方面的权威，邀请



他讲的是第一课。到了摄制的那天，他准时去了，中间出现了这样一段小插曲：按公司的设计，每讲为1小时，蒋老师原先没听清，以为只讲半小时。他讲完后，当摄制人员告诉他讲课时间为1小时时，他二话没说，又回到摄制室里，立即重新构思，继续开讲。面对着耀眼的灯光，他一口气又讲了半小时。出来后，已是满头大汗。摄制现场的同志都深深地被他那才思敏捷过人、讲解流畅认真的情景所感动。事后人们去谢他，他却说：“宣传《企业法》是份内的事，只要是对企业改革有利的事，工作再忙也要尽心尽力。”他对我国企业改革倾注了多少热情和心血啊！

### 三、“要活学，不要死学”

1984年下半年，蒋老师有一天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所里有一个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进修的名额指标，所里研究决定派我去，时间是两年。临行前蒋老师特地向我指出，此去的首要任务是过好英语关，英语不过关，无法适应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需要。外国的理论应该学，但要活学而不要死学，要了解人家理论形成的背景，学习人家理论的精髓，而不是去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回来才会有用武之地。当时我们所在国外进修的同志写信回来说，在外面学的东西可能回国后没有用，蒋老师的话就是针对这种反映而说的。

赴美国之后，我牢记蒋老师的叮嘱，首先把重点放在英语过关上。其次是选修一些实用性强的课，如企业计划、市场学、管理战略、技术组织等等。另外，我还注重深入美国社会，尽可能与各种美国人交朋友，从而了解美国社会经济情况，了解美国经济理论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等。

经过这样一段短期的学习，我不仅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面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条件有所了解，从而避免了生吞活剥的学习。与此同时，由于多与美国人民交朋友，为今后在学术上继续保持联系，



不断扩大交往奠定了基础。“要活学、不要死学”，蒋老师的那番叮嘱和指教至今体会起来，寓意十分深刻。对我来说，的确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蒋老师在他的为人处世中，一贯讲求实际，不图虚名，而且把这一作风时时贯穿于对我们青年人的教诲之中。

#### 四、切实关心和解决青年人的家庭问题

蒋老师为解决一批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后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花费了大量心血，使得我们很多同志的家属调动问题顺利解决，解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专心致志地搞科研。

我的家属在武汉，毕业后我是愿意回武汉工作的。我曾一再找蒋老师反映我的困难和要求。蒋老师每次都十分耐心地既讲大道理，又讲小道理，并实事求是地为我出主意，想办法。他建议我以借调的方式先回武汉工作一段时间，但组织关系和户口都不转，等到有了家属调京的条件，再回所里工作。不久，有同志为我介绍了一个对调的机会，是北京某工厂的医生，因妻子是农业户口无法进京，他本人愿调回四川老家工作。但他提出要求解决他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并安排到四川老家与他一地工作、生活。这个条件难度是极大的。当我告知蒋老师后，他便立即让人事部门尽快落实。接着，他亲自给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写信请求帮助。结果那位医生及其全家亲属均在重庆作了妥善安排。这样，我爱人随后也就调北京来了。蒋老师对我一家的关怀之情非常感人，深深地铭记在我心中。

#### 五、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

我岳母是年近 70 的老人，因患胃癌，手术后体质极为虚弱，食欲下降，身体日渐消瘦，整日卧床不起。蒋老师这时已身患绝症。一天我和爱人到他家中探望，说到了我岳母的病情后，他立即将一种治癌病的药“仙草液”给了我们，并说这是对胃癌更有疗效的药物，让我们拿去给我岳母试服看看。如果有效，他可再



托人购买。我们知道此类药都比较贵重，当我们不好意思地推托时，他说：“我的病在肺上，吃了也是浪费，你拿去让岳母吃，能救一个不好吗？”我们推托不下只好收下，带给岳母服了几盒之后，果然效果很好，食欲明显好转，体质也就好起来了，慢慢地可以下床活动。蒋老师得知后很高兴，并托人到沈阳帮忙再买了一些“仙草液”给我们。如今我岳母已安然无恙，身体基本如常，恢复到生活完全自理并可操劳家务了。而尊敬的蒋老师却与世长辞了。他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刻，想着的却是别人的健康。他以自己的言行谱写了一首关心人、帮助人、爱护人的高尚诗篇！蒋老师待人之诚，急他人之急，想他人之想，不但平时如此，到他生命垂危之时，也是如此。他的这些优良品德和崇高风尚，给我极深的印象，我们全家深深铭记心上，永志不忘。

敬爱的蒋老师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尊敬的恩师，失去了一位亲密的良友。他给我们留下的一身正气和锲而不舍、勇于探索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留下的许许多多为我们所记忆和仰慕的事迹，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为我们活着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他未竟的事业必将获得胜利！



## 忆高风亮节的恩师蒋一苇

郑海航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我的博士生导师蒋一苇老师逝世已 3 周年了。3 年前，癌症夺去了蒋一苇老师的生 命，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学者风 范，特别是他那种以微笑面对死神、视事业重于生命的感人精神， 却永远活在我心里，并将成为我对待事业、对待疾病的人生楷模。

蒋一苇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智慧过人，却又蒙冤 20 年，历经坎坷的学者。当他年近花甲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使他重新恢复了事业的青春。他平反昭雪以后，从来不计个人旧怨，以满腔的热情，呕心沥血地投入了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跑调查、写论文、作报告、提建议、向中央献计献策。他在经济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对企业理论和企业管理具有远见卓识。以他发表的《企业本位论》为代表的企业改革理论，尽管当时未能被有些同志所接受，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科学性、正确性现在已被实践所证实，成为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普遍共识。蒋老师对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新的理论见解，坚持始终，从不随风摇摆。当理论界对他的观点持异议时，他并不急于上阵论战，而是去基层调研，去找“试验田”做试验，以实践结果来说服他人。从 1982 年起，蒋老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企业改革的研究人员，先后到“首钢”、“二汽”，成都刃具量具厂等基层蹲点调查，与基层干部和企业职工一起开展多项改革实践，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像“首



钢”、“二汽”扩权的试点、重庆市的中心城市改革试点等成功经验，都是在他的全力推动下取得的。

蒋一苇老师忠于人民、忠于党所领导的改革事业，不顾个人风险，不顾个人身体，为了改革事业，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1978年他调来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时，住房十分困难，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他和老伴及小孙儿3口人住在办公室里，在走廊上用小煤油炉做饭吃。他自己搬到别的办公室与其他同志一起工作。就这样一住就是4年。蒋老师对此浑然不觉，相反却把每天6小时睡眠之外的时间全部用来工作。当时，我正在跟他读硕士研究生，他每次给我指导硕士论文都是在下班之后。有时他一边吃着饭，一边跟我谈。有一次我看他脸色不好，身体特别疲惫，就提出请他休息，但他仍然坚持下去。而且还风趣地对我说：“你研究经济，不是讲究经济核算吗？我现在快60岁了，也要讲生命的‘经济核算’，一分一秒都很宝贵，不能浪费啊！”所以他的工作时间表从早晨到深夜总是排得满满的。

蒋老师每提出一个理论见解后，一是往下走，在实践中检验；二是往上走，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变成国家的政策。这就使他的工作量更大、更加繁忙。

由于过度劳累，蒋老师几次病倒。我记得他还住在办公室里的那几年，他曾患过两次肺炎，一次住院治疗，刚刚恢复就出院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另一次肺炎发高烧，他不去住院，而是请医务所的大夫到住处注射青霉素。我去看望他时，他对我说：“这样省得跑医院，可以不耽误工作”。1991年底发现患了肺癌住院了，当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看望他，劝他安心好好休养时，他倾吐了肺腑之言：“属于我的时间越少，才越要抓紧做我的事情。一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能活10年，一是照样白天晚上工作，只活两年，我宁愿就活两年。”有一次，在空军总院进行放疗以后，病情有所控制，他听说研究所的许多同志要去医院看望他，便央求医生让他提前出院，“以功为守”，反倒来所探望大家。同志们围



着他，关心地询问他的病情，他竟谈笑风生地讲他患的可能不是癌症的证据：“往往心情压抑才得癌症，我心情舒畅，怎么会得肺癌，这是第一。第二，著名的特异功能大师给我诊断过，不是癌瘤。第三，我的精神这么好，你们看像癌症吗？”临走，我们劝他好好治疗休养，不要过于劳累，他却乐观而风趣地笑着说：“让我出院，病就好了 $1/3$ ，回到办公室就好了 $2/3$ ，今天和大家在一起就全好了。”于是，他照样写作，照样去作报告，照样去参加研讨会，照样向中央主要领导面陈自己对改革的建议……。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1992年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卫生部组成专家会诊小组全力抢救治疗。此时，他已卧床不起。我们去看望他，他谈的仍然是改革的热点问题。尽管医生不让他多讲话，但他仍然接待记者的采访，陈述他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制的见解；他仍然向助手口授他对劳动制度改革的新思路送报社发表；他仍然关注着我国的改革事业，向党中央提出新建议。他分明是从癌魔手中夺回他那剩下不多的宝贵生命的一分一秒的时间，贡献给他痴心为之奋斗的中国改革事业，去医院探望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蒋老师病重后，依然不改其满腔热忱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在疾病和死神面前表现出惊人的轻松和幽默。由此可见他那非凡的品格和崇高的情操。

1993年1月22日，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探望蒋老师，一是临近春节，给老师拜年；二是春节后，我即去日本研究考察，一走4个月不能见面，也是临行告别。这天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但头脑很清醒，依然询问企业改革的事情。我告诉他，我即将去日本几个月，安慰他要好好休养，待我回国时再来看他。他点点头，但隐约流露出一种黯然神伤的目光，分明是感到他很难坚持到重逢的日子了。他握着我的手久久未放，我心里也格外沉甸甸的。果然，在我告别后的第3天，蒋老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国外，当我和留学生们看到中央领导向蒋一苇老师遗体告



别的新闻报导时，当听到中外学者们敬佩地谈论蒋一苇老师的学术观点时，我作为他的学生，悲痛之中又感欣慰。

蒋老师献身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和不惧死神而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使我永世不忘。



## 在逆境中拼搏的成功者

李 瑛

一苇同志过早地离开我们而去了。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每当我回忆起我们在那特殊条件下的工作经历时，总觉得往事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回忆往事，寄托哀思，以慰忠魂。

### 一、逆境中共同奋斗

与一苇同志相识是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夏天。当时我在石家庄市机械局生产计划科工作。“文革”10年是大疯狂的10年，是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10年，是一场充满血泪和血腥的梦魔。10年浩劫将工业管理搞得支离破碎，各项事业都处在一种劫后待兴的状态，当然，我们市机械局也不例外。局里原有的一些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不是靠边站就是调走了，新上岗的同志大多数都是从来没有做过管理工作的，更谈不上受过专业训练了，业务都较生疏，工作常出漏洞。搞计划工作的不懂什么叫综合平衡；搞生产组织的不懂得组织、协调、控制；搞统计工作的连起码的统计常识有时都搞不清楚。我们局那些下属企业的管理也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生产组织往往是顾此失彼，作业计划丢三落四的问题经常发生，有时甚至出现因缺少一两个小零件影响全盘计划的现象。均衡生产根本谈不上，不是这边活干不完，就是那边闲着没活干。当时有人总结了一个顺口溜，说工厂生产组织是一个月三台戏：上旬仙女散花，中旬萧何月下追韩信，下旬夜战马



超。管理混乱，领导常常也只是干着急。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抓了各项工作，克服极“左”的影响。当时我们也充分利用那时的好机会，建议恢复一些过去被废除掉的管理制度，一些恢复了工作的老干部也比较重视抓管理，但当时毕竟还是“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管理还真是有很大的风险。当时局领导认为，抓管理没有人不行，首先要培养一批懂管理的人员，就把培训工作交给了我们生产计划科。光有领导的大胆支持，真要办培训班就不那么容易了。要办学，学生倒是现成的，老师在哪里？教材在哪里？还有个大问题，就是要搞培训也得“突出政治”，否则就会犯上个“方向性错误”，那还不成了鸡飞蛋打。有人推荐说，河北机电学院（原来是一机部的电机制造学校）“文革”前办过财会专业大专班，有一批老师是教管理的，现在都闲着干别的，还具体地推荐了蒋一苇、许乃仁、张励勤、江亚中等几位老师。可是我们一到学校联系，就先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钉子。他们说：“你们找的这些人，大都还在‘改造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怎么能登上无产阶级的讲坛来教育工农兵革命群众呢？”没办法，我们就一再找他们磨，还和他们辩论辩论，也搬出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要他们讲讲为工农兵服务。最后总算磨了下来，但还订了许多条条框框，约束讲课内容，才同意借调。后来，我们才知道，学校领导班子对此事思想也不大统一，否则，我们也钻不上这个空子。

在暑假中总算与蒋一苇、许乃仁等老师接上了头。在那个被“四人帮”扭曲了的年代里，他们处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处境中，顽强地支撑着沉重的压力，毅然投入了办培训班的工作。我立即向他们表示，培训班由我们组织，你们只管讲课，既然敢来请你们，我们就信得过你们，只管大胆地讲，出了什么问题我兜着。

我们立即开始了工作。一苇同志虽然没有太多地表露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对管理事业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培



训工作本身。他一下子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我们一起研究办班计划、教学大纲，甚至课程表的每个细节，一苇同志都考虑得很周密。为了给老师们消除政治上的顾虑，每份教学安排和计划的文件与材料，我都亲自签了字，以示“批准”。一苇同志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仅第一期短培训班教材《机械工业企业管理》，他就写了 10 多万字，共分九讲：第一讲，以路线斗争为纲，加强企业管理；第二讲，生产过程组织；第三讲，计划工作总论；第四讲，企业生产计划工作；第五讲，生产作业计划；第六讲，技术管理；第七讲，企业劳动管理；第八讲，企业物资管理；第九讲，企业经营管理。看到厚厚的书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说不出的惊讶、这么短的时间是怎么编出来的？教材编出来了，我们急着想开班，可怎么印呢？一苇同志出了主意，他说：“毛主席不是讲打人民战争吗？我们就发动各个来参加学习的工厂，每个单位分一点，然后我们把它统一装订起来。”现在还摆在我案头的一本《机械工业企业管理》足足有一寸厚，这本书中凝聚了一苇同志多少辛勤劳动和汗水啊！

### 第一期业务培训班终于按期开学了。

为了使培训班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让学员能够运用学到的知识改进工作，一苇同志又亲自起草了《生产计划工作大纲》（讨论稿）。主要内容包括了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计划编制的依据、计划编制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等。按照具体情况，对照大纲把计划的各部分内容对号入座地装进去。他们把这个大纲称做“计划样本”，既好学又好用。学员是来自全局各骨干工厂的，他们回去一实践，实际上是对全局起了系统各种计划工作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的作用。第一期培训班结业时，一苇同志留给全体学员一道作业题：“把你加强和改进计划管理的经验和成绩报给局生产计划科”。这也就作为结业考试成绩，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学员在学习完了以后，能够联系实际。一苇和其他老师还与学员们建立了一种长期的联系关系，经常深入到工厂去具体



指导业务工作。所以说，市机械局系统各个企业在“文革”以后真正加强企业管理，打基础、上水平就是从当时举办管理培训班开始的，后来各企业面上对做的各项验收都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一苇同志和其他几位老师的汗马功劳。老一辈的管理干部都很怀念一苇同志，大家亲切地叫他蒋老师。当他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许多同志还去看望他。尽管那时他地位变了，又非常繁忙，但他仍尽量抽时间热情接待大家，关切询问企业情况，对大家提出有关的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

第一期培训班办得非常成功，各企业纷纷要求继续办班。我们与一苇及其他老师研究了新的办班计划。根据企业管理的整体要求和业务分工，又先后举办了各专业各层次的培训班。有厂长班，分专业的副厂长班，班组长培训班，五大员培训班，还有质量、技术、设备、生产、劳动、财会、物资等各种专业人员培训班。3年多时间，共组织了近百期培训班，培训人数约有3000多人，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教材。这些教材大部分是一苇同志执笔起草的。其中有些教材还被外地区和一些大专院校作为参考。

一苇同志教课非常认真，也很有特点。他很善于联系工厂的实际，深入浅出，易懂易记。到1976年，一苇同志一面讲课，一面还兼管培训班的组织工作。当时条件很差，办班是很辛苦的，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完全是尽义务的。上课地点也很分散，全市到处跑，有时骑自行车都得个把钟头。那时一苇同志已是56岁的人了，他和其他老师总是保持着高度的工作热情，不图名利，积极地工作。第一期培训班编写的那本《生产计划大纲》，一苇同志不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培训班集体编写的名字。

1977年，在石家庄市总工会领导下，我们局的班组长培训班还推广到了全市，对全市各企业提高班组管理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企业管理培训班办出了成绩，有了点名气，一苇同志还代表石家庄机械局参加了一机部在第一重型机器厂召开的职工教育工作会议。这也是上级领导对我们举办的管理培训班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 二、正直的为人，真挚的友情

一苇同志为人正直，不为环境左右，敢于阐明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他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品质的突出表现。我想也许是他一生历尽坎坷的原因之一吧。

记得那几年对于领导干部“四化”的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偏激的认识，特别是强调年轻化。有的工厂干脆把一些班组长一下子提到副厂长、厂长的职务，主要看的是什么“家庭出身”、“政治素质”。结果呢？虽然这些同志大都有较好的思想素质，但由于没有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少，工作很难适应，以致闹了不少笑话。针对当时这种情况，一苇同志大胆地在厂长培训班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提拔一个领导干部到上一层次的领导岗位时，他应该先在原来的领导层次的各个主要业务部门做一段领导工作，以熟悉和掌握这些部门的主要业务工作。这样提拔以后，才能得心应手，把自己的领导岗位的工作做好。一苇同志把这种培养锻炼干部的方法取名叫“干部台阶循环论”。他讲了之后，大多数学员都很赞成。有的同志说，我们想讲不敢讲的话，全让蒋老师讲明白了，还上升到了理论。大家还列举了不少生动的实例，证实蒋老师说得对。也有些同志耽心地说，蒋老师这么讲，胆子也真大了点，万一……。

1978年冬天，一苇同志已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了。我们又一次邀请他讲一讲全国的经济形势，他在百忙之中应邀来了。我们召集了全市各企业的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约有四五百人的会议，听一苇老师讲课。他讲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讲了对企业界的希望与要求等问题。讲到“鞍钢宪法”时，他说，“鞍钢宪法”是毛主席亲自主持搞的，但它是针对鞍钢的具体情况的，不能把“鞍钢宪法”看作搞好整个工业的大法。如果拿“鞍钢宪法”去不切实际地到处套用，指导整个工业发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比方说，五



条原则中，毛主席没有讲经济核算，那么企业都不搞核算吗？搞经济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还有奖金问题，他讲到奖金是超额劳动的报酬，不然的话，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呢？听了李锐同志的报告，大家反映可强烈了，纷纷说：“蒋老师又讲了我们的心里话。”有的同志还说：“就照蒋老师讲的办，工厂没有干不好的……。”李锐同志的报告在局里上上下下反响很大，讲得人心振奋，还录了音，大家都传着听。消息和录音很快也传到市里，可当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听到李锐同志讲到“鞍钢宪法”那段话时，竟下令停机，拂袖而去，还严厉地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不是反革命至少是个右派。”据说后来这个录音又传到了省里，省里有位领导也指示“要查清楚”。后来因这位领导人调离了工作，才没有“查清楚”。以后，我有一次到北京去看望李锐同志，对他谈起此事。我说，那次请你作报告差点出了“反革命事件”，真有点后怕哩！李锐同志只是坦然地一笑。

李锐同志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不因为他的职务变了而疏远了我们。记得他临行之前对我说：“今后如果还有需要我讲课的任务，只要写封信，打个电话，我就来。”1979年李锐从美国考察回来，我们曾请他来讲讲“美国之行”，他果真来了，在全局机关大会上作了一次访美观感的报告。他讲了美国的企业如何管理，对照美国的管理方式讲了我们的管理。他强调企业要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他把整个国民经济比作一个有机整体，每个企业是整体中一个活的细胞，各个细胞要按照固有的规律活动，整个机体才活起来。而我国当前不是这样，不是让企业作为一个细胞按照规律运动，而是把它限制得死死的，好像大厦中的一块砖头。细胞是活的，可以发展，砖头是死的，只能在那里发挥固定的作用了。他做的生动比喻，使与会的同志们深受启发。大家都说，蒋老师讲得我们心里亮堂堂的，我们真是盼着企业早日活起来呀。

李锐同志在北京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他工作起来几乎不分星期日、节假日。就是这样，他还一次次应邀为我们讲课，让我



们又是欢喜又是过意不去。他总是说：“应该的，我永远是你们这里搞培训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我们在那特殊环境下共同战斗的友谊。”

回忆起与一苇同志在那特殊环境下工作的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不论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那思想解放、开拓进取和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受到他那敏锐的思维和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

一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三个历史时期与一苇的三次合作

王蔚然

—

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在胜利的欢庆之余，也热切地企望中国自此富强起来，争民主、学科学便成了大家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决定创办一个新型的科普刊物，《科学与生活》月刊就在重庆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科普刊物。蒋一苇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我也参加了编委会，就是这样认识了一苇同志。当时郭沫若、潘菽、高士其、罗克汀等科学家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自此我们常在编辑部见面。说是编辑部，其实只是在重庆枣子岚垭山坡下的三间竹墙小屋。屋中除了一张竹床，一些竹制台椅之外，真是四壁萧然。这儿既是编辑办公的地方，也是一苇家的住处。不过那时大家对这空洞洞的小竹屋，却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它是我们这些异乡青年共同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

交通大学迁回上海，我们没有跟学校转移，而是南下到了香港。1948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在香港德辅道中的行人路上，突然遇到了一苇，一下子双方都不觉愕然。他身着一件近于灰色的白



恤子，空穿一双运动鞋。虽然战后的香港，衣着也不太讲究，但是他这身打扮，仍然掩盖不了他的狼狈相。幸好这个地方离我们住处不远，我一把将他拉到我家，这下子才知道他是避难来港的。前一天才从武汉到达香港，既未找到任何关系，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样，他就在我家暂时“安住”下来。

“安住”是加上引号的，需要诠释一下。当时，我刚结婚，与几个朋友开了一间小小的书店，没有什么收入，住在岳母的家中。这地方小得可怜，岳母住在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房间里，我们夫妇晚上就在七八平方米大的客厅里打个铺睡。这天晚上，我们拉了一块花布帘，将客厅分为大小两边，就在小的一边又打了一张行军床（香港叫帆布床），招呼这位远方来客。现在说来真有点尴尬，但是当时大家都很安然地受落，甚至是兴高采烈的。这件事，前几年在北京，一聊还常常向人提起。这不久，他到三联书店当编辑，也就住到书店的宿舍去了。

这个时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进展，人们都在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许多由内地来港或者远道从欧美来港的科技人员，都先后在这里聚集。为了联络这些人才，我们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港九分会。当时世界科协的总会设在巴黎，理事会的主席是居里夫人的女婿约瑟奥·居里。港九分会成立时，一苇和我都被选为理事。理事中还有严希纯、曾昭抡、曹日昌（香港大学教授，解放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沈谱（沈钧儒的女儿）、秦元勋（中国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黄武汉、关忾等。这个分会当时的活动很繁忙，主要工作除了经常开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举办讲座等活动外，还在《大公报》和《文汇报》上编了两个科普周刊。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解放之后，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从外国回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更多了。我们就忙于接待这些人，或者协助他们过境。我记得当时接待过的科学家中就有李四光、钱三强、郭沫若、钱伟长等。最后，连我们的理事们也一个一个回内地去了，一苇于1949年春搭船去了天津。



这就是我与一苇的第二次合作。

### 三

20 多年音讯断绝。1978 年夏天，我到北京，中国科协的王政部长设宴接待我们。在宴会上，我便拜托他们寻觅几位当年港九科协的老朋友蒋一苇、曹日昌、秦元勋、沈谱、郑文光等。后来得知曹日昌已去世，另外 3 位都找到了，只有一苇没有下落。先后见到秦元勋、沈谱、郑文光 3 位时，他们也不知道一苇的近况，只说他解放初期是在一机部办公厅工作。没办法中，我们冒昧地写了一封信，寄到一机部办公厅给一苇，但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几天后，突然接到陈曦大姐的电话，从电话中可以听得出来她那种高兴得不得了的声音。她说：“你们给一苇的信收到了，一苇去美国访问，今天下午就回来。”原来我们寄到一机部办公厅的信，放在一堆待取的信中，一位过去认识一苇的好心同志看到了，觉得奇怪，一苇离开一机部已 20 多年了，还有信？便代取了这封信送到一苇家。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有人按响门铃，开门一看，一苇和陈曦站在我的面前，他是刚下飞机就跑到这里来的。虽然已是傍晚，我们几个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拉着手就往外跑，一路走一路说笑，到了天安门，又到故宫，在暮色中我们一起拍了一张又一张像片。

自此之后，我家与一苇家就恢复了来往。此时，我们已与地质出版社合作出版《科学与未来》和《智力世界》，常来北京，与一苇也常见面，并探索新的合作。当时，一苇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主管《经济管理》杂志社的工作。1980 年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出版一本《中国经济年鉴》，不到两个月，意外地收到了他很好的回应。他在信中说：“你关于出版《中国经济年鉴》的建议实现了，接到你的信后，我向马洪同志反映后，他即向国务院提出来，并及时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同意。现在编委会已组成，1981 年便可以出第



一本。希望你快点到北京来，商谈在香港如何合作。”

我到北京拜见了马洪同志，参加了《中国经济年鉴》第一次编委会，也签了合作协议，由我们负责《中国经济年鉴》的世界版权。这样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第三次合作。

这 10 多年，我们还借工作之便，一起去过福建、成都、重庆、昆明、南昌、九江、武汉、广州、汕头、深圳，在紧张工作之余，游览了庐山，石林，青城山，杜甫草堂等地方。在福建时还看过他的老家，去了马尾港。这样，就有更多的谈话机会，互相之间的友谊也日益加深，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也更多。

与一苇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一闲下来，他总是谈笑风生，讲一些引人哈哈大笑的趣事，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得许多。他的一生，一直到最后，都是执着地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为这个理想贡献他的全部精力。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位老朋友由重庆来北京，到他家探访。那几天天气热得厉害，见他在书房中写东西，满身大汗，就说：“蔚然经常来北京，也不叫他带一部空调来。”一苇回答说：“按照蔚然现在的条件和我们的关系，他什么东西都会送给我，空调、冰箱……算不了什么。不过，现在我们在业务上有合作关系，就什么也不能要了。”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我说：“这是真的，连他的小儿子结婚也不让我送礼。后来小两口旅行，刚好在重庆会仙楼宾馆遇到我，我只从衣领上解下一条有三根红格条的半新领带绑到他的颈上，算是送了结婚礼物。”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可看到一苇是如何维护他的事业形象的。

一苇不幸逝世的时候，我刚好在美国，未及参加他的告别仪式。最近来到北京，我们夫妇买了一束鲜花，到他家中，敬献在他的遗像前，表达我们的哀悼，并慰问了他的夫人和子女。我在庐山时曾为他拍过一幅照片，他坐在劲松前的石头上。这幅放大的照片就摆在一苇的骨灰盒边，我一面默默地凝视，一面眼泪凄然落下……。

一苇，你为革命、为祖国无私地奋斗了一生，现在你安息吧！



## 勇于创新和拼搏进取的一生

陈元直

一苇同志突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无限悲痛，并由此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和一苇同志相交近 50 年了。1944 年他从桂林到重庆后，计划办一个科普刊物，借以团结在重庆的一些科技朋友。我当时在育才学校教书，经一位朋友介绍与他相识。我们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立刻决定合作。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乡下，到市里一趟不容易，所以办刊物的重担落到一苇的身上。当时他在重庆一家半官方机关工作，白天在那里上班，办刊物的事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去做。编辑、组稿、买纸、印刷、发行等等都是他在奔忙，特别是经费问题，十分拮据艰难，而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遇难而上。当时我们一班朋友都佩服他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个刊物定名为《科学与生活》，通过这个刊物，团结一批科技工作者，号召他们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从自我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到群众中去，与生活相结合。一苇还通过这刊物，亲身参加到民主运动中去。据我所知，他与郭沫若、陶行知、沈钧儒、史良等均有联系。虽然这刊物只存在一年多，但对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1948 年他因《挺进报》遭破坏，转移到香港，在生活书店担任科技图书的编辑。我也奉武汉地下党指示到了香港，曾与一苇旦夕相处有两月之久。一苇仍念念不忘办科技刊物。这时他想得



更远了。他想到不久全国即将解放，工人阶级要担当建国重任，必须加速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因此必须鼓励科技人员到工人中去，与工人结合。我们谈了许多，并相约，以后还要找机会合作，完成夙愿。

1950年，我从武汉到北京开会，一苇已从香港调到北京。我们在北京又相会了。这时他正在主编一本以工人为对象的月刊，名为《科学技术通讯》。他告诉我，他计划创办一个科技出版社。这是解放后第一家出版科学技术书刊的出版社。他动员我到北京来一道办出版社。他说，让我们再一次合作吧！我考虑后，表示愿意参加这项工作，没有想到，就这样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的事业。

1950年7月，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一苇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它是全国第一家新型的科技出版社，一切无先例可循。一苇充分表现了他创新的勇气和才能。

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以三联书店的《科学技术通讯》编辑部为基础组建而成的。中央重工业部和三联书店各投资2万元（当时旧币为2亿元）合资经营，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共有5人，重工业部和三联书店各出2人，另一人请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长董昕担任。双方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这种合作形式在当时是创举。正是这种合作形式，使出版社得以顺利产生和迅速发展。可惜的是，这种形式只存在两三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管委会规定：为工人服务，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是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一苇以极大热情着手创办全国第一个工人科技刊物《机械工人》，于1950年10月出版。他还创办了第一个帮助工人学习技术的丛刊《机械工人学习活页材料》。它是以工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专题，篇幅不超过2万字。薄薄的小册子，装在读者口袋里，十分方便。这种书不算书，刊物不像刊物的新型出版物，很受工人欢迎，一共出版了500多种，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作为第一个新型的专业科技出版社，应当怎样办呢？从哪里



抓起呢？一苇果断地从培育优良的思想作风、创造有效的工作方法抓起。由于参加工作的多数同志（包括我在内）对出版工作都是外行，一苇做了大量启蒙工作。他领导大家学习邹韬奋办生活书店的传统，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提出开门办出版社的思想。要求将出版社办成作者之家、读者之家，要求每个编辑都有一批热心出版事业的作者和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时的许多专家、教授都是出版社的座上客，如刘仙洲教授、李酉山教授、程学敏工程师、吴中伟工程师等等。许多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如倪志福、马恒昌、王崇伦等，都是联系密切的好友。编辑更是经常下厂、下科研单位，接触读者，了解情况，与读者建立密切联系。一苇在与作者接触中，发现绝大多数科技作者对写作缺乏经验，于是他亲自编写《作者手册》，作为提高作者写稿能力的工具。这在当时也是首创的。

一苇勇于创新的精神，还表现在他根据实际情况对待上级的规定。当时出版总署为了发展出版、发行、印刷事业，决定三者分立。但是一苇认为，科技图书的印刷有较强的专业性，所以提出科技出版社应有自己的专业印刷厂。后来得到出版总署的同意。我们办起了具有排印科技书刊特点的印刷厂。

一苇同志在科技出版社时间只有两年半，但是他以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出版社的创立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他的开门办出版社的思想，为读者服务的思想，为出版社建造优良传统，因而在今后几十年中，出版了上千种质量尚好，符合社会需要的图书，对我国科技书籍的出版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2年后科学技术出版社归属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改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我仍在出版社工作。一苇调到部里去编部刊《机械工业》，并负责政策研究室工作。虽同在一个部，但我们见面就少了。

1959年初，一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1964年，他又调到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教。假期中曾来



京，偶有机会相见。1978年一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得到平反昭雪。他数十年风风雨雨中披荆斩棘地度过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心始终坚定不移，不论是在同白色恐怖作斗争中，还是身处逆境中，他都是为追求真理，为实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誓言而奋斗着。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一苇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但他仍努力拼搏进取，为经济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这种坚韧不拔、忘我工作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机械工人》长盛不衰的奥秘

李宪章

我和一苇同志相识于1949年。当时他在三联书店主办《科学技术通讯》杂志。1950年《科学技术通讯》改由重工业部、全国总工会，三联书店三家合办。同年7月成立了科学技术出版社（即机械工业出版社前身），一苇同志任社长，应他之邀，我到出版社工作。

到出版社后，我协助林家燊同志筹备《机械工人》杂志的创刊工作。当时编辑部只有我们三个人，又都是涉足编辑工作不深的年轻人。一苇同志对如何树立正确的办刊思想，如何结合刊物的特点和编辑部的自身条件进行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以及如何提高素养和刊物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关怀倍至。他经常深入编辑部，给我们讲述革命先辈们办刊办报的动人事迹以及他自己办刊的经验体会，很多事感人至深，令人没齿不忘。

有关邹韬奋先生办刊的遗闻轶事，大多是当时听一苇同志讲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韬奋先生对读者无私奉献的服务精神：一天，韬奋先生接到一位青年读者向他倾诉悲惨遭遇的来信。这位年轻人贫病交加，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又染上了肺结核，因而悲观绝望，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百无聊赖之际，寄语韬奋先生。先生满怀深情以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亲笔给读者回了信，一方面鼓励他战胜贫病的困境，指出青年一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选购了治疗肺结核的书籍一并寄去。从此，这位青年在邹先



生不断的关怀和帮助下，终于战胜了病魔，走上了革命的征程。

在刚刚成立的出版社里，文印工作仍沿用他当年在重庆办《挺进报》时使用的油印方法。那时没有油印机、油印滚，除了必不可少的蜡纸、钢版、刻笔外，其余就是木尺、纸夹子、玻璃板。而把三者组装起来就是一台油印机，再在木书包板上用图钉安上一窄条汽车内胎就成了替代墨滚的刮板，把它们拆散了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文具和生活用品，当时《挺进报》就是用这样一套工具印刷出来的。出版社仍然沿用这样一套地下工作的油印方法，一苇同志是别有用意的。他经常以此为教材向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告诉大家，在敌特的严密侦察和不断搜寻下，《挺进报》能够一期又一期地出版，就是仰仗革命先烈们在当时极其严酷的形势下，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聪明才智，创造出这样一套办法，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照样出版《挺进报》。他提醒人们现在形势变了，但这种精神要学，要发扬。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感召下，沈阳机械三厂车工赵国有创造了车塔轮的新纪录。一苇同志就此在《科学技术通讯》上作了专文报道。文章已经加工好，该冠以什么标题呢？他意识到赵国有这一创举，犹如一只火炬，必将点燃广大工人群众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的燎原烈火。恰如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际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下，苏联国内经济十分困难，以斯达汉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工人阶级开展了劳动竞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力地支援和保卫了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一苇同志预见到赵国有这一创举和当年斯达汉诺夫一样具有深远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因而果敢地在文章前冠以《中国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赵国有》的标题。刊物一经出版，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轰动的效应。一苇同志的画龙点睛之笔又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从以上三例不难看出，一苇同志对培养造就年轻的出版工作者用心良苦。



正是在一苇同志的循循善诱下，《机械工人》杂志从创刊始，就确立了一条依靠群众的办刊路线，团结了一大批如倪志福、王崇伦、苏广铭、李昌安、马学礼、盛利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先进工人代表及热心为工人服务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作者、审稿、通讯员队伍。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不因编辑部内部的工作失误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又改进了一整套简便可行、快速可靠的信稿登记运转方法，完善了编辑部内部的业务建设。对读者的咨询，我们力争做到有问必答。在 50 年代，技术咨询每年平均在千件左右，主要是依靠作者、审稿者、通讯员队伍无偿为读者服务。尽管人手不多，我们经常挤出时间，深入工厂和工人交朋友，并把每个月的劳动，安排在工厂与工人同劳动，体验生活。几十年来，《机械工人》不失时机地刊出了先进经验、革新成果、技术知识，如王崇伦创造的“万能工具胎”，倪志福创造的“群钻”……等，在推动群众技术革新中起了典范作用。总之，作为一本专业技术普及刊物从 1950 年创刊至今，40 多年来始终活跃在生产第一线，倍受读者喜爱，最高发行量曾突破 40 万大关，并在促进机械工业技术进步，改善机械工人队伍素质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一苇同志言传身教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办刊思想是分不开的。

40 多年前，一苇同志的言行犹如在耳。正是他引导我投身了出版事业，并在《机械工人》编辑部一干就是 40 年。40 年间，编辑部的编辑轮换了几代，我也总是学着老社长的做法，向他们传授着先辈们的办刊思想，这也许就是《机械工人》杂志长盛不衰的奥秘。如今一苇同志不幸离开了我们，而他留给我们的办刊思想仍在代代相传，我仅以此告慰一苇同志。



## 富有创新和实干精神的一苇

唐自杰

1992年秋，我得知一苇患肺癌住进医院的消息。为此，我坐卧不安，非常惦着他，因我当时由于哮喘病复发，也住在医院里治疗。我与相隔数千里之外的一苇老友通了一次长途电话。我们彼此都愉快地听到了对方熟悉的声音。他在电话里亲切地对我说：“老唐，您的病怎么样了？哮喘病到了天气暖和就好些，您不要焦急，好好抓紧治疗，安心养病。我现在很好……你不要为我担心……。”可惜我们交谈的时间太短了，不能畅所欲言。我心中祝愿他早日康复。没想到，时隔两月余，一苇就与世长辞了，我无限悲痛！一苇匆匆离去，使我失掉一生中最亲密的、最敬重的好友，至今每一念及，犹感伤怀不已。

一苇和我有着数十年的交往。我们的友情不是一般的关系。我们是为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也是最持久的。他对我的深情厚谊，我永远也不会忘怀。

1946年，我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当我看到《科学与生活》月刊（以下简称《科生》）创刊号上登有我的老师潘菽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同时还有“征求社友”专栏，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写信给《科生》杂志社联系，出乎意外的是，在该刊第二期“珍贵的友声”栏目中将我的信刊出了，并吸收我为杂志社的社友，不久还来信邀请我参加杂志社组办的座谈会活动。这样



我就与《科生》的主编蒋一苇认识了。

1946年下半年，我大学毕业后，主动参加到杂志社工作。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进行和谈时期，领导《科生》的是南方局周力行同志，办刊目的是要通过刊物既宣传进步的科学思想，又团结一批进步科技工作者。如果和谈取得一定的成功，便可争取一批进步科技人员到解放区去，壮大解放区的科技力量。《科生》杂志社的社长是严希纯同志（一位老地下党员），一苇同志是副社长兼主编。1945年10月筹备，1946年1月创刊。刊物办了一年后，因国内形势愈来愈恶劣，《科生》被迫停刊。

《科生》杂志是由一苇和他的几位好友自筹资金创办起来的。1945年，一苇曾在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当一名小职员。抗战结束后，慰劳总会解散了，他和张克岑所得到的一笔遣散费都用来办这本杂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人员，除我一人是专职的以外，其他都是兼职的。我担任总干事，是没有工资报酬的，给刊物写稿也不给稿费。那时，我住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与一苇家人在一起吃饭。一苇当时还在《西南日报》任副刊编辑，他爱人在一个小学校教书，还有母亲和两个孩子，也都住在杂志社里。我的伙食费用，是从他们家中微薄的收入中匀出来的。他们一家生活过得很节俭、很艰苦。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都是靠自己另谋职业来维持生活。为了办好《科生》这个刊物，大家都是以满腔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完成任务。一苇就是这样团结了他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同心协力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科生》在创刊号封面上就标明了“学习现代进步科学，创造民主幸福的生活”的办刊宗旨。同时在创刊号的“评论”栏中还提出了“科学建国需要国内和平，立即停止内战”的口号。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科生》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郭沫若、邓初民、梁希、侯外卢、潘菽、丁璇、罗克汀、吴藻溪等当时社会上负有盛名的进步人士与科学家、学者以及科技界的社友、读者数十人。在会上，他们都



热情激昂地发表了对新科学运动如何开展的意见，对科学救国、科学建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宗旨也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这在当时科学技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一苇同志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完成任务。在刊物上开辟有“征求社友”、“珍贵的友声”、“科学信箱”、“读者笔谈”等专栏。杂志社还常举办座谈会，如“开展新科学运动”的座谈会，“原子弹”座谈会等等。一苇亲自阅读读者来信以及读者意见表，有些问题和意见还发表在刊物上并作解答。他经常与我一道去拜访作者，约请专家给刊物撰稿、帮助刊物为读者解答问题。因此受到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不少专家学者经常给刊物写稿，有的读者还给杂志社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刊物出版两期以后，订户就大为增加。在经济来源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刊物能顺利办起来而受到群众的欢迎，这说明《科生》办刊的群众性是很突出的。

在与一苇共同工作的时间里我深刻地感到，他在主编工作中，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向读者进行有力的宣传。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这是当时重庆各界民主团体万余人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国共政治协商成功的群众大会），主持大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进步民主人士被特务打伤，引起了公愤。《科生》在第二期上发表了由一苇执笔写的一篇评论《由二·一〇血案谈起》。强烈要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求严惩肇祸凶手。

同年秋，重庆又发生了一桩使人非常气愤的自杀事件。一位高级工程师郝贵林先生，19岁留学法国，在法国工作30多年，是法国一家兵工厂的厂长。他对飞机、坦克制造有很深的造诣，他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了在法国的优厚待遇，丢下妻子儿女，满腔热情地回到祖国。因为无人事关系，遭到冷遇，久久无法找到工作，使他的技术无用武之地。他在“绝命书”中写道：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政府的腐败，他悲叹不已。最后自缢在重庆中山公园的



公共厕所里。此事件发生后，《科生》杂志在第八期发表了由一苇执笔写的《悼念郝贵林工程师》的短论。文章指出：“郝贵林高级工程师之死，不是因饥饿而死，他是为祖国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而悲哀、失望而死。郝先生的死，是一个默言的抗议，他代表全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对这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抗议！他的死，是一个启示，他指导我们要从厕所的吊带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这些事件，给我的印象极深。解放后我在教学工作中，常常对青年学生讲述这些事。

《科生》除了配合革命需要发挥战斗作用外，还对新科学运动的开展问题，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指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提出：“科学家应从实验室走向街头”，“科学不应与生活脱节”，“科学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应该与生产相结合，应该与生活相结合”，“今后的科学运动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新科学运动，应该是与广大人民生活和利益相结合的科学运动”。当时不少科学家热心为《科生》撰稿。此外，刊物还对社会上的一些反面论说，如“生物自然发生论”、“八卦与新行星”等那些玄学、伪科学进行了批判，指出科学家应与一切陈根腐蒂作战，应打破不问政治、高尚其志的旧习，应做科学的传道者。

《科生》对于有困难的科学家采取团结、爱护的态度。例如，对廖庶谦先生复员途中翻车身亡后其家属的贫困问题，科学家高士其先生的悲惨遭遇及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科生》在第五、六期上都发表了文章和评论，呼吁社会上科技界的朋友们对以上两位遭受困境的科学家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并发起一个响应参加对廖、高二位先生进行慰助运动，希望科学界的朋友们能够成立一个自救互助的团体，来保证这种自救互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1946年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把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封死，把战火越烧越大，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一些进步报刊及革命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凶残迫害。重



庆曾几次发生《新华日报》被特务、暴徒捣毁的严重事件。形势日趋恶化，经党组织决定，《科生》停刊。为了长期隐蔽，改办一种面向社会职业青年的小型刊物，将以一般进步科技人士为读者对象转向以社会基层广大的小职员、小店员等青年群众为读者对象。党组织改派何其芳同志来领导这个刊物。考虑到当时国统区的社会青年多数陷于失学、失业、失恋等等苦闷和彷徨之中，刊物要办成“灰皮红心”的形式（即表面是灰色的，适应读者趣味的，但实际内容是健康的、进步的），定名为《彷徨》杂志，由一苇负责主编。何其芳还亲自给刊物写书评。他的第一篇书评是《评〈北极风情画〉》（《北极风情画》是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一本黄色小说），以此来与黄色书刊争夺读者。

1947年元月《彷徨》创刊，一苇在创刊号上的《革新献词》中特别提到：我们开辟了一个“心理服务部”，值得向读者介绍。按照一苇的要求，我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心理服务部》的文章，在《彷徨》第二期上登出。后来确实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做心理测验或解答心理方面的疑难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新颖的创举。这一栏目完全类似于现在盛行的“心理咨询”工作。但《彷徨》杂志能在40年前便设立了这样一个专栏，说明一苇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在他的关切、指导下，我逐步学习写作，写了多篇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短文，并为读者解答有关心理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很受读者欢迎。

同年春，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重庆市的爱国学生、教师和群众数千人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大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迫害，政治形势更趋恶化。这时，新华社社长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迫撤返延安。领导《彷徨》杂志的何其芳同志也随新华社撤离了。我们虽然失去了党的直接领导，一苇、陈然等在此紧张时刻，根据时局动向，决定《彷徨》仍按党组织原定的方针继续出版，并要求大家注意隐蔽，把刊物办好。重庆市此时乌云密布，反动报



刊和一些无耻的政客都纷纷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叫嚣要在 3 个月内消灭共军主力等等狂言，使得一些青年群众产生悲观情绪。在《彷徨》杂志周围的一些读者也出现了波动。一苇与陈然针对当时出现的这股逆流，决定在刊物上有所表示。他们合作撰写《论气节》一文（由一苇执笔，署名平方），在《彷徨》第五期上登出。文章指出：“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讲道理口惹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服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平安，再不然就关门读书去了。”文章还颂扬另一些人“在灾难降临时，他们不妥协，不苟免，不退缩，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他们‘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

文章发表后，我们马上就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赞扬和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有的读者还寄来“读后感”。确实，此文对当时被反动派散布的狂言乱语弄糊涂了头脑、有悲观情绪的青年读者，帮助他们及时认清政治形势，指引他们反逆流而前进。读者从文章中吸取了精神营养，坚定了对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使更多的青年站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同时，我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 年下半年，我调到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但仍兼《彷徨》的特约通讯员，曾为刊物的“心理服务部”写过《怎样治疗心理疾病》一文，登在 1948 年《彷徨》第二期上（这是刊物的最后一期）。一苇常来信要我继续钻研心理学，鼓励我多写通俗的文章。我在北碚工作时，曾兼办《大公报》、《北碚日报》上的“心理卫生”，“儿童福利”等副刊，并出版了《怎样培养和提高自学能力》、《儿童心理学》两本通俗读物，这都是与一苇的鼓励分不开的。

同年 3 月，由于革命需要，《彷徨》停刊。一苇与陈然已转入地下活动。在北碚，我收到过一苇寄来的无名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用香港新华社通讯稿、《群众》周刊的消息编印的小报，是秘密



散发给熟朋友的。不久，一苇与陈然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挺进报》工作。1948年4月中旬，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捕入狱。一苇从虎口中逃脱，他化名蒋国栋，逃到北碚我工作的住处，躲避了大约一周。这几天，我们同住一屋，同睡一床，同在一起吃饭、散步，常常交谈到深夜。他讲述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要我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们互相关心，亲密无间。

1948年秋一苇转移到香港，1949年春一苇调到解放了的北平，在三联书店编辑部工作。他来信说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创办了《科学与技术通讯》月刊。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刊物。不久还成立了科学技术出版社，他担任社长兼总编。他在来信中还特别关心我的写作，他又一次鼓励我多写些通俗的心理学读物。

1959年初一苇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劳动。他身处逆境中仍勤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他在信中说，他准备利用在生产劳动中通过亲身的实践，去探索在企业管理上的许多实际问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1964年一苇调往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教，我在重庆师范学校任教。我们常常通过书信交流教学方面的经验，彼此编写的教材也互相交换意见。但通信最多的是在“文革”10年。那时，一苇在动乱中受到很大冲击和折磨。1969年从“牛棚”一解放出来，他便来信告诉我，他白天在校办工厂劳动，利用晚上的时间写《陈然烈士传略》，这是对与他共同战斗过的亲密战友陈然烈士的怀念。不久，他将写好的约5万多字的《陈然传略》（初稿）寄给我征求意见，还要我帮助他刻印数份。我当即刻印了5份，并分送给有关的熟朋友征求意见（此书已于1983年在重庆出版发行）。

1970年我院在复课时，心理学专业未安排开课计划，教师思想动荡不安，我也产生了消极情绪，很想提前退休，而且政策上还允许我在乡下的小儿子回城顶替。我曾将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一苇，他回信劝告说：“你不应该丢掉自己的专业，不应提前退休，不能感情用事。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孩子而忘掉了为大多数人作出



点贡献的责任。”一苇在 1972 年 11 月 2 日的来信中又对我提出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我的开导：“关于你的悲观情绪，我还是上封信的意见，‘风物长宜放眼量’，应当看远一点，要从发展的必然性去判断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被当前的现实性所局限。这几年的运动，经过这一右一‘左’的干扰和破坏，危害极大。现在拨正航向，也并非易事。不能不有一个艰巨的过程，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还在逐步解决，何况心理学这一门学科的问题。心理学世界上有，我们中国也得有，你们学校不要，整个国家也会要的。但从你个人来说，既要看清方向，看到必然的未来，又要懂得现实转化的过程。对前者要有信心，对后者要有耐心，二者结合起来，得出自己当前可以努力的做法。我是坚决不同意你提前退休的。”

他在信中还说：“我校原有的财会专业目前也尚未复课，教师们都在校办工厂劳动，我被安排在生产管理科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如果我自己不积极也完全可以轻轻松松。我的态度是，只要有机会献力，我就要主动推动许多事，力争多做点工作，以免到岁数，有机会也无能为力了。但我还很为自己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可努力的机会不够。我现在一方面尽量做好当前的工厂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学习经济学的心得，打算花十年八年时间，弄出一点成果，以便将来机会更好的时候，献给党和人民。所以，现在我还有两重努力：一是当前；二是未来。这个话只有对老朋友说，否则别的不了解的人，会认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而我自己，几十年干革命，形成了一个强烈愿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想方设法，主动做些有益于革命的事。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也无法，但不放弃主观努力，一旦客观条件变化了，允许了，到那时又能贡献什么呢？如果主观努力了，客观条件仍然不变，仍然没有可效力的机会，那时，自己也可问心无愧。这种态度，我自己概括为 4 个字：‘尽其在我’。”

“文革”后期，我又一次产生提早退休的念头，一苇又多次来信，坦率而真诚地劝阻我。他在来信中说：“对你的前途问题，我



还是原先的意见，希望你‘尽其在我’，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准备，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准备，要把自己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至于业务本身的准备，主要弄清方针性的问题……你将来研究的范围，还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发展，即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但理论准备很重要，自己缺乏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缺乏对心理学这门学科全面的看法，是无法站得住脚的，也无法用明确的方向、方针来指导自己的专题研究。如果方向不对，成果也就成问题。我唯一的希望，你在今后的十几年里，在学术上能真正拿出有份量的成果来！这是你，也是我目前应考虑和应追求的东西。我们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给祖国，给人民，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啊！你小儿回城的问题不要看得太大，知青回城的政策，迟早也会逐渐落实的。最近已经有向农村知青招工的措施。我愿意老朋友们及早振奋起来并有所准备。”我得到一苇多次真诚的帮助和开导，才彻底打消了提前退休的念头。这些年里，一苇和我之间往来的书信我尚保存有七八十封，至今重读他写的这些信，使我由衷地感到他精神的可贵。事实上，我的论著大部分都是在动乱10年后的许多年中才发表的。如果不听一苇的劝告，没有他对我的帮助和开导，我的科研成果是难以获得的。

1978年一苇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2月30日，他来信说：“我20年的冤案已得到平反，这是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初到北平，创办了《科学技术通讯》月刊。这第二次解放，也是到北京，要办一个《经济管理》月刊，很高兴能够重操旧业，并能有机会投入渴望已久的学术场所。工作安排我很满意。在有生之年能落叶归根，当然是我的夙愿。可惜晚了20年，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大大减退了，能起的作用有限，但总算有了一个适应自己愿望与条件的工作岗位，是值得欣慰的！如何争分夺秒为革命尽一份力量，为下一代留点东西，实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问题……。”

我读完一苇这封来信后，心中十分高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给他的复信中，我为他的平反而祝贺！为党对知识分子实事求是的政策得到落实而欢呼！

80年代以后，一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浪潮中，他除了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外，还担任重庆市第一经济顾问，在重庆开展中心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时，常在北京与重庆之间来来往往。我仍在重庆师范学院工作，社会活动较多，兼职也不少。每次在重庆与一苇见面时，他总要向我提出要求。记得他多次对我说过：“要有所得，必有所失。必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我建议你不要兼职太多，要把时间用在钻研心理学方面。”我常常以这些话来要求自己。后来我主动辞去一些兼职和社会活动，使自己能专心搞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这也是由于一苇的帮助。

1983年初春，一苇与张克岑来重庆出差。我们在一起谈起解放前大家共同办《科生》与《彷徨》两个刊物的那段经历，回忆青年时代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分。一苇要我寻找这两种刊物。我正好保存有完整无缺的两刊合订本，于1月4日由市文化局领导主持举行了《科生》、《彷徨》两刊的捐赠仪式。参加仪式的有蒋一苇，刘镕铸、张克岑和我4人。从此，这两种刊物成为重庆市博物馆珍藏的文物。

1984年春，一苇被聘为重庆市第一经济顾问。他为推进重庆中心城市的试点工作，常来渝参加一些会议，深入基层做调查以及关于股份制试点等工作。我们常有见面的机会，但由于彼此工作都很忙，他来去匆匆，却很难有时间畅谈。但一苇每次见到我时，总是很关心我的健康和我的科研工作。

在半个世纪的交往中，一苇对我的教育、帮助、关心最多，也最大。在与他交往和相处中，我感受到他对人真诚，为人的正直、坦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坎坷、曲折、磨难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的本色，不畏艰险和困苦。他为真理而奋斗，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的一刻。



1993年夏，收到蒋方给我寄来的他父亲过世后出版的《我的经济改革观》这本将近50万字的巨著，这书是一苇主要的经济改革思想和主张，也是他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的“要为后代留点东西”，他努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看着书封面上的一苇半身肖像，仿佛觉得他正在与我畅谈一样。

一苇为人民、为祖国做出了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 三个难忘的夜晚

蒋学浚

十分不幸，万恶的病魔竟夺走了一苇的宝贵生命。在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正在振翅起飞的时候，国家多么需要像你这样富于革命精神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啊！在翻滚的改革大浪潮中，亲朋故旧多么需要你的关怀和指引啊！多少人为你洒下了伤心之泪。

我同一苇的交往是从1941年秋天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融融的春光中，风雨飘摇的长夜里，还是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友谊经常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到关键时刻，我总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人们常说往事如烟，确实，许许多多往事都被漫长的岁月稀释得非常模糊淡薄了。不过，一些曾经使自己深深感动过，刻进脑海深层的事物，却是终生也难以忘却的。半个世纪有近两万个月日夜夜，在我与一苇的相处中，有三个夜晚最是难忘。

### 西林公园之夜

1941年的秋天，我和一苇同时考进了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数理系。开课的第一天，满怀大学生荣誉感的新生，一大早就纷纷地走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教室。我刚一落座，左邻的同学迫不及待地伸过头来看我的笔记本：“哎呀！真巧，你姓蒋，我也姓蒋，多少年前我们肯定是一家子人哩！”他边说边笑，上身不住地左右摇晃，几次碰着了我的肩膀。我也伸过头去看他的笔记本：“蒋一



苇”，“啊！一家人，一家人。”我也跟着咯咯地笑起来。他是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爽朗，显得那么热情、真挚、活跃。初次见面，他给了我一个十分良好的印象。以后，我们的书本、笔记本、钢笔、墨水等等就经常地混杂在一起了。

广西大学的校本部和文学院、政法学院设在西林公园，理工学院大楼（包括学生宿舍）是新盖的，离校本部大约有两里多地。中秋前的一个傍晚，一苇约我到校本部去遛遛。我们边走边聊。我问他：“你是哪个高中毕业的？”他笑了，说：“我没有上过高中，高中的课程都是自学的。”我十分惊讶：“整个高中课程都能自学？”他更笑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然后他详细地介绍了他自学的经历。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的青年，而且几次跳级，颇为得意。可是同一苇一比，我惭愧了。他的刻苦学习精神，高效率的学习方法，不知比我强过了多少！我从内心里产生了钦佩之情。

西林公园是清末大官僚岑春煊（字西林）的私家园林，红墙绿瓦，曲槛回栏，林木掩映，清泉涓涓，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在一座假山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谈理想，谈未来，谈时事，谈政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讲了国民党的许多腐败现象。我是一个一直在学校念书的纯朴学生，过去也接受过桂系军阀的反蒋宣传，但对蒋政权的认识很不深刻。他的谈话对我很有启发，激发了我的政治热情，坚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政治上，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带路人。这次谈话，奠定了我们半个世纪战斗情谊的基础。

这一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批著名文化人，如夏衍、茅盾、胡愈之、邹韬奋等等都生死不明。而这时却传来了孔祥熙家属从香港撤退时，所乘飞机一个文化人都不带，飞机上塞满了洋狗、洋猫、螃蟹、大虾之类玩物和山珍海味。学生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晚上上自习的时候，一苇对我说：“我们公开发表一下见解好吗？”我说：“怎么发表，国民党报纸让登？”



他说：“有办法。”他立即起草了二三百字的短稿给我看，并且把早已准备好的大张白纸拿出来，说：“写好贴出去。”第二天清晨，他搬椅子，我搬凳子，悄悄地把它贴在操场最西端的篮球架的板子上。当时，每天早晨都有早集合，校长高阳就站在这个篮球架前发表他那又臭又长的“训话”。这天，他照例慢吞吞地走到了篮球架前，他发觉有些异样。他站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个站台上，踮起脚跟，高举他那高度近视眼镜，一边看，一边连声说：“胡说，造谣，别有用心！”同学们来得早，知道上面说的是什么，议论纷纷，等着看这位国民党党棍的笑话。高阳气得青筋暴露，大声呼唤：“把它撕掉！”学生们则高喊：“别撕，别撕，让大家看看！”学生队伍里声浪很高，高阳嘶哑的嗓门怎么也压不下这激愤的群情。这次早集合，他只好草草地吼了几句就收场了。这算是我在一苇的带动下，开展政治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 化龙桥之夜

1948年春天，山城乌云翻滚，重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一苇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惊讶。他家住在城里枣子岚垭，工作很忙，我住郊区化龙桥，是个单身汉，平时都是我到他家里去，他来看我太稀罕，而且又这么晚了。我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西北风。”他仍和往常一样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并且淡淡地说：“今天晚上不走了。”我们坐定以后，他才慢慢地告诉我，昨天傍晚，他按约定时间到南岸野猫溪陈然家里去。走到陈家门口，刚一敲门，陈然厂里的一位工人就打开门，说：“蒋先生，陈先生被警察抓走了，老太太哭得厉害，你快去劝劝吧！”一苇忙问：“还有警察在楼上吗？”工人说：“还有一个守在那里。”一苇就说：“那我赶快去想法救陈先生。”说完连忙离开了陈家。这时轮渡已经停开，他沿着偏僻小道到南岸另一位朋友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是在嘉陵江边度过的，夜幕降临以后才来到了化龙桥。他对我说：“家里回不去了，可能要在这里呆上几天。”



我说：“没问题。第一，我这里是军事工厂，门卫森严，特务们不会到这儿来找。第二，我住在宿舍的最高层，一人住一间，很隐蔽，不会被发现。”“所以我才来找你呀！”他还是那么从容，那么自信。我问：“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猪狗们怎么会找到陈然？”他说：“肯定有人告了密！”当时还不知道党内有人已经叛变。他告诉我当前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国民党统治区里工人、学生、老百姓又一再起来造反，他们自知日子长不了，狗急跳墙，一定要进行残酷的镇压。不过，他们镇压得越凶，也就垮得越快。他向我简单地分析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告诉了我不少在社会上听不到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和国民党的内部情况。说完后他又问我：“你们工厂怎样？”我说：“表面上比较平静。”他说：“不要麻痹，这班魔鬼是没有人性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疯狗要时刻提高警惕。”我问他：“工运还搞不搞？怎么搞？”原来在此之前，工厂里改选工会联合会，职工们推选我为委员。我找一苇商量过，他希望我参加进去，多多接近工人，多为工人办些好事。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委员该不该当？如果继续当，该怎么工作？一苇鼓励我坚持搞下去，他说要尽量依靠工人，讲究策略，当前恐怕应以争福利为主。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是按照一苇说的方针去做的，为提高职工工资、增加职工福利与厂方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临解放时还有效地组织了护厂活动。这都是一苇指导的结果。

## 会仙楼之夜

1984年11月上旬，我和一苇一道出差重庆，同住在会仙楼一个套间。他是个大忙人，一下飞机就忙起来，听汇报，开座谈会，8小时之外，还要看望老战友，赴老战友的家宴，不到夜深人静进不了宾馆的门。重庆市经委和市总工会邀请他10日上午做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报告，9号晚上，他算是比较早就回来了。这时我正在看资料，见他一进房间，我马上冲上一杯热茶说：“快快坐



下来休息一会儿，好准备明天的报告。”他若无其事地回答：“没什么好准备的，我心里有数了。他们知道我明天要讲演，今晚什么事也没有安排，咱们好难得在一起，聊聊多好。”一聊就聊到了重庆的老朋友身上。这些老朋友每人都有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任何一位都可以写成一本内容丰富、情节感人的传奇小说。我们越聊话越多，不知怎的一下子他把话头转到了我的身上。“好险呀！差点儿右派的大帽子就扣到了你的头上。”我说：“我还差一点儿，可你一点儿也没有差。”我忽然想起了白居易赠刘禹锡诗中的几句：“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见本文后附注）

我说：“白居易这首诗好像也是为你写的，把‘诗’改成‘文’就蛮合适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说这些了。”他从来不愿意谈起这桩冤案的前因后果。一看表，已经过了12点，他忽然想起还没有吃药。他走进卧室，我跟了进去，我问：“药的效果好吗？”“还可以。”他患了多年的肺气肿，是抽烟过多引起的。我劝他：“以后可别再抽烟了！一边吃药，一边抽烟，病永远也好不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怎么抽烟了。可是，不抽就写不出东西。写不出东西还活着干嘛！”一苇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正在争分夺秒地为改革呕心沥血，让他不写东西或者减弱他的思考力，那是办不到的，我就没有多劝。我们都躺下以后，他又挑起了话头：“你怎么不写几本书？”“我哪能写书！我正要责怪你哩！当年我做编辑工作时，你一再要求我走广博的道路，要我当‘通家’。几十年下来，我变成了带甜味的甘草，清凉的万金油，什么病也治不了。”他听了又哈哈大笑起来，说：“博和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了广博的基础，才能形成高水平的专，只要你多接触实际，机械行业有多少东西可写呀！”他从理论上并结合现实名人的事迹向我讲了一大通博与专的道理。渐渐地我们都进入了梦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长谈，此后，我们虽然还见过几次面，但大都是寒暄几句。从那以后，我再也听不见一苇的金玉



良言了。不过我可以告慰一苇，我正按着你的意见在进行，力争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还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11月10日上午，重庆市人民会堂的大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大约6000多人。一苇虽然昨晚休息的时间很少，但他在讲坛上依然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就如何增强企业活力问题，密切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讲了3个多小时。讲演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

一苇，你为推翻“三座大山”而献身革命，你为振兴中华、为祖国富强而忘我工作。你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你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你的奋斗精神，你的高贵品质，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你的学术思想将焕发灿烂的光辉。芳林新叶催陈叶，你未竟的事业，自有千百万个后继者来完成。

#### 附：白诗和刘诗全文

##### 醉赠刘二十八始君

白居易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读了诗后，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作答。原诗如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 无 尽 的 思 念

唐家璇

1993年1月25日，当我听到蒋一苇同志因病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

蒋老是我心中敬慕的老师。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急于想去看望，但探望他的人太多，为使他减少疲劳，安心养病，医生在控制探望的人数。为此，我只好经常向探望回来的同志打听一些情况，自己很少去医院。

1992年年底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打电话给陈曦同志，问问蒋老的病情，她说“他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他很想念老同志。”我的心弦一颤，预感不幸的事将要发生，举着电话不禁潸然泪下。

我和爱人孙播平当天下午就去中日友好医院，并带去北京出版会计学会全体同志给蒋老的一封慰问信。

蒋老看见我们很高兴。他看完慰问信，让我转达他对学会同志的谢意，还两次和我们握手致意。在回来的路上，我俩都说：但愿我们和蒋老不是最后的握手！”

不久，听说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不仅想吃东西，还能和人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我默默地祝愿他多活几年，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想不到新春佳节尚未过完，他就离开我们了。我们全家人都为之哀伤和惋惜！

我和蒋老相识较晚。1977—1978年，我作为一个财会工作者，



曾参加中国科学院清理经济工作组，清理被“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搞乱了的经济。在清账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工不能真正起到主人翁的作用？”“国家经济遭到破坏，作为国家的主人翁，为什么只能伤心而无权制止？”怎样才能防止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百思不解。1979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读到蒋老写的《企业本位论》一文，有很大的启发。我对蒋老的真知灼见，深为敬佩，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蒋一苇这个名字。后来，因我在院部计财处分管经济片各所和《经济管理》杂志社的预、决算等工作，有机会同他接触。

蒋老作风朴素，待人真诚。见过几次面之后，使我感到，在他平凡的外貌里，却蕴藏着深沉的革命热情和充沛的革命精力。他有智慧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虽历经坎坷，但却不屈不挠，专心研读马列，孕育着革命的激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开了思想禁锢的闸门，他的新思维尤如倾泻的潮水奔流而出。《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相继发表，读后令人钦佩。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冷静的思考，为改革开放，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难怪企业家称他为改革的先驱者，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

我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蒋老是我们的所长。他白天的日程被工作、会议、讲学等活动排得满满的，但还能一篇接一篇地发表重要理论文章，真不知道他的文章是在什么时间写的？我曾问他爱人。老陈同志说：“他写文章多半是在晚上。”

“那他什么时间休息呢？”我又问。

“在飞机上和火车里，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

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有这样充沛的精力，这样快节奏的生活，真是难能可贵。我新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但十分注意不为小事去打搅他，我很少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交我办的事，我总是写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拟好稿后，再请他批示。有人对我说：“蒋老很主观，你不先请示汇报，他会不高兴的。”为此，我也很担心。



有一次我征求蒋老的意见，他却说：“你这种工作方法很好，先提出自己的意见，使我省去很多时间。什么事都要我先出主意，还要你们干什么？”我觉得说他主观的同志，是对他的误解。

在蒋老的支持下，我接受新闻出版署计财司委托，编写出版财会人员的培训教材，并举办培训班。在培训班学员的一致要求下，我们成立了北京出版会计学会，蒋老又为我们提供开会地点和电话，并接受我们的聘请，担任学会的名誉顾问，还为学会作过几次精彩的报告。有一次，报告内容是关于企业改革的问题，被企业部门知道了，1500人的会场竟座无虚席。有人说：“蒋一苇这样一个大学者，在小小的会计学会当名誉顾问，不是有点降格吗？”可蒋老却说：“学会不论大小，关键是你们要办实事，我不图虚名。”学会成立一周年的大会，蒋老也亲自参加，还表扬我们一年来做了很多实事，很值得学习。他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会员们都认为，我们有一位著名学者当老师，指导我们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

蒋老很关心对青年人的教育。1989年春有一次，北京某外语学院托人找到我，要请蒋老利用星期六晚上，给大学生作一次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报告，使青年学生增长知识，关心国家大事。蒋老工作很忙，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可蒋老一听给青年作报告，就欣然应允。没想到临近报告前一天，得知星期六晚上存在不安全因素，我建议蒋老取消这次报告，他却说：“答应了的事，怎好不讲信用呢？”我很担心，怕报告时秩序不好，就动员我的儿子和我一块去听报告。我们都坐在前排。我说：“如果秩序不好，咱们就赶快保护蒋老退出会场。”

没想到，蒋老的报告很精彩。他讲了很多中外生动的例子，引起青年人极大的兴趣。近两小时的报告，竟获得10多次掌声，无一学生退席，我真佩服蒋老的才能。会后听学生反映：“从来没有听到这样好的报告。”

1987年，我去重庆参加蒋老主持召开的“中心城市综合改



革”讨论会，有机会去渣滓洞、烈士墓参观。当年《挺进报》的编者，蒋一苇的革命事迹，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40年前的蒋一苇同志，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拿起笔作刀枪，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向敌人胸膛挺进。他还掩护过革命烈士江姐的孩子，为革命做过重要贡献。我认识蒋老之后，从未听他讲过这段令人仰慕的光荣历史。在他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聘为第一经济顾问和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时，他在重庆人民心中是倍受尊敬的，并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蒋一苇同志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者，也是积极参与改革的活动家，他非常富于开创精神。十几年来，他创办了经济管理出版社、经济管理刊授大学、《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中心、《改革》杂志、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做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为我国经济管理科学的壮大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蒋一苇同志，安息吧！

你的同志，你的学生，你的亲人们，都会沿着你的足迹，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占仁 崔玉朴 许乃仁

蒋一苇同志于 1993 年 1 月 25 日逝世。在遗体告别会上，最后一次看到他的遗容，想到过去多年的友谊和他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奋进不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病魔何其如此无情？竟夺走了他的生命。谁人不知，他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理论家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社会活动家，正在进行着多么重大意义的活动啊！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

一苇同志毕生坎坷，1959 年他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对待，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劳动。后来，1964 年调到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河北机电学院担任企业管理教学工作，直到 1978 年调回北京，在石家庄共呆了 14 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幸和他朝夕相处，一起工作，深知他的为人。他在学习上孜孜不倦，在工作上一丝不苟以及对革命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虽然时隔多年，但仍记忆犹新。

他到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后，即投身到会计专业班的建设中，为培养既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熟练业务能力的会计专业人才，竭尽了心力。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实际操作能力。为了使教学工作更符合社会需要，在他的倡议下，多次组织并参与一机部中等专业学校会计专业的教材研讨会，对教材内容及其重点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多被采纳，从而使教学内容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他亲自担任企业管理课的教



授任务，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学生说：“听蒋老师的课，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他治学严谨，要求学生不仅学好理论，还要有过硬本领，字要写得好，打算盘要熟练准确。为此在课程中加了写字课与珠算课。他亲自动手编写了写字课本和珠算课本以及珠算的等级标准。这些在其他学校是没有的。由于他的努力，学生的基本技能得到提高，相得益彰，在毕业实习中受到实习厂的赞赏。记得在北京几个工厂实习时，一个厂同时有大学实习生和我校的中专实习生，该厂认为我校的中专生实际业务能力和基本功过硬，在工厂更为实用，希望毕业分配时给他们厂分配几个。后来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企业，大部分成为财务上的骨干力量，在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面凝聚了一苇同志的心血。一苇同志逝世时，许多学生闻讯后由四面八方不远千里赶到北京，向一苇同志的遗体告别。一苇同志病重期间，有的学生从远方专程来京，送医送药。向遗体告别时，学生莫不落泪，足见情谊之深。

“文革”中，一苇同志受到严重冲击。但他的革命信念丝毫不减，坚信乌云必将过去，革命终将走出误区，进入康庄大道。在被批判斗争的空隙中，他抓紧学习马列著作。他的屁股被“造反派”打得不能坐椅子，就趴在床上苦读。他读书从不浮光掠影，马马虎虎，而是深入研究，切实弄清其内涵和本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都圈圈点点划有记号和眉批，并认真作了读书笔记或做成卡片，以便随时取用。他的生活很清苦，室内陈设很少，而藏书甚多。他利用一些旧木板做了许多小书箱组合成为书柜，把藏书分门别类存放得井然有序。长期的刻苦学习，奠定了他的理论基础。

“文革”中他被抄家，一些书籍和文稿资料也被抄走。这些文稿和资料是他多年的心血，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他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的资料和文稿，他视之若命，大胆而坚决地要求返还。他说：“别的东西我都可不要，唯这些文稿资料和书籍必须还我。”这些东西在“造反派”眼里不过是一些不屑一顾的废纸，就



答应了他的要求，所以有些珍贵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稿资料得以幸免于难，保存下来（其中包括江竹筠烈士和陈然烈士的遗照及传略等）。

“文革”中会计专业被取消了，一苇同志被下放到校办工厂“劳动改造”。他的主要任务是拉车送料，工作又苦又累，瘦弱的身体实难负此“重任”。但一苇同志却以苦为乐，尽职尽责，从不喊苦偷闲，而且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他总是及时地把所拉的材料和零件送到工作地点，不误加工进度的需要。在劳动空隙中，他和工人谈心交朋友，相处得很好，受到工人群众的好评与尊敬。

“文革”中有一股风吹得很厉害，即认为工人当家做主，自己可以管理自己，过去工厂管理的一套都被作为“管、卡、压”取消了，所以生产管理十分混乱，浪费损失严重，工效很低。有的有识之士对此也不敢说，只能把隐痛藏在心里。一苇同志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心和责任感，则挺身而出，大胆地提出企业必须加强管理。他坚持认为，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人和物相结合从而创造新的物质财富的过程，没有一套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法，人和物就不能很好地结合，国民经济就难以得到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是一句空话。于是他结合校办工厂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订了一套生产管理和教学实习制度。这套管理制度的实施使校办工厂从定额管理、工序之间的衔接和生产均衡等方面走上正常轨道，从而大大提高了工效。由于这套制度和方法是一苇同志由生产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切实有效，能被广大工人接受，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一苇同志坚持认为，工业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不仅要生产出合格的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新价值，即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积累资金，才能扩大再生产。所以不仅要在品质上，而且还要在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解决职工群众对经济效益的认识问题。同时他认为，降低成本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而降低产品成本又必须有全面观点，不仅要从节约材料及工时上，而且要从往往被人忽视的产品设计上着眼。因为产品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产品成本的全局，大量的浪费往往隐藏在产品设计的不合理之中却不被注意。为了提高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认识及降低成本的全局观念，他利用学生实习这一契机，发起“十、百、千、万”活动。所谓“十、百、千、万”活动，实质上是发动学生和职工算细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面核算产品从设计、材料选用及工时消耗等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督，提高人们的经济效益观念，以优化各个生产环节的工作。这一措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提高了工效，改进了工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我校的校办厂不仅能做到自给，而且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金，成为省属高校的佼佼者。当然这是全体师生、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一苇同志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一苇同志始终把人的因素作为管理中的第一因素。他认为提高管理水平必须首先提高人的素质。针对现实情况，他亲自任教，给工人讲授数学和管理知识。他讲得深入浅出，切合实际，生动有趣，工人十分爱听，其内容紧密地与贯彻管理制度结合起来，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事隔20多年，工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文革”后期，一苇同志痛切地感受到我国生产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上不去。出于一个老革命和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他决心走出校园，走上社会，宣传他多年从理论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管理上的主张。这时，他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他在多年以后发表的著名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的雏形。这三篇文章是一苇同志的代表作，它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被社会所承认，决非偶然。这是他多年苦读马列著作和参加生产劳动、教学实践的结晶。如今翻开他这几篇著作，倍感亲切，仿佛又见到了他往日在校时奔走呼吁的形象，崇敬与怀念的心情油然而生，挥之不去。



1974年，一苇同志建议我校恢复会计专业和创建管理专业，被认为不合时宜而未被采纳。当时由于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工业管理混乱很严重，石家庄市机械局所属企业需要整顿。他与志同道合的许乃仁老师被邀请到市机械局主办的企业管理培训班任教。他们自编教材，二人轮流上课，配合默契。由于培训班理论联系实际，针对企业现实管理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深受欢迎，参加者非常踊跃。随着形势的发展，讲授内容也随之扩展深化。这种培训班办了数年，长盛不衰，声望日隆，且扬名省外。其时外省、市如东北、内蒙等地也不断来人“取经”，邀请他们去讲课。嗣后，一机部闻名特邀一苇与许乃仁老师去一机部为部属各企业讲管理课程。一苇同志分工在质量管理组任教，得以大展其才华。他不唯书，不唯上，凭着他深厚的马列主义底子和多年的生产与教学实践，他讲得朴实无华，切近时弊，有独到见解，所到之处倍受欢迎。为了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他首先提出了开展质量月活动的建议而被采纳。这一活动，对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苇同志犹如和氏之璧，蒙尘多年终有被赏识之日。1978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所长，可谓苍龙入海，有驰骋的广阔天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之下，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他写了许多有独创见解、有价值的理论文章，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人说：“一苇同志是大器晚成。”我们却要说：“一苇是大器晚现。”只是被发现和任用迟了一些。后来在北京见到他，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老了，我的时间太少了，我多么羡慕年轻人啊！”是的，他脑子沉积的对社会有用的东西太多了，而留给他释放的时间相对太短了。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

一苇同志谦和、诚恳，人如其文，朴实忠厚。在石家庄居住时，子女多，工资低，经济上不充裕，但有人有困难时，他却慷慨解囊，至今尚有人借他的钱未还，但他从不提及。在遇有孩子



与邻里孩子发生争吵时，他从不护短，即使自己孩子有理，也要领孩子向人家道歉并让孩子主动与对方握手，以示和解。到北京工作后，一苇同志对我校管理系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切。他多次来校，并邀一些专家来校讲学，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他处于顺境成名成家之后，其谦和程度始终如一。故友来见，工作再忙都要亲自接待，并尽可能陪坐片刻。他一生清贫，但不谋私利。他去世后，除了藏书之外，没有多少积蓄与财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所想的只有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深切怀念一苇同志

李维嘉

一苇同志逝世了！

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但人们不大了解他的另一方面。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机智的地下工作者，闻名全国的小说《红岩》中介绍的地下党报《挺进报》的主要的创办人和编辑。将近 50 年来，他在这方面是无名英雄。

他执着追求和追随中国共产党，从广西追寻到重庆，从抗日战争期间追随到解放战争末期，长期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接受党的审查，终于在 1947 年 12 月 31 日被吸收入党。全国解放以后，历经坎坷，遭受委屈，其志弥坚。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令人敬佩的。

1947 年 3 月，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的全体人员被国民党强迫遣返延安以后，一苇同志与党的联系因此暂时中断。他和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刘铭铸、陈然一道，团结几个革命青年，自发地办起了一张在地下秘密发行的无名小报，登载新华社的通讯稿。7 月，这张小报取得地下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在地下扩大发行。从无名小报到《挺进报》，它在敌人严酷的镇压和封锁中，向人们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和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消息，引来了曙光，鼓舞了斗志，影响遍及于重庆和川东。负责编辑和刻写这张报纸的



是一苇同志，陈然同志从事印刷，刘镕铸同志是《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负责发行工作，尚未入党的吴子见同志曾一度在市委和《挺进报》之间担任联络工作。解放以后，《挺进报》因小说《红岩》的出版而名扬四海，可是一苇同志对此总是沉默寡言，不事张扬。他这种高尚的品德，超尘脱俗，令人起敬。

一苇同志还有一种可敬的革命的敬业精神。党和人民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干一行就专一行、精一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办刊物《科学与生活》，以此团结一批科学技术工作者。刊物于1946年元旦创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曾为这个党领导的科学刊物写稿。1947年党组织又叫他改办《彷徨》杂志，按“灰皮红心”原则来办，以联系职业青年。杂志于元月创刊，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以后他又和几个同志以《彷徨》的班子为基础，办起了地下的无名小报，后改为《挺进报》，办得有声有色。解放以后，他又逐渐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著述，终成这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

可惜，他竟先我们而去了！缅怀他留下的业绩和著述，遥想当年并肩战斗的情谊和陈然同志的壮烈捐躯，不禁在黯然神伤之余，继续坚持战斗，告慰故人！



## 生活在朋輩之间的一苇老友

林 彦

1993年1月25日，一苇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正当党和人民需要他而他的壮志还未能尽酬的时刻，他却离开了我们。即使如此，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苇那充满着革命激情的活生生的形象。

—

1946年夏天，我回到重庆，正值民主运动高涨，兴奋得急于想做点什么，但一时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一天遇到吴藻溪先生，他说：“那就多写一点文章吧，蒋一苇正在编《西南日报》副刊。”他给了我一封信，去找蒋一苇。我们就这样简单地相识了，却彼此都充满了信任。这不只因为有吴藻溪的介绍，而且通过刊物和文章相互已有所了解。他那时不只编《西南日报》副刊，而且还编《人物杂志》、《科学与生活》。不久，他又主编了《彷徨》杂志，刊物的封面上有一个大“？”号，非常醒目。我还清楚地记得，《彷徨》杂志社的设计别致的信笺，是一种不甚明显的从左到右的横向暗格，左上端只印着浅绿色的“彷徨杂志社”几个小字，素淡极了，干净极了，给人一种清新之感，可从中看出几个年青人对传统世俗的鄙夷。我收到的一封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聘书，就是用这种信笺书写的。

一苇那时住在枣子岚垭，那里也就是《彷徨》杂志的社址。我



每次送稿子去，他便问问我的情况，与我谈谈时局。有一次正碰上发稿，他就把我留下，和大家一起参加讨论。正屋中央，两张方桌拼接起来，三五个人据桌而坐，每人面前摆着一堆原稿，一瓶红墨水，一支毛笔——这就是《彷徨》杂志的编辑部。一苇恺切明了，确定了要刊发的稿件。我因为什么也不清楚，当然没有说话。和我邻座的也是一个沉默少言的人，他长得十分英俊，只不时点点头，看来也有点腼腆的样子。稿件议论完毕，便拉开桌子，一分为二，宣布吃饭。饭菜自然简单，是和一苇的家人一起吃的。吃罢分手，谁也不认得谁。我只听一苇跟我说起，和我邻座的人叫做陈然。

此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我才知道这个刊物的核心骨干是蒋一苇、刘鎔铸、陈然等人。而被一苇认为是专职以外的业余积极分子的，则是吴子见、向洛新、我和陈丕贤。

我在《彷徨》上写的稿子，都是谈文艺问题的。有一次，谈到《彷徨》的特殊读者对象，一苇向我提出，能不能写点针对青年思想问题的文字。当时，我正读了齐同的《新生代》，觉得可以借小说中一对青年的恋爱故事，指出其失恋的原因在于一方思想的落伍，从而强调必须建立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一苇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谈。可是，还没等到这篇文字写出，《彷徨》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彷徨》杂志于1947年元旦创刊，至1948年3月结束。在公开办《彷徨》杂志的同时，1947年7月，依然是刘鎔铸、蒋一苇、陈然等人，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编辑出版了地下市委秘密的机关报《挺进报》。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挺进报》曾在我的手中辗转传阅递送，却不是从一苇那里直接得来的，我也不知道搞《挺进报》的就是他们几个。直到1948年4月，《挺进报》被叛徒出卖、破坏，陈然被捕，刘鎔铸转移，一苇去了香港，我才大体上明白了底细。



## 二

我和一苇分手后，天各一方，不通音讯。解放以后，只偶而从向洛新那里听到一点情况。直到 1977 年，相隔 30 年之后，我们才又在重庆晤面。他是应原“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之约，前来协助提供烈士材料和工作意见的。和他同行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王琦。说来好笑，我和他们俩原都那么熟悉，相见之时，竟然彼此不相认识了。为此，我们三个人放声大笑了一场。他们为展览馆的工作忙完以后，我陪他们转了两天，谈了许多往事，大家都很兴奋和愉快。特别是谈到陈然，一苇更是满怀深情。当我谈起最好能把陈然的斗争事迹编成剧本时，他尤其赞成，并怂恿我来干。从这以后，一苇与重庆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我，也有更多的时候生活在我们昔日的情谊之中。

在一苇的热心支持下，我终于获准暂时摆脱其他事务，约了余荣邦一道，准备写一个有关陈然的剧本。一苇迫不及待，10 月间给我寄来了一份他所设想的剧本内容提纲。

从 1978 年 4 月开始，我同余荣邦先去成都等地访问陈然的亲属和战友。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访问了前重庆地下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并直接领导《挺进报》的李维嘉。他为我们证实和订正了那封暗示陈然转移的无头信。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一苇，他在来信中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了在我看来是极为少有的激动情绪。他说：“接到 5 月 10 日来信，真是高兴！不是小高兴，而是大高兴，特大高兴。”接着又给我安排去北京的适当时间。他说：“我最近越来越忙，一直到处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在家突击写一份新的讲稿。5 月 25 日预定到北戴河去参加企业管理教材会议，预计开到 6 月 10 日。预定 6 月 20 日到南京、上海讲课，到 7 月中结束。然后可能还要到全国各地去。”他说，大约在 6 月中旬有点空隙时间。

1978 年 6 月我们去北京，22 日晚上见到一苇。当时，他的工



作那么紧张和忙碌，仍然陪着我们访问了王琦、张克岑、吕品、吕培滔、柳秋元、何理立等人。特别是克岑和培滔，一谈起陈然就不禁失声痛哭，我们都长久地陷入了深沉的悼惜和思念之中。一苇在前往各地讲课的繁重活动的旅途中，也从未淡忘过写剧本的事。7月初他去大庆调查，我们送他到北京车站。在夕照中，他穿着短裤挎着包袱的硬朗身影，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没有几天，他又给我们寄回了另一个剧情提纲。

### 三

也就是在这一次，我知道一苇在石家庄河北机电学院任教，讲的是企业管理，而今四处奔波讲的也是企业管理，不免感到诧异。他早年在广西大学学的是数学，在重庆编《科学与生活》，在《人物杂志》上写过不少自然科学家的生平事迹，这些都是我知道并且能够理解的。从编《彷徨》到进而搞《挺进报》，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无需再作什么解释。我记得听谁说过，解放以后，他曾在科学技术出版社，后来又在一机部工作，还依稀记得看过他写的几篇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现在怎么搞起企业管理来了呢？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他，引起来的不料是一场并不愉快的回忆。

“你还说呢，就因为我那时写过一篇《论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被诬为吹嘘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还了得！于是，在1959年补划成了‘右派’。”他说得十分轻松，仿佛是在讲一场笑话。我感受到的，却是痛苦与委屈。我历来不愿触动别人的隐痛，何况是对一苇呢，因而再没追问其间的详情末节。只听他接着又说：“从那时起，我就被下放到河南一家工厂在科室工作。当时我想，要放就放到底，干脆去当一名普通工人，反正我在航空机械学校学过钳工、木工。我从实际劳动过程中开始感受到了管理工作中的混乱，于是从班组的原始记录着手，在生产劳动、班组管理、车间管理、科室管理和全厂管理整顿的实践中，一面思



索，一面研究起问题来，逐渐形成了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再提高到理论上来探讨。”这便是他的治学之道，这便是他下放的成果。我真不知道他的“右派”帽子所结出的这个奇异的果子，到底是苦涩还是甜蜜？是苦涩中的甜蜜，还是甜蜜中的苦涩？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出自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出自于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故尔虽身处逆境，却不曾显出半点困惑。这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冷静头脑、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好学奋进精神。

也还是当我在北京的日子，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于光远找他，约他谈话。他回来后对我说，已经约了王琦夫妇，邀我和余荣邦一道，到全聚德去吃烤鸭。我愣了一愣，说：“何必那么破费呢？”因为平时错过吃饭时间，我们也只在苏州胡同一家据说是最为道地的“担担面馆”吃上一两碗面就算完事，哪里还用得着这么讲究呢？谁知这一次他十分执拗，临末才说：“不为你们，也该为我自己高兴高兴嘛！”说这话时，我分明看见他眼眶中极力强忍而又终于没有忍得住的泪花。我顺从地和他一起到了全聚德，等王琦夫妇来了入席以后，他才说明了自己如此高兴的原委。原来是于光远邀他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筹办一个刊物。我们怎能不和他一起高兴呢？

后来一苇在“大庆”待了一个月，又去“鞍钢”住了几天，直到9月初才到研究所上班。不久即来信说，他负责筹办的《经济管理》月刊年内就要试刊，明年1月正式出版，一切从零开始，所以十分紧张。这个刊物由7个经济研究所合办，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

1978年年底，我终于收到了一苇于12月21日写的一封信，那上面说：

“我1959年所蒙不白之冤，今天总算得到昭雪。今天上午一机部政治部约我看结论，并在结论上签了字。结论写得还不错，承认我过去所写几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原结论是错误的，因



此决定撤销 1959 年的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但工资不补发，写上‘恢复政治名誉’即意味着平反昭雪，但未用‘平反’字眼，也不用‘改正’字眼，而是撤销过去的错误决定。因此我也就签字表示同意了。……

我和陈曦调京工作，凑巧也是在今天正式办好，户口也落下了。我们都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背了 20 年的包袱，在党中央关怀下，终于得见天日，是个人之幸，也是全党、全国之幸。不这样拨乱反正，恐怕都要当亡国奴了。

三中全会即将胜利结束，让我们共同欢呼吧！”

这里没有什么个人怨尤，也没有什么枝节问题上的纠缠，有的只是对于三中全会的激情欢呼！以这样的襟怀和精神状态，卸掉了 20 年背在背上的沉重包袱。我暗自欣幸，一苇这下子该大展宏图、奋发进取了。果然，他在 1979 年 7 月的一封来信中说：“我的工作越来越忙，除刊物外，还要承担研究所的事，又要参加中央安排的一些调研任务，9 月份还要出国去一趟。”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 四

我和余荣邦从北京回来，又在各处收集、补充了一些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几经修改，终于在 1979 年 8 月写出了一个川剧剧本。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考虑，剧本没有能够付诸排演。我只好带着愧疚不安的心情，无可奈何地把这事搁置了下来。一苇对这事却很坦然，反而安慰我可以继续努力搞成话剧或是电影，以避免戏曲形式中的某些艺术表现上的局限性。我自忖对这些形式同样陌生，一直没有敢于应承。

1980 年初，一苇来信说，接到展览馆的信，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陈然烈士传》，他已表示同意。原来早在我去北京以前，一苇就曾千辛万苦地收集材料，整理并刻印过一份数万字的



陈然生平传记。出版社的约稿，显然就是据此而来的。但他目前工作仍然很忙，这件事却又义不容辞，于是提出来一个意见：有关陈然的少年时期和家庭部分，拟请陈然的哥哥陈崇基进行修订；有关被捕以后的内容，则要我就近根据展览馆积累的事实材料加以补充订正。关于陈然的剧本没有弄好，我于心不安，这件事正好可以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我在原稿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必要的改写和适当的修订，于1980年10月完成，寄交一苇和崇基最后审定。经他们同意之后，在1983年6月改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根据一苇的意见，这本书就取名为《陈然烈士传略》。直到这时，我们似乎才算是结了对陈然烈士的一桩心愿。

这之后，我以我们在访问期间所得到的大量材料为基础，进一步调查访问，写成了《挺进报纪事》书稿。出版以后，曾经得到过一些同志们的鼓励。特别是一部分当事人，当时正背着这样那样的沉重包袱，这本书曾为他们顺利地解决历史的某些遗留问题，起过一些微小的促进作用，这是原来我所未曾想到过的。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我之所以能够写成此书，其中也有一苇的一份功劳。他不仅自始至终鼓励、支持我写，而且还把它当作“历史任务”加在我的头上。我在北京，他就日夜陪着我们进行访问，当时的一些情景，任何时候一想起来就会令人感动。我曾经在《挺进报纪事》的后记中说过：“感谢那些保存、收集、提供资料的同志们。他们对于牺牲者的革命情谊，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贞，对于历史的责任感，任何时候一想起来，都是令人振奋不已的。其中的一些同志，曾经在当时和自己的战友经历了同一的死生，然而，谁曾想到，在那10年动乱期间，又和自己的早已牺牲的战友，经历了又一次同一的死生！就连死者在九泉之下，也免不了和活着的战友，经历又一次的死生！”现在明确地说，一苇就是其中的一个。

至于他自己呢，我在这本书中，早已作过真实的、历史的记述，但他一直不同意我写出真名实姓。我在这里要说，书中所写



的那个“老苇”，不是别人，就是真真实实的蒋一苇同志！

## 五

现在，我该说说作为改革家的一苇了。正是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而致力于经济改革，往后，他才在北京、重庆之间，往返得那么多，和重庆的人民隔得那么近，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也才那么多。

我是1980年6月，经北京去青岛，在北京短暂停留时第一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去看他的。他们夫妇和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孙子住宿、吃饭都挤在一个屋子里。克岑也调到研究所工作了。刚刚寒暄了几句，他立即告诉我，苏辛涛也调来负责编《经济研究》，于是又拖我看辛涛。几个老朋友见面，随便聊起来，话题又多落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状态上面，这就难怪后来一经正式提出商品经济，经济学家们欢欣鼓舞地认为是某种理论上的突破了。

我听一苇说过，他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初步设想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办一个刊物；二是编一本《中国经济年鉴》；三是办一个出版社。他把这统称之为“三个一”计划。他说：扎扎实实，一年办成一个。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实现了这些计划，而且还大大超过了这些计划。

一苇不仅是一个深邃的具有独到见解的经济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勇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家。他在重庆作过多次报告，渝州宾馆一个服务员有一次看到他的名字，说了声：“呵，改革的又来了！”他听了以后点点头，愉快地笑了起来。

1982年3月，他在一封来信中说：“我近来更加忙乱，研究所的事全交给了我。中央抓的事又多，真是内外交困。最近要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作，拟定体改方案，如可能，争取在重庆试点。”他还深情地说：“革命时期，我在重庆入伍；建设时期，也希望对重庆的另一场革命做点贡献。”9月间，他又来信说：“重庆试点问



题，因为国家体改委迟迟派不出人，至今还不能确定行期。市委通知我到重庆来参加座谈 1947 年以后地下党的情况，我决定不管试点问题何时确定我都来参加这个会。……既然来，也少不了要对改革试点问题作些调查，准备带几个同志来。一边参加市委的会，一边搞些试点调查。”12 月间，他再一次来信说：“我回到北京后，又是忙得一塌糊涂，但也有些成效。关于在重庆试点的事，经过一再努力，总算有了结果。××同志再次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人大期间，省市领导都在北京，也当面谈好。因此初步确定，这个月 20 号，我将同体改委的负责人一起来重庆商量改革的方案。王谦同志人大闭幕后即先回去准备。不久我们又将在渝见面，特先函告。”

这就是从一苇的来信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首先在重庆市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简要进程。

为什么我国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要以重庆为试点？有一次，他简单地回答我说：“重庆是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又是一个老、大的城市，它不同于像黄石那样的新建城市。它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但设备陈旧落后，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改造问题，在这方面，它有着特殊的典型意义。”当然，这只是我们个人之间的谈话，实际做起来，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论证。在这期间，我亲眼看见一苇是怎样忘我地进行工作的。

1987 年，他又出任了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创办了《改革》杂志。在这之前，他曾约集过我和其他几个熟悉的朋友，征求我们的意见，并要我们提出应该如何办的具体建议。既经决定之后，他又对我深情地说：“我也受过重庆人民的抚育，现在也应该对她作出回报。革命胜利了，但我们还有多少‘壮志’未酬，今后也还有多少事要做呵！”重庆社会科学院成立那天，他还特地带领了一些同志，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举行了庄严的宣誓。



## 六

我同一苇相交将近半个世纪，从一次又一次的日常接触中，给我留下了许多鲜明的印象。他严肃不苟、一本正经，很少见他有展露笑颜聊天开玩笑的时候；他日夜操劳，不知疲倦，他只知工作，不尚娱乐，既不喝酒，也不下棋、打扑克。我同他一起到过大足，到过青城山，对于游山玩水，他也没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他一味的只是思索，思索，除了工作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散散步。

这么说，一苇岂成了一个枯燥的、缺乏感情的人了么？不，绝不。实际上，他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而又大有感情的人。他外表冷静，内心却热得像一团火。他对朋友情真意切，不论是对已经牺牲的陈然，或者是对现在仍然活着的战友，他都同样真挚热诚。他有一次来到重庆，专门开了一个名单，要我约集过去曾在一起办《彷徨》、《挺进报》的同志聚会聚会。后来又和我专门去探望与《科学与生活》有关的刘博禹。就是对新结识的朋友，也从不忘记要去看望他们。

这些年来，一苇每到重庆，我们总是免不掉要约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1990年3月9日，一苇来重庆出差。次日清晨，他来电话约我星期日去聚会，要我替他约请在渝的几位老友。我挺高兴，我们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当晚他又给我打来电话说：“老林，这次聚会恐怕不行了，星期天还是安排不了，‘重钢’要来谈工作，我13日要到人民会堂作报告，你如有兴趣来会上找我。”我得知一苇13日的报告会是市政府组织全市经济工作干部的大会，邀请一苇讲“商品经济问题”。我那天9点多钟去人民会堂，会场上坐无虚席。我在后面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会场约有2000多人听讲。报告会是8点半开始，12点20分结束，中间只休息了10分钟。一苇走到后台见到我，连声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散会我们一道去招待所。”会一散，刚走出门，好几个人围着一苇问这问那，



我只好走到一苇面前说：“有急事请你马上回去。”这才解了围。一苇和我回到招待所，我们高兴地在一起共进了午餐。他告诉我：“15日即返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原想约几位老朋友聚一聚，现在安排不了啦，明天还要参加重庆社会科学院职工代表会，还要开一次全院工作人员大会。下次来重庆再聚会吧！”我对他这种“连轴转”，南来北往，超负荷的工作量，十分佩服。但他毕竟比我年纪大，又常常见他不只一次地咳嗽，近年日见其瘦，我要他多多注意身体。他都只说有点气管炎，没有什么要紧，他总是不以为然。直到最后一病不起，他仍顽强地和疾病进行斗争。1991年11月底他患绝症肺癌，他紧紧追问医生到底还能有多少时间，希望在3年内完成最后一个课题。在住院期间，他还经常抱病去参加重要会议，为企业作报告，接待记者采访，为他的博士生解答学术问题。1991年12月6日上午，他向医院请了一上午的假，抱病参加了江泽民总书记召开的经济学专家座谈会，讨论苏、东事件的教训。在会上他作了45分钟的发言。他怀着赤子之心，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坦诚陈词。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共产党员对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对党、对人民，在诀别前披沥赤忱啊！全场无不为之动容。

对于一苇的逝世，我的伤痛是言语所不能完全表达的。我同一苇之间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或者说是时代所造就并给予我们的一种因缘。从最初的认识开始，我们就没有在一处工作，以后又天各一方，不通音讯，各自为着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终于又在北京、重庆之间，重温并继续延展了我们昔日的情谊。我们个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的重温与延展，也回响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奔腾前进的足音。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能评价一苇的深邃独到的学术成就，无法准确估量出他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我所能做的，只是对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家的一苇，在和朋辈的交往中所留下的一鳞半爪的事迹，作一些活生生的记述。



这些记述是不全面的，甚至是琐碎的，但它们却依然能够显示出一苇所具有的那些闪光的品格来。



## 难以忘怀的一段战斗历程

吕 品

1993年正月初二下午，我和女儿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住院多日的一苇。眼前的一苇已是在与病魔作最后的抗争，他虚弱的身体靠在棉被上，呼吸十分急促。我走到病床前，紧握着他冰冷的手。他微微向我点了点头，但已无法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此刻，医生和护士带着仪器赶到床前，马上要给一苇抢救治疗。让我先到门外，我只好退出门外。没想到这次无言的见面竟是我与一苇的永别！第二天下午我得知一苇已于清晨离世的噩耗时，心中万分沉痛。他匆匆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好友。回忆我们相处的往事，更增添了我对他的痛惜与怀念！

1937年，一苇和我同在武汉第一中学初中念书。这时，正是“七·七”事变前夕，时局非常紧张，每个青年学生心中都激荡着一股爱国热情。我和一苇毕业前夕，与几个好同学聚集在一起，研究毕业后怎样报效祖国？我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志向和条件，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学校，为报效祖国作准备。一苇选择了航空机械学校，谢派芬选择了航空学校，叶家望报考了高射炮学校，我则留在原校高中部，同时参加武汉华北学生救亡宣传队。分别之际，我们约好以一苇为中心保持联系。这一约定我们保持了几十年。

1937年底，一苇的学校迁到成都。1938年一苇毕业分配到广西南宁机场做机械士，不久又调到柳州机场。这时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有着切身感受，参加了“小帽花”（士兵）反对“大帽花”



(军官)的对抗活动，因而受到了追查。为了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他逃离了空军，用半年的时间自修高中课程，考取了广西大学的数理系。那时候，国民党取消了战区学生的贷金（助学金），一苇在学校参加了学生们掀起反对孔祥熙财阀的运动。后因生活没有经济来源，迫使他休学，到一个中学教书。一年后，返校继续学习。这时候他一面读书，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编书出售。他集编写、校对、出版、发行于一身，很快就成为一个出版业行家里手。那时，要想靠卖书吃饭，除了必须精通出版业务，搞好与印刷厂及书店的关系外，还要先弄到一笔钱预支纸张费。幸得当了飞行员的谢派芬出差到桂林，帮助买了一些纸张，一苇自己找了一家小印刷厂排印。第一册书印出来了，紧接着他又亲自到各家书店寄卖，赚来的书钱便交给印刷厂作印刷费和纸张费，如此循环往复。陈曦同志那时由柳州来到桂林，也协助一苇跑书店和印刷厂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名为“自学出版社”。我自武汉与他别后，经过许多坎坷，也来到桂林和他相遇，见他如此经营有方，我心中敬佩不已。

1944年秋，抗战胜利的前夕，日寇攻陷衡阳，并沿桂黔线继续入侵。桂林当局发出疏散令，桂林立刻乱成一团。一苇舍弃一批刚刚印好的书，带着一家人逃往柳州。我也随后离开了桂林。这时，曾与一苇在航空站共过事的好友莫冠业与我们约好到六寨集合，他准备带一批机械士和枪支回家上山打游击，让我和一苇到六寨他家中等候。一路上，逃难的人流滚滚北上，后有日寇在追赶，前有国民党军队在烧抢，美国空军则把难民当作敌人狂轰乱炸，投下无数枚炸弹，把六寨这一小镇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五六千人。我逃到六寨时，已无法找到一苇和莫冠业的家。我从秋末逃到严冬，好不容易逃到贵阳，在一个难民所里遇见了一苇。我们谈起眼前的局势，悲愤不已，原在桂林相约上山打游击的计划已落空。怎么办？一苇建议到重庆去找中国共产党。

我们先后到达重庆。一苇首先与《新华日报》社的党组织接



触。最初是由林默涵同志与一苇联系。不久，党组织改派周力行同志来领导我们。周力行同志介绍我到五十兵工厂职工子弟小学当教员，使我在重庆有了个落脚之地。一苇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急需以科学进行经济建设，便与周力行商议，在重庆创办一个科学刊物，宣传进步的科学思想；同时，通过它团结一批进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刊名定为《科学与生活》，这是在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个通俗化、大众化的科学刊物。周力行同志还指定早年入党的物理学家严希纯同志为社长，一苇担任副社长和月刊主编，由他负责月刊的具体领导工作。党组织还介绍黄继武、成善谋等同志参加编委会。后来还有陈元直、蒋学浚、林家燊等同志也参加编委会或任通讯编委。刊物的经费主要是靠我们自己想办法筹集。记得创刊号的用纸是我从滑翔总会宣传科弄到的，交换条件是在创刊号上登一篇宣传滑翔体育事业的文章。只要有了纸就可以印刷，能印刷出来就可以把刊物拿到书店去卖，卖了钱就可以用来付下一期的纸张及印刷费等开支。周而复始，每期竟然能按时出刊。编辑部的工作都是大家尽义务做的。我在小学教书，课余时间为刊物设计封面、画刊头。与制版厂混熟了，工人师傅送给我一些刊头锌版拿到刊物上用。总之，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穷朋友以满腔的热情决心办好这个科普刊物。

一苇原在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当小职员。抗战结束后，该会解散，发了一笔遣散费都补贴到刊物中去了。我教书一年后也发了一笔所谓“胜利复员费”，我将这笔钱与张克岑同志在慰劳总会领的遣散费合伙在枣子岚垭买了三间一栋的竹篱笆小平房，作为《科学与生活》杂志社的办公室和宿舍，一苇一家也搬来住在这里。

《科学与生活》一开始就以“学习现代进步科学，创造民主幸福的生活”来标明其宗旨。刊物一出版就受到重庆科学界的重视。当发行了3期之后，我们先后召开了两次名为“怎么开展新的科学运动”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郭沫若、邓初民、梁希、潘



菽、卢于道、吴藻溪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郭沫若发言说，这个刊物的宗旨可以说是新科学运动的宗旨，希望能把这个宗旨传播到群众中去。座谈会最后一致认为，新的科学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的特点是“科学中国化、科学民主化、科学生产化”，号召科学家站在特定的岗位上推动历史的进步。

《科学与生活》月刊一共出了8期。1946年秋，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党组织要求我们把工作从进步人士转向社会青年，深入基层，并决定将《科学与生活》停刊，改出一个以小职员、小店员、失业和失学青年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内容的小刊物，借此更广泛地联系群众，深入到社会青年中去，执行长期隐蔽的方针，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党组织派何其芳同志来领导办这个杂志，刊物定名为《彷徨》，由一苇同志担任杂志社社长和主编。杂志社的社址仍在枣子岚垭，刊物的经费也都是靠一些积极分子设法筹集的。

《彷徨》于1946年10月筹备，1947年1月创刊。刊物以“灰皮红心”（即表面上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但实际内容是健康的、进步的）为特点，与当时国统区大量流行的黄色书刊争夺青年读者。何其芳同志也亲自给刊物写稿。《新华日报》副刊编辑部不断将适合《彷徨》刊登的一些稿件转给我们。杂志社的工作由几个核心分子分工负责，陈然负责“读者信箱”专栏，刘鎔铸负责发行，张克岑负责会计工作，我则担任美术编辑，大家都是义务兼职的。刊物开辟了“读者信箱”，收到大批读者来信。第2期出版后，刊物订户大增。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诉说自己种种不幸的遭遇，摆出种种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问题。对读者的来信我们都一一给予答复，与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读者交朋友，组织小型读书会等活动。有的读者还经常主动捐款支援《彷徨》。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社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反动军警包围，全部工作人员被迫撤返延安。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当时心情都十分激愤。在这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失去了党的领导，就像



航船在狂风暴雨袭来时突然失去了舵手一样。但敌人越疯狂，越说明黑暗就快到尽头了。大家紧急研究当前形势和应变措施。一苇和陈然、刘鎔铸等同志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党组织一定有所准备，不至于暴露《彷徨》这个关系。只要关系不暴露，《彷徨》的“灰色”面目一时还不至于引起敌人的注意，仍然可以按照党组织原定的方针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主动去找党的地下组织。因杂志社地址是公开的，为了防备敌人搜查，还把杂志社与社友、社员、作者、读者通讯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留下任何人的关系。《彷徨》杂志在几个核心分子带领下继续按时出刊，并吸收了更多的读者和青年朋友来参加和支持这一工作。

当新华日报馆被迫撤返延安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集中 23 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边区。重庆各大报纸大肆渲染他们的“胜利”，甚至狂妄叫嚣要在 3 个月内“击破共军主力”等等。一时乌云满天，阴霾四布，似乎共产党就要垮台了。当时一些在和谈期间打着革命旗帜的政客们也在报纸上发表消极悲观的论调，影响了一些青年在思想上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一苇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这种现象，与陈然一起反复分析研究，决定在《彷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抨击在反动逆流面前彻底消极悲观、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生活苟安以及那些在敌人的武力面前屈膝低头的人物。于是，由一苇执笔与陈然合作撰写的《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坛”在《彷徨》第 5 期上刊登了。

这篇文章指出：“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 4000 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文章还指出：“修养高尚的人，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致于‘临难不苟免，以身殉真理’。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当财色炫耀在你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论气节》一文刊出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都表示了读此文的强烈反应，表示支持、赞扬。文章对当时社会广大青年读者鼓舞了热情，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坚定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194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王朝末日，它一方面进行新闻封锁，在反动报纸上大肆炮制种种“胜利”消息；另一方面则对蒋管区人民进行疯狂镇压。我们大家正苦于听不到战场的消息，听不见党的声音时，《彷徨》社陆陆续续收到香港新华社寄来的新闻稿和《群众》周刊，大家喜出望外，抢着阅读。不久又收到香港寄来油印的《新华社电讯稿》，每隔一天就收到一次。这些电讯稿刊载了很多解放区的消息，延安附近瓦窑堡、青化砭的胜利消息以及石家庄外围一些城镇相继解放的消息等等。这些消息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一苇提议要把党的消息和声音传播到群众中去。经过多次研究，大家一致赞同要把这一任务主动担当起来。大家立即着手筹备并具体分工，由一苇负责刻写蜡版，陈然负责通联，刘密铸负责纸张及散发工作。这个无刊名的油印小报在“五一节”出版并立即秘密地散发出去。大家商定这件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不许对外暴露（这个无名小报就是《挺进报》的前身）。

油印小报出了几期以后，立即引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重庆



市地下党通过多次与刘鎔铸同志的秘密接触，终于接上了关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决定把小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永梧同志负责领导。一苇和陈然于1947年12月31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鎔铸担任书记，蒋一苇任宣传委员，陈然任组织委员。特别支部直属市委领导。当时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和市委决定发表的文件，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报纸由刘鎔铸负总责并负责采购纸张、油墨，一苇负责编排和刻写蜡纸，陈然负责油印。7月初，《挺进报》创刊。我当时在重庆捍卫小学教书，业余时间继续为《彷徨》杂志设计刊头插图，也参加了《挺进报》的秘密传递工作。通过地下党的领导和大家的积极努力，我们很快就把党的声音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山城，传遍了川东。

同年冬季，我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已转化为劣势。蒋管区的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挺进报》的任务加重了，市委要求每期印数达2000份并对敌方进行“攻心战”。此时，一苇和陈然千方百计设法改进刻写印刷技术来满足客观需要。为了完成任务，他们日以继夜地加紧工作，并把印刷地点转到野猫溪陈然家中。由于《挺进报》传播量的扩大，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恐，敌特分子到处搜索《挺进报》的踪迹。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整个山城。市委指示，为了防止意外，通知刘鎔铸先行疏散，并指定由我模仿一苇的笔迹刻写蜡纸，以备万一现时的编印班子被破坏，还可以有另一个班子接替工作，报纸仍可以继续出版。不久彭永梧同志奉命调往川东农村搞武装斗争，市委另派黎纪初（即李维嘉同志）来领导《挺进报》的工作。1948年3月，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特务到处抓捕人，为了隐蔽起见，《彷徨》杂志于3月停刊（因为《彷徨》杂志社社址是公开的），组织上通知一苇也转移到郊外不要回家。《挺进报》由陈然和我刻写印刷继续出刊。



1948年4月中旬，由于叛徒冉一志的出卖，《挺进报》被破坏，陈然于4月22日被捕入狱。当晚，一苇进城得知陈然被捕的消息后，次日通过陈曦同志来捍卫小学告诉我立即转移。我马上逃往乡下，一小时后特务来抓捕我，我已离去，他们扑了个空。

1948年夏，一苇转移到香港。他来信告诉我，经严希纯同志的帮助，介绍他到香港道风山一个神学院当教员（教十几个青年教徒学簿记），要我也到香港去。当我到港时，一苇已与党的南方局接上关系，党组织安排一苇在生活书店编辑部编科技读物，我在生活书店搞科技书刊的绘图工作。同年冬，党中央指示，从香港调一批知识分子到中央所在地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毛主席已到达石家庄西柏坡。这时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合并改名为“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当时负责往解放区运送人员和一些物资。一苇和我是书店调往中央所在地的第二批人员，指定到石家庄报到。第一批已走的有胡绳、林润青等同志，他们由江汉军区进入解放区。我们第二批是由武汉经中原军区前往石家庄。

1949年春，一苇、陈曦和我3人，还带了一苇的两个孩子，从香港出发，经过武汉由联营书店马仲扬同志接待，派一位姓李的同志带路，让我们装扮成当地商人带家眷回乡过春节的模样。一苇改名为蒋国栋，我们每人都准备有一份公民证，以免路途中关卡的检查。正月初三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在联络员小李的带领下，我们向红安县方向出发。顶着大风雪步行了3天，才到达红安县一个小镇。这是区政府所在地。虽然走了几天乡村小道，终于进入了解放区，我们心情感到十分高兴。当晚区委把当地局势和前沿战况告诉了我们：“最近战局变化很快，国民党的败兵正在溃退，与我解放军正打遭遇战，去石家庄的路很不安全。让你们的女同志和孩子返回武汉，男同志可随游击队员从大别山绕道而行。”第二天清晨仍由联络员小李带陈曦和孩子返回武汉。我和一苇俩人跟着十几名游击队员出发。不料，天公作怪，大雪封山，经过7天7夜翻山越岭，每天都有敌情，前进道路受阻，无



法通过封锁线。第 8 天游击队员只好将我们送回区政府。区领导要把我们留在当地开展文教工作。一苇和我无法答应，因为我是奉命调往石家庄的。第 2 天我们只好返回武汉。虽然在山区奔波跋涉了 10 多天时间，一苇对我说：“这次跟着游击队走山路很辛苦，时间虽然浪费，但我们却亲身经历了一次游击队的紧张生活，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农村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状况，思想上受到教育，体力也得到锻炼，还是有收获的。”

我们返回了武汉，三联书店通知我们立即返回香港走水路进入解放区。三联书店租了一艘外国商船，同船有数十名进步学生和教师以及一批民主人士等共 100 多人。经过 8 天 8 夜的海上航行到达天津。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毛主席、党中央已由石家庄到了北平，我们报到地点也改为北平了。

一苇和我 1949 年 3 月 25 日离开天津，3 月 29 日到达北平。我们在三联书店编辑部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刚刚解放了的北平，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一切都要兴建。而经济的建设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科学技术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科技书刊的出版也是当务之急。这年 4 月，由一苇主编的《科学技术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科技杂志。1949 年 7 月由三联书店、重工业部及全国总工会联合建立了科学技术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前身），由一苇任社长兼主编。我调到科技出版社负责书刊的绘图科工作。不久，陈元直、蒋学浚、林家桑等同志陆续从各地调到出版社，充实了编辑工作力量。一苇非常重视团结知识分子，重视人才。在他担任出版社社长期间，继承了革命出版家邹韬奋的优良传统，开展互帮互学活动。他耐心地培养编辑人员，把韬奋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他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联系许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对工矿企业的广大工人读者，创造了许多条件为他们服务，主动把书刊送到他们手里，办理代销及自办发行业务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科技书刊发行量大增，出版社也随着发展壮大了，成绩十分显著。



一苇同志在他的人生路途中，从一个爱国青年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一个出版外行成长为新中国科技出版事业的专家。他的贡献功不可没。如今，一苇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党、为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我是难以忘怀的。



## 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一苇兄

陈佩瑶 周长庆

—

我<sup>①</sup>认识一苇同志是在 1946 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我年纪还很小。一天，我小哥陈然告诉我，说他结识了一位兄长，为人正直，待人厚道，要我跟他一起去看望，并商量一些事情。我就同小哥一道去了一苇家中。

一苇哥全家当时住在重庆枣子岚垭一所非常简陋的屋子里。房间虽小，但很整洁。小哥向他介绍说：“这是我小妹，叫佩瑶，你就叫她小妹吧！”他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坐下，便兴致勃勃地与小哥高谈阔论起来了，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到茅盾的小说《子夜》以及穷苦老百姓的生活和知识青年的苦恼等等，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也无法插话，但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也听出了兄长们渴望翻身解放的共同心愿。他们谈了将近一小时，突然，小哥对我说：“小妹，你在外面坐坐，我和一苇到里屋商量几件事情。你还小，不要听了，以后你会逐渐明白的。”于是他拿了一本叫《彷徨》的杂志给我看，他们就进里屋去了。我那有心思看杂志，总想听听他们在里屋商量些什么？有什么新鲜事要做？他们讲话的声音很低，房门又是掩着的。我

---

① 本文一至三部分中的“我”即陈佩瑶同志。



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听到一苇哥在讲，要马上把读书会组织起来，吸引更多的进步青年；又听小哥说可以搞一个秘密报刊，传播解放区的消息。他们谈完后，高高兴兴地出来，叫我一起吃了饭，我同小哥就一起回到南岸家中去了。

回家后，我问小哥：“你同一苇哥悄悄谈了些什么好事？”他笑着说：“小鬼，你不懂，一苇是个大好人，他懂得很多事，以后就是我们的老师了。我和他商量要组织青年人的读书会，让大家都来读点好书，以后还打算办个报，让老百姓多知道点好消息。这些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到外面乱说。”我听后也就不再细问，但心里觉得他们要干的事肯定是很重要的事。

## 二

1947年夏天，小哥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总是躲在楼上的小屋里干活，他越来越忙。一苇哥也常来我们家。他们总是到小屋里商量事情，关着门，不让我们进去。这段时间，一苇哥和小哥的往来更加频繁，几乎每个星期日和节假日都来我家，有时在我家还住上一夜。我妈妈是个十分善良而仁慈的母亲，她知道一苇同志是小哥最好的朋友，每当看到一苇哥来时，都亲切款待，问寒问暖，从没有一句怨言。一苇哥也同我们一样，亲切地喊我妈妈叫“娘”。当小哥和一苇哥在小屋里关着门干活时，妈妈就拿着针线活到门口去坐着放哨。她总是向小哥说：“你不用管我，到时候我做好饭就叫你们吃饭。”我那时在家帮助妈妈做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商量要办的报纸就是重庆地下党所领导的《挺进报》。一苇同志负责刻写蜡纸，小哥负责油印报纸，这是一份秘密的地下小报。工作地点就设在我家小哥的屋里，通过邮寄和各种关系秘密将小报散发出去。

由于《挺进报》的出版，并且发行量越来越大，迅速传播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号召人民奋起斗争，迎接重庆解放，国民党特务机关十分惊慌，不惜一切力



量要搜索《挺进报》的踪迹，形势变得更紧张了。为了避免投寄《挺进报》被特务发觉，小哥和一苇想了许多办法。有一次小哥叫我：“小鬼，你拿个菜篮子放几封信在菜下面，菜多一点盖住信，到江对面那个邮筒去投递。”一苇哥在旁听后连忙说：“算了，不要叫小女孩子去。”小哥接着说：“没关系，让小鬼去跑两趟，练一练也好。”我当时虽说是个小姑娘，但已有 10 多岁了，嘴里不说，心里还是明白的，当即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吧！我会做好这件事的。”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我把东西捎上，从南岸渡江到重庆的下半城把信发出，又安全回到家中。一苇和小哥见我平安回来，高兴极了，夸我小小年纪会办事了，并许愿说：“下次再过江去，请你到粤香村店吃一回清炖牛肉！”

### 三

1948 年初，《挺进报》一期又一期地从我家中飞向四面八方，传遍整个山城，好像一颗颗炮弹震撼着蒋家王朝的最后一个堡垒。重庆这个国民党的陪都，由于秘密流传的《挺进报》向老百姓披露了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节节胜利和向南方挺进的消息，并戳穿了反动派《中央日报》所谓国军在前线取得辉煌战果的谎言，鼓舞了人民起来迎接解放的斗志。整个山城人心浮动，反动派惊恐不安，更加紧了对《挺进报》的搜查和清剿。重庆特务头子亲自布置并限期破案。

大约是 2 月初的一个傍晚，山城初春的天气还带着严冬后的几分寒意，一苇同志来到我家中，急忙与小哥到楼上小屋里悄悄地商量如何对付特务的搜查，并告诉小哥有叛徒出卖同志的事。他们商量如何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要按上级指示转移和隐蔽。一苇叮嘱小哥，抓紧把最近刻好的蜡纸突击印出来，作好应变准备，尽快按上级指示完成任务。当晚他们通宵没有休息。第二天早上，妈妈做好早饭才把他们叫出来。吃饭时小哥对一苇说：“我自己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如有不测，家中就是小妹年纪还小，怕没人管走



错路。”一苇此刻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亲切地望着我说：“小妹这两年懂事多了，她已逐渐长大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有组织在，就是你我都不在，她也一定会努力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去战斗的。我们的事业是不会中断的。小妹你说是吗？”我听一苇哥用很严肃的语气回我，当时我只是点点头，没有说出什么话。但是，我心里已猜到形势非常紧张了。吃过早饭，我就对小哥说了我的心事。小哥担心的是万一有什么事发生，怕我乱说话。我对小哥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什么事的。上次叫我去寄信，不是完成任务了吗？我不会乱说话的。”此刻，一苇哥正要出门，听了我的话，走到我面前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小妹，你真的懂事了，那我们就放心了。”

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的大搜捕来得很快。不出所料，1948年4月22日傍晚7点钟左右，小哥刚把最后一期《挺进报》印完，特务就包围了我们的住宅。小哥知道出问题了，立即按照他原来的应变措施，推开窗户，准备跳到邻居院里逃走。可是敌人已层层密布，包围了整个楼房。就这样，小哥被特务抓走了。

当小哥被抓走后，还有一名特务留守在住宅楼上“坐坑”，打算再逮捕其他来找小哥的人。这天正是一苇与小哥约好见面的日子。天已黑了，一苇同志匆匆来到我家大门口，正碰上楼下工厂的吴述华师傅。吴师傅急忙对一苇说：“陈先生出事了，楼上还有一个人。”一苇同志凭他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和警觉性，对吴师傅说，他先进城去想办法，急忙转身就走。他逃出虎口后，离开了重庆。我小哥被关押在白公馆，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0月28日被国民党公开枪杀于大坪。

#### 四

一苇同志由重庆逃到香港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安排在生活书店工作。不久，他来信说，1949年3月他们一家已由香港乘船到达北京，“全国解放了，我将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梦寐



以求的伟大革命事业之中，我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我们看到他来信中那种热情奔放、干劲十足的誓言，心中很是高兴，也受到很大鼓舞。

从刀光剑影的地下斗争转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这是一场全新的战斗，一苇同志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日以继夜辛劳地忘我工作，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奉献着。1959年初，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受到降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的处分，下放到基层劳动。消息传来，我们既为之震惊，又感到迷惑不解。一苇同志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正是为了党的事业吗？！怎么会成了“右派”呢？这在我们脑子里始终是个得不出答案的“疑团”，心里也常惦念着他。

1969年趁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路过石家庄，我们去看望一苇全家。这一是出于多年的革命情谊；二是为了解开“右派”的疑团。在“文革”这场大灾难中，他这位“老右派、新黑帮”又受到极大冲击。当时，他刚刚从“牛棚”中解脱出来，他的问题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他原来所任教的财会专业已被撤销，被安排在校办工厂劳动。当我们跨进他家门时，他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和意外，又感到十分高兴。久别重逢的我们和一苇全家自然坐在一起畅谈开来。我们问一苇同志：“你过去受到处分，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吗？”他叹了口气，就激动而又直言不讳地说开了。他十分肯定地讲：“我没有错误，别人说我反党，我骨子里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时把我的党籍开除了，还逼着我承认是‘漏网右派’，这公平吗？这是冤枉！”当他讲到这里时，声音忽然低沉下来，话已哽咽，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充满信心地接着说：“尽管他们开除了我的党籍，但我对党的思想感情是谁也开除不了的。我深信，我们党不会总是像目前这样的。虽然现在有风暴、有雷雨，但总有一天，风暴会过去，雷雨之后是晴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苇同志的这番话，表现了他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心，给人一种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



深刻印象，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8年底，一苇同志来信说：“我20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又到来了。现在已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我要加倍努力地为工业经济的研究工作做贡献，要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去奋斗。”我们立即给他回信表示祝贺，同时也为他20年后得到平反昭雪而感到万分的欣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苇到成都出差。我们见面时，大家都十分高兴。他对我们讲：“中国经济要振兴，只有按照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去做，走改革开放之路，才能迈开大步前进。”我们问他：“怎样改呢？”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个大问题，还需要从实践中探索，一点一滴地做起。”

1980年初，一苇根据他在成都、重庆两地的调查，提出了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的设想，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他到重庆与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实施方案。当时长庆也在省里工作，随省领导到重庆参加这次综合体制改革方案研讨会。讨论时，大家对财政划转、基数的认定、利益的分配、领导关系等几个问题争论较大。会上，一苇同志鲜明地讲了他的观点：“一是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原则，而不能从哪个部门、哪个地区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二是要以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即用经济的办法来打破条块分割，组织专业化协作，不能简单地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三是要简政放权，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给企业较多的自主权，不能‘条条’放了，‘块块’来集中。”对不同意见，一苇同志仔细地听取，并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讨论研究，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了，并且得到国家的批准。后来，一苇同志对我们说：“我参加这次重庆改革的研究，使自己学了不少知识，看来不亲自参与实践，很难了解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就很难提出一些合适的意見。今后还须不懈努力，身体力行，那怕累一点，也一定要参与进去才能找到一些正确答案，



单靠在北京坐办公室搞研究是不行的。”当时一苇同志虽已年过花甲，身体多病，但他一年四季不辞辛劳，始终奔波在祖国各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为党的改革大业勤勤恳恳地工作。

1985年，一苇同志参与组建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并担任常务副会长。他的社会活动更多起来了。一次，在北京我们去看望他，他正为企业深入改革的问题起草一个文件。但他在工作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仍非常热情地抽出时间来与我们叙谈，并很关心四川“三线”企业改革的情况。当我们谈到目前“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发展生产力，重复建设、重复布点，浪费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体制上按“条条块块”分配资金。因此，任何“条条块块”都可以为了局部利益搞自成体系，阻碍企业之间跨部门、跨地区进行横向联合。他听后，认为问题很重要，需要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并提出几条建议，供中央参考。随后，我们写了一份材料给他，他连夜亲自修改，并提出：“一是按‘条块’分配资金改为按项目分配资金；二是遵循经济合理的原则，从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提取适当比例，专门用于经济效益好的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项目。”他将这个建议刊载于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的《内部建议》第2期上面，送到中央领导同志手里。后来，这些建议都被国家采纳。

近10多年来，一苇同志为我国经济改革事业做出了许多突出贡献。如今，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一生为革命，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献身精神，他的创新和拼搏奋斗精神，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风范是永存的。



##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王景乾

蒋一苇是我衷心敬佩的兄长和老师。他的去世，给我带来巨大的悲痛。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3年了，但我对他的思念丝毫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特别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虽然备受病痛折磨，在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的情况下，仍然全心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事业，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仍然顽强地忘我工作，更是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 “我是幸存者，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

1991年寒冬的一天，当我得知一苇兄被确诊患了肺癌，已经住进医院的消息时，顿时头脑一阵轰乱，不知所措。这实在太突然了。这年夏天，他曾因阑尾穿孔住医院手术，出院以后，我见他变得更加消瘦，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对我说：“这次经过全面检查，一切基本正常，没有大的毛病。”显得很有信心。可刚过几个月，怎么就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当时想到，他一定会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变得心情沉重，情绪低落。于是，我立即匆匆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

当我走进病房时，他一见到我，就像往常一样，立即满脸露出亲切而慈祥的笑容，看不出有丝毫紧张、忧虑的表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招呼我坐下，要陈曦大姐拿出香蕉叫我吃，接着便很轻松地对我谈了起来：“本来准备第二天要动身去西安，



到医院来输液，预防出差当中肺气肿病复发，顺带检查了一下身体，不料发现右肺上有个东西。”说罢还像往常一样“嘿嘿”一笑。

我对他这种镇定、安详、若无其事的样子，暗自感到吃惊。他见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便又接着说：“幸好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什么，大概没有转移。现在医学发达，治这种病的办法很多，我打算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不用太担心！”我本想安慰他一下，但听得出，他却安慰起我来了。然后，他话题一转：“其实，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从过去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一生闯过许多次生死关，一次次都过来了。过去同我在一起的陈然、江姐等烈士，为了革命，早早地就牺牲了。他们被关在敌人监狱时，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他们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比起他们来，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这次病房的探视，成了对往事的回忆。他给我谈了当年重庆《挺进报》的被破坏，江姐和陈然的被捕，他自己是如何逃脱敌人魔爪的。我也联想起他以往给我谈过的一些经历，感到他所说的“这一生闯过许多生死关”的话决非虚语。

像一苇兄这样经历了种种生死考验，对生死问题看得如此透彻的人，当目前这种严重疾病来临时，是决不会使他感到惊慌失措的。然而，因为知道来日已经不多，他也不无惆怅地对我说：“可惜，这死还是来得早了点，那怕是再给我两年时间也好哇！”说完，他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出一连串他想做而来不及做的事情。他想以他的《企业本位论》为基础来写一部全面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理论的专著；他想写一部回忆录寄托对过去在一起的战友和烈士们的怀念；他还想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来亲自办好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等等。但是，他认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职工主体论》中所提出的论点和建议，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能够运用于实际。他说，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他提



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具体建议，起先总是要引起很大的争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由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最后才被大家所接受。只有他提出的企业职工主体地位的问题，并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民主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应，有的也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而远没有具体落实。他为此感到焦虑。他说，他只要活一天，就要为此而呼吁。

## 向党的总书记的最后陈词

1991年12月初，我再次去医院看望一苇兄时，他告诉我，昨晚，他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因为在在他入院前，就收到江总书记邀请他参加经济问题座谈会的通知，打算向医院请假去参加。但经一些专家会诊，认为通过手术治疗为好，一苇本人也同意了。这样一来他担心参加不了座谈会，于是他写了这封长信，准备请人带到会上作为书面发言。

他还告诉我，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也曾邀请他参加同样的会议，因出差耽误了。后来他把自己对企业改革的一些看法写成了一份汇报材料呈送给总书记。在建党70周年的前夕，他回想党的历程，展望社会主义现状，心中很有感慨，又给江泽民同志写信谈到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一封信我没有见过，后一封信我后来见到了。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欧发生剧变后，我反复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但我坚信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思想，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它就永远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消失。”而这一次的信，他写的又是什么内容呢？还没有等我提出来，他顺手从桌上的一堆文件中把那封信抽了出来，递到我面前。他那清晰的笔迹，流畅的文词，使我很顺利地一气读完。

许多人都知道，蒋一苇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写起文章来那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常常是一篇上万字的稿件一夜之间完成。写这封给总书记的信，也是这种情况。要是在平时，对他来说本不算什么难事。目前，他在疾病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竟



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在一夜之间写出这么一篇数千字的情理通达的长信，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使人不能不感到敬佩的。而信中的字字句句，更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片赤诚，浸透了忧国忧民的滴滴心血。

他在信中通过分析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真正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实行经济民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比起上一封信来，这封信说得更为深入透彻。他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经济上不去，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二是在政治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他在信中指出：“1980年波兰出现团结工会的时候，我们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际共运的新情况：工人群众自发起来反对自己的先锋队。并且分析原因认为，关键是工人阶级群众长期缺乏当家作主的权利造成的。当时中央书记处曾把马洪同志和我叫去，研究起草第一个职工代表大会条例，马洪同志和我建议在部分企业中试行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同意，并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进行试点。这说明当时吸取波兰教训，抓了职工积极性问题。后来，波兰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表面被压下去，我们对此也逐渐松懈了，新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有意无意都把职工推向类似雇佣者的地位。”

蒋一苇深知自己能为党尽力的时间不多了，但他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心为捍卫社会主义尽自己一份力量。相信我这个少数派的某些思考总会逐步被多数人所赞同。”

当他住进了北京肿瘤医院后，就在决定要手术的前几天，医院又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又发现左肺上也有一个癌瘤，医生认为不适于作手术。听了这个消息，亲友们心头上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而一苇却有点如释重负似地说：“我本来就不主张做手术，现在也好，我可以去中南海参加开会了。”后来他果然如期参加了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按照准备好的内容在会上发了言。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向我高兴地谈到，中央领导认真听取了他的



发言，这就了却了他的一个大心愿。随后，他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补充一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了！”

## 生命不息，拼搏不已

一苇兄以他那年老瘦弱之躯，承担种种繁多的重任，而且常常把每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除了他具有的卓越才能和渊博知识外，主要靠他的勤奋刻苦、顽强拼搏的精神。他常常不分昼夜、不知休止地工作和写作。在他那间1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晚上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甚至到黎明。人们见他如此劳累，常常关切地劝他：“蒋老，要注意身体，细水长流啊！”而他却是风趣地一笑，回答说：“我现在是要有水快流哟！”

“有水快流”，这仅仅是4个字，但其中包含了多少他辛酸的回忆、急切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啊！20载含冤，使他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他希望能够更多地追回来；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发展，作为一位经济专家，他必须及时回答改革开放提出的新任务、新问题；而他自幼培育起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人民解放、祖国富强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更是时刻都在激励他拼搏进取，他怎么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流失那怕一分一秒的时间呢！

人们常常惊异地议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不长的时间里，做了如此大量的工作，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致有的报刊把他称之为“传奇式人物”。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足以使他感到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也该安下心来好好休息和治病了。然而，他却绝不这样想。他所想的是，如何将自己的“生命之水”全部倾注出来，化作雨露甘霖，去滋润社会主义大地，浇灌改革开放之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要像他引以为人生楷模的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将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医院为他做了放射治疗后，已不可能进行更多有效的治疗。许



多亲友、同志、学生从全国各地弄来种种偏方，提出各种治疗的去处和办法，他十分感激，但却无心去认真尝试，连老伴陪他每天去公园做一次气功，他也往往坚持不了。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需要处理的事情、急于要做的工作上了。他不断找人谈话，对他创办和主持的各项事业一一做好安排、交代；他接待曾经答应过的多家报刊记者要求对他进行的采访；他要去参加早就安排的会议和作报告；他还要完成许许多多的约稿；他也没有忘记入院之初医院领导曾请他为党员讲一次党课。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他每天都按时赶到人民大会堂和代表们讨论国家大事，晚上回到医院还要作发言准备。他在代表团会议上关于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发言和在大会上《关于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五项建议》的发言，引起到会代表的重视和欢迎，并由会议专门印成了简报和文件。他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提出要加快我国立法工作和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后来，人大常委作出了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决定，使他在病中感到分外欣悦。《深圳商报》的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发表长篇通讯，热情地报导了他为此奔走呼吁的详细情况。

一苇兄极其关注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个他认为关系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一有机会他就大声疾呼。

199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新华社专讯，标题是：《蒋一苇在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说：工会法应突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其中详叙了他的发言内容。他说：“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抓企业改革试点，但在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他建议《工会法》要把“组织教育职工群众行使民主管理权利，履行作为主人翁的义务与责任”，列为工会在公有制企业里的首要任务或中心任务。这样工会就会在推动企业民主管理、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上发挥更大的



作用。

当时，全国各地还兴起了一阵“破三铁”的热潮。对此，他提出了不尽相同的主张，于1992年3月14日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破“三铁”之我见》的文章。他提出：一个企业可以有合同工、临时工，但必须有一批对企业忠心耿耿而且做贡献的骨干，被企业授予终身职工。这种有条件的铁饭碗不但符合社会主义职工当家做主的原则，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原则。接着，他又以《劳动人事制度要改革，破“三铁”之风不宜刮》为题，将前面文章的内容作为内部反映与建议报送了中央领导。不久《中国机电报》记者来病房就“三铁”问题对他进行采访，事后记者写了一篇通讯《蒋一苇抱病直言：都无安全感，工厂依靠谁？》在该报上发表。

此后，蒋一苇对职工地位问题的呼吁仍然没有停止。1992年5月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他的《搞活企业要治本》，5月19日《中国劳动报》又发表了他的《为职工的主体地位疾呼》。

一苇兄在这段时间里，还对经济领域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写作和发表了许多篇文章，仅我所知就有这样一些：《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香港《现代中国经济》1992年第1期）；《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改革》1992年第3期）；《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1992年第3期）；《坚持改革，配合改革，开拓新的金融业务》（《新金融》1992年第3期）；《谁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内部反映与建议》1992年第3期）；《论怎样看待股份制》（《中外管理》1992年第3期）；《政企分开是企业改革的基础》（台湾《中国时报》1992年3月4日）；《关于股份制的若干认识问题》（《人民日报》1992年5月29日）。

从一苇兄发病住院到1992年6月这半年多时间，他以重病之身竟然做了这么许多工作，简直使人感到难以思议。可想而知，在这期间，他的头脑里所想的仍然都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



运、利益，而他自己个人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 对往事的回忆

1992年7月以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癌瘤转移到腿部，引起剧烈疼痛。这时，他已转到中日友好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放疗后，腿痛得到减轻，而身体已变得十分虚弱，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了。他再也不能外出活动或伏案写作，可还是没有完全停止工作，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常常见他请来一些同志在床前商谈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指导他的博士生撰写论文和专著。上海《文汇报》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对他的访谈录，发表前他坐在床上对原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最使我难忘的是，就在他病情不断加重，后来连说话也十分吃力的情况下，还坚持在10多天的时间里，每天用一个小时对我谈了他的一些经历。早在几年以前，我曾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叙述他一生的曲折经历。他说，他自己没有多少好写的，但要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和事写一写，还是很有意思。他说工作很忙，要我协助他，他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可惜的是，那时这个打算只是开了一下头，因他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作罢了。这次在他发病之初，我们又谈起这件事，打算在住院期间继续进行，但由于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顾不过来。直到1992年8月份，我们都心里明白，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的心情很矛盾：要他再谈吧，这对他实在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影响他难得的休息；不谈吧，他的某些经历和想法可能永远就不能被人所知了。后来，还是他自己下决心要做完这件事，于是在病床上展开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这次他谈的内容也不算多，但至少解决了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人们不理解，他以花甲之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开始他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怎么会很快就发表了像《企业本位论》这样一篇又一篇的重要论著呢？他的一些理论观点和主张为什么经实践检验证明又是如此正确呢？他对我国工业经



济和企业管理的一些历史和现实情况为什么有那样全面深入的了解呢？一句话，他的“一鸣惊人”的成就是来之于偶然呢，还是长期努力的结果？经过他这次谈话，在对建国以后这段经历的回忆中，追述了他在将近30年时间里，几乎从未间断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的调查了解与研究，他的理论和主张的提出，完全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

他的回忆谈话开始是比较顺利的，每天上午等他做完治疗，便把床头摇起来，让他半躺着。我把录音机放在床头，他便开始讲述。他回忆的内容虽然涉及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方面，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建国后这个时期里同企业打交道的情况。过后不久，因为病情的恶化，不得不再次中断，也是永远地中断了。

### 最后的一篇遗言

在一苇兄生命垂危的日子里，有两件事使他表现出欣慰、激动和充满感激之情，一是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前来探视和对他的关怀；二是蒋一苇经济思想评论会的召开。

一天上午，护士来通知说：“医院领导要来看望蒋老。”不一会儿，医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来到病房，亲切地询问病情之后告诉一苇兄说：“朱镕基副总理很关心蒋老的病情，亲自打电话给卫生部陈敏章部长，要求尽一切努力进行治疗。陈敏章部长向医院转达了朱副总理的意见，并且提出了具体措施。院里成立了专家治疗组，专门对蒋老的病情进行研究和治疗。请蒋老放心，好好休养。”还献上了一束鲜花摆在床前。这时，病房里充满了一股温暖、祥和的气氛。一苇兄面露笑容对两位院领导表示了谢意。

此时，我们对院领导说，不久蒋一苇经济思想评论会将在北京召开，蒋老希望届时到会与大家见见面。他们立即表示：“可以，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保证满足蒋老的这一要求。”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共同组织的“蒋一苇经济思想评论会”召开前几天，一苇兄希望自己



能参加这次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特别是有不同观点的意见。但由于病情的发展，他又担心这一愿望难以实现。

没过多久，他的痔疮严重发作，肿胀疼痛，流血不止。经治疗流血止住了，但炎肿难以消除，别说坐起来，就是仰卧也得用套圈垫在股下。接着又是发烧、咳嗽、心悸。会期已经临近，但已无法参加了。会议组织同志提出要他讲几句话，录下音来到会上放。可是由于病情的加重，他连说几句话的气力也没有了，经常是闭着眼，喘着气，忍受着全身的疼痛。我每天把录音机带到病房，坐在他床前守候，等待病情有所转机。这样过了4天、5天，情况依然。

临开会前的最后一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又到了病房。他躺在床上，让我喂了点水，把他外衣穿上，接着便无力地闭着双眼，看来浑身有说不出的难受。过了一会，他突然睁亮了眼睛说，躺着不好讲，要我扶他下床坐到桌边讲。他坐定以后，我打开录音机，他直了直身子，把右臂支在桌上，两眼扫视着前方，脸上露了平常的笑容，好像前面就是坐满人的会场。“我向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声音那么响亮、那么自然，我不禁暗暗吃惊。“今天，大家针对我的一些观点，系统地提出意见，这是难得的机会。”他对10多年来帮助过他的同志，如吕东、马洪、袁宝华和工经所的许多同志一一表示感谢。接着，他介绍了他的改革思想的特点、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越讲越有精神，完全不像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从企业本位论出发，论述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机制是以企业为本位，企业内部又是以职工为主体，最后归结说：“整个社会主义特色是民主经济或者说经济民主。”他仍然不忘反复强调职工的地位：“我认为，在企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职工是否处于主体地位。如果本企业职工觉得企业的权和利与自己无关，就将会大大损害社会主义的特色。……”

最后，他语重心长、满怀热情地对理论界寄予希望：“我们搞



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支队伍结合，一支是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

说完后，他问我：“怎么样？”我兴奋地说：“好极了，声音好，内容也好！”我把他扶回床上躺下，他面带满意的微笑闭上眼睛，再也无力说什么了。

第二天开会，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新闻工作者聚集一堂，吕东、袁宝华、马洪、刘国光、高尚全、陈清泰、林凌、纪中、周叔莲等同志也都出席了。大家把自己的论文打印成册带到会上，每人都分得满满的一大袋。会议刚开始，就预示着成果的丰硕。然而，每个与会者都神色严峻，脸上充满怅然若失的表情，蒋一苇没有来到他们中间。可是，当他的录音讲话播放时，会上气氛似乎立即变了，大家的心情为之一振，有的人细声议论：“蒋老的精神还这么好啊！”他们也许没有料到，这是蒋一苇留给他们的最后一篇遗言。



## 忆青少年时期的鄂哥

蒋 真

我的胞兄蒋一苇，原名蒋炜，1920年2月诞生于湖北武昌，所以他的乳名叫“鄂生”，我也就一直称呼他“鄂哥”。鄂哥的一生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曾遭受不公正待遇20年。历尽坎坷的一生。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没有退缩；身处逆境，他从不灰心丧气，仍然顽强地活着，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但是，多么遗憾，1978年落实政策后，生命仅仅赋予他15个年头。悲痛之余，回首往事，无限惆怅！如今，鄂哥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经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鄂哥从小聪慧过人。他爱好自然科学，非常崇拜爱迪生，一心想当发明家；对文学、美术、摄影等，也有广泛的兴趣。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仅有一小间房子，鄂哥一人就占了两张桌子，一张是学习用的，堆着书籍，另一张方桌上经常摆满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不让我动。我记得有采集的标本，还有石头，还有什么会转动的小玩意儿等等。大约是鄂哥上初一时，国内第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科学画报》出版了，鄂哥就把他的一个改装自行车的“小发明”寄了去，结果在《读者信箱》中登出了鄂哥的信和编辑的答复，详细讲解了为什么不可行的道理。鄂哥在航空机械学校学习时，因对改进飞机投弹装置提出合理化建议而受到嘉奖。鄂哥这一辈子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能成就他的自然科学梦，但勤于思考、肯于钻研的精神却伴随着他一生。



在小学念书的时候，鄂哥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在福州学校里举办演讲会，他还当选为演讲员，登台演讲，上街宣传。在汉口特三区小学上五年级时，他才 12 岁，就与其他两位同学办起了黑板报“报国周刊”，每周出一期，挂在学校大门口的马路边。当时可稀罕了，看的人真不少。中学阶段，鄂哥所在的武汉市一中是武汉唯一的一所公立中学，老师多是北大毕业的。有位教美术、音乐的老师思想进步，经常介绍鄂哥阅读《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积极宣传抗日。1935 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鄂哥上初三，在高中同学的带领下，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抗议等活动。

那时家里经济困难，父亲经常失业，鄂哥和我的学费常常要靠亲友支援，鄂哥就开始写稿，想拿点稿费。武汉《大同日报》办了一个《儿童周刊》，他想他是中学生，已不是儿童，就用我的名字投稿，如《我的小花圃》等，还有漫画《穷孩子》，这是连续画；还往武汉《新民报》副刊投稿，发表了童话《蚂蚁国游记》。《武汉日报》有个副刊叫《鹦鹉周》，是武汉大学文学系办的，鄂哥足足投了五十篇稿，居然登了一篇题为《考试》的稿子，得了一块大洋的稿费。领稿费时，报社的会计还以为他是替大人领的哩。拿到这些稿费，鄂哥十分高兴。虽然家里经济困难，但我们的母亲十分开明，从不要鄂哥的稿费。这样，他就用稿费买他自己所喜爱的书籍等东西。

记得 1936 年初的一天，鄂哥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说，茅盾等一些著名作家发起要出版《中国之一日》一书，定为 1936 年 5 月 21 日这一天，不管什么内容都可以写。他鼓励我也写。5 月 21 日这一天，正好吴伯母来家，谈起怕打起仗来要有防毒面具的事，因此鄂哥就写了《怕毒气》一文。我呢，因为家里常常让我去向亲友们借钱，因此鄂哥说：“你就写《告借》吧。”当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说：“我怕写不好。”鄂哥说：“你可以试试看，



我帮你修改。”这样，我就写了，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他写的。没想到这两篇文章都被选用了。当时武汉地区一共才选上三篇。鄂哥原想这本书的稿费一定会多点，但出于意外却没有稿费，而是给当选作者每人赠送《中国之一日》书一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两本厚厚的《中国之一日》。正好鄂哥有一位同学要买，鄂哥就卖给他一本，得了3元钱。这3元钱在当时来说，还是可以买个像样的东西。鄂哥就用这钱买了个柯达照相机，实现了他学习摄影的愿望。一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我跑了个第一名。鄂哥挺高兴，回家来就让我垫上小板凳，站在床前，拉下蚊帐做背景。他说：“来，给你照张像，留个纪念。”至今，这张小小的照片还保留在我的相册里。

初中毕业后，在“科学救国”、“航空救国”这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鄂哥报考了航空机械学校。抗战爆发后，敌机经常来轰炸，学校附近有汉奸放信号弹给敌机指示目标。鄂哥发现后还去追捕。修飞机场的民工惨遭虐待，生病死亡都没人管。鄂哥和同学们都非常气愤，大家捐钱慰问民工，并出墙报揭露当局的虐待，上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与当局展开斗争。毕业后，他就成了国民党航空站的一名机械士。在国民党空军里他仍是一名“不安份”的士兵。在国民党空军里，官兵地位十分悬殊，当官的天天鸡鸭鱼肉，但士兵的伙食却很差，鄂哥对此非常不满，思想上也很苦闷。这时他看《生活周刊》是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就给邹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空军里的黑暗面和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后来竟收到了邹先生一封长达7000字的回信，使鄂哥深受感动。他初步理解了什么是阶级。鄂哥把邹先生的信给周围的同事看了，大家也深受教育。在空军里，鄂哥把那些当官的叫做“大帽花”，当兵的叫做“小帽花”（因为当官的帽徽比当兵的大）。他认为，“小帽花”阶级应当像邹韬奋先生信中所说的那样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大帽花”阶级展开斗争。于是，他和原航空机械学校毕业的机械士成立了一个“机校校友会”组织。大家推



选鄂哥为负责人之一。他们组织机械士开展读书、歌咏、演剧等活动，还出版会刊，编印《技术青年通讯》，发往全国各地的航空站，团结广大的机械士。但不久，国民党在航空站成立了“政治部”，宣布“机校校友会”为非法组织，强令其解散。这时，鄂哥与几位要好的机械士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柳州的青年俱乐部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这里，鄂哥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并阅读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步报刊，思想上初步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皖南事变后，鄂哥对国民党的反动与腐败越来越不满，决心脱离国民党空军。1941年2月，他与四位志同道合的机械士一起利用派他们去成都受训的机会，集体逃离了国民党空军。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通缉和追捕，鄂哥改名蒋一苇，躲在友人家中数月不敢外出。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友人家里日夜自修改读高中课程。这年9月，他报考广西大学。鄂哥起先以为自己没上高中，恐怕考不上，因此，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榜。回家后，我和母亲都急切地问他考上了没有。他欣喜地说：“考上了。你们猜，我考了个第几名？”我说：“准是最后一名”。他哈哈大笑说：“我看榜也是从最后一名往前看，一直看不见我的名字，没想到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是第一名！”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哥考了个第一名！”这时邻居们都来为鄂哥祝贺。就这样，他上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当时，学校的助学金仅仅够饭钱，没钱买菜，鄂哥就在课余帮别人抄稿子，以维持自己的生活。1942年初，我初中毕业后，因家中十分困难，不得不暂时休学去工作，挣些钱支援哥哥上大学。鄂哥上了一年大学，就不得已也休学一年，到一所中学教书，让我继续上高中。1943年鄂哥又重回广西大学上二年级，直到1944年夏天，由于日寇入侵广西，我们不得不中断学业，与母亲一起逃难。

我们从桂林途经柳州、宜山、六寨、独山到贵阳，整整跑了三四个月。沿途，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死的、淹死的、冻死的、被敌机炸死的……真是惨不忍睹。一路上，还



常碰见国民党败兵抢老百姓的财物。鄂哥最心爱的一支钢笔也被他们抢走了。在几个月的逃难中的所见所闻，使鄂哥对国民党的腐败更加愤慨，因此，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于是，他决心要找共产党。我们逃到贵阳后，住在难民所里，下一步到何处去？父亲主张去昆明找亲戚。鄂哥决意去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社。就这样，我们于1944年底到了重庆。

1945年2月，鄂哥经友人介绍，到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当了一名职员。这时，鄂哥化名蒋国栋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万言信”，要求加入共产党。不几天，《新华日报》登出一则广告：“国栋先生：×月×日请到化龙桥编辑部一叙。”鄂哥去了后，接见他的是新华社负责《群众周刊》的林平（即林默涵）同志。林平同志鼓励鄂哥多给报社写稿。以后每到星期天，鄂哥就去报社与林平叙谈。这样，鄂哥从此就在新华日报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我们一家从桂林逃难到重庆后，全家五口人只剩下一条破棉絮。当时在重庆找一份工作也很不容易，我只好暂时到离重庆几百里的璧山县工作，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重庆。这时，经鄂哥友人的介绍，有两个工作可由我选择：一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二是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从工资待遇来看，航空委员会要高些。但是鄂哥劝我去“劳协”工作。他说：“‘劳协’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关怀下的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是为工人群众谋福利的，团结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航委会工资虽高些，但我们不能再给国民党干了。”我听后，觉得鄂哥说得有道理，便欣然同意。于当年10月，我就去“劳协”工作了。事后我才知道，介绍我去“劳协”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何思贤同志。

在“劳协”，我们在大的纱厂为女工办托儿所，以托儿所为据点接近女工，为她们读报，讲时事，动员她们参加“劳协”，还组织她们和男工一起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等。鄂哥总是鼓励我多与女工们接近，了解她们的疾苦，



多关心她们。在罢工期间，我偷偷穿梭于工人宿舍间，做鼓动工作。有时也遇到一些坏人拿石头袭击我们，我也不害怕，心想我是为工人谋福利的，是光明正大的。1946年8月6日，国民党武装“接收”“劳协”的工人福利社，当时我们福利社的全体同志和工人积极分子22人被捕入狱，这就是中国工运史上有名的“八·六事件”。我与福利社的其他同志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我们。通过这次斗争，使我在政治上成熟了许多。

抗战胜利后，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解散了，鄂哥和几位同事领到了一笔遣散费。这时，他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这笔遣散费办起了《科学与生活》杂志。后来，这个杂志停办了，他们又办起了《彷徨》杂志。

1947年2月，《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鄂哥他们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决心继续办好《彷徨》杂志。另外，他们还利用香港新华社给他们寄来的通讯稿，编印了一个无名小报，在进步群众中散发，传播党的声音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后来，他们与重庆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办的这个小报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并取名《挺进报》。这年的12月31日，鄂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宣传委员（特支书记为刘鎔铸同志，组织委员为陈然同志）。

《挺进报》是在十分秘密的条件下编印、传递和散发的。鄂哥也让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让我把《挺进报》偷偷传给我的朋友、《新民报》的记者张子敏，通过他又将《挺进报》传给他在《新民报》的一些进步群众，使更多的人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使他们深受鼓舞，对革命即将胜利充满了信心。

1948年4月初，鄂哥接到上级指示，说党内有位重要领导人被捕，敌人怀疑他是《挺进报》的负责人，所以要他们赶快出一期《挺进报》寄给敌特机关，说明《挺进报》还在，来掩护被捕的领导同志。4月中旬，上级又指示他们准备转移，先是决定让鄂



哥暂时隐蔽一段时间，规定一个星期为期，如果决定撤，一个星期内陈然去找鄂哥一起转移；如果一星期内陈然未去找鄂哥，说明形势还稳定，鄂哥就必须在第八天回到陈然家。在鄂哥离开期间，由吕品同志代替他刻蜡版。继续出《挺进报》。这样，鄂哥就按约定到北碚唐自杰那里暂住。

4月22日下午3点多钟，陈然到我工作的工矿公司来找我，问：“你哥来过吗？”我说：“没有来过。”他说：“你哥如果来了，就让他晚上到我家来。”后来我才知道，陈然接到一封署名“彭云”的信，信中写道：“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显然这是暗示他立即转移。但陈然对这封信有些犹疑，打算等鄂哥来后商量再决定行动，所以他没有立即转移。

果然，在我快下班时，鄂哥按事先约定的日期返回重庆。他没敢直接回家，先来找我，叫我打电话把嫂子从家里叫出来。嫂子来后，说家里没事。到晚上8点多，鄂哥才去野猫溪找陈然。他万没想到，由于叛徒的出卖，就在他到陈然家的一个多小时之前，陈然已经被捕了，而且还有特务在陈然家守着，准备逮捕其他来找陈然的同志。当鄂哥走到陈然家时，刚一敲门，一个叫吴述华的工人打开门，对鄂哥说：“陈先生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老太太要跳楼，你赶快上去劝劝吧！”鄂哥问：“他们还留人没有？”吴述华说：“还有一个在楼上守着。”鄂哥说：“那我先进城设法营救陈先生。”说完转身离开陈然家。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在一个朋友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回到江北从外边给我打电话，问家里出事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就叫我赶快把嫂子叫出来。嫂子出来后，他就让嫂子马上通知吕品和王诗维两位同志转移。

鄂哥这期间在他的同学蒋学浚那里躲避。他已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就打算去香港找党组织，因为香港有新华社。蒋学浚有个老乡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正好要送一批新兵到武汉去。蒋学浚就对他说，鄂哥是武汉人，回家没有路费了，托他帮忙把鄂



哥带到武汉。于是，鄂哥就穿上一身国民党军装，化装成上士文书，随着送新兵的船去了武汉，然后又转辗到了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汇报了《挺进报》被破坏的情况。党组织安排他到生活书店工作。1949年3月，鄂哥调到北京工作。

鄂哥不仅是我的兄长，而且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一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如今，他虽然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为革命献身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和儿女们的心中。



# 他把生命付与春天

## ——怀念我的舅舅

张 汝

舅舅走了，没有留下遗嘱。我想是舅舅一直相信他会好起来。他在病中曾安慰妈妈说，他们兄妹俩命大，小时候在武昌，北伐战争时，一颗流弹从他们兄妹之间穿过，竟谁也没有伤着。舅舅不怕死，他说要说死，他早已死过好几回了。但他从未绝望。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大年初一），他还让看看哪天立春，他是在数着日子坚持。他深信会像他一生历尽坎坷，然而却一次次迎来春天那样，这一次他同样能熬过寒冬，一俟春天到来，他的生命将重新复苏。

舅舅是不甘心这样走的。他最大的遗憾是在最需要他大干的时候，他却病倒了。他至死都没有卸下他肩负着的沉重历史感和责任感。舅舅常说，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正是无数浪花聚集起来，卷起汹涌的大潮。当舅舅被确诊患了癌症时，党的“十四大”正在紧张筹备，命运的残酷对舅舅来说似乎远远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使舅舅痛失了一次推动历史发展的有利时机。所有的人都劝他休息，劝他细水长流，他却说，现在恰恰不能休息，要有水快流。于是他抱病写给党中央的建议，抱病出席重要会议，抱病走上讲台……医生、护士不能理解，私下里议论他是“工作狂”。要知道，播种的人怎么能拒绝收获的诱惑呢！

只要药物能暂时控制住病痛，舅舅就依然是那个精神矍铄、侃



侃而谈的舅舅。1992年国庆节，我和爱人带着上初中的女儿楠楠去看他。那天，舅舅刚输过血，气色显得挺好。他躺着吸着氧，却能像往常一样和我们讨论问题。舅舅有4个孙子，就缺女孩，所以舅舅一向喜欢楠楠。他不厌其烦地对楠楠从经济学的ABC讲起。楠楠也特别乐意向舅爷爷谈她所学到的那点知识。她告诉舅爷爷在政治课上老师是怎么讲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听完楠楠的讲述，舅舅满意地说：“你们的政治老师可以打满分。”舅舅鼓励楠楠将来学经济：“安安（舅舅的大孙子）太老实，竞争场上肯定是输家，还是学医吧……楠楠将来就接舅爷爷的班吧……。”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舅舅的精力终于被耗尽了。看到舅舅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想到舅舅沧桑的一生，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淌。记得“文革”中，我曾从东北插队的地方到石家庄去看望舅舅，那时舅舅刚从“牛棚”中出来不久，也像这样苍老、虚弱。石家庄的冬天并不冷，可是舅舅却抵挡不住，穿着很厚的大衣。我忍不住要搀扶着他走……那是我第一次在尊敬之外感受到舅舅的慈祥。这一次在舅舅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可以偎依在舅舅身边，用脸颊轻贴着他的脸，抚摸着他那肿了起来、布满血丝、再也扎不进针去的手，我多想再听听舅舅对我长谈啊！想起这些年难得见上舅舅一面，每年春节要打电话问好舅舅在家的一两个小时，奔到古城去看他，为的是听舅舅给我们讲讲……。以后让我们再上哪儿去寻那充满睿智、富于哲理的谈话和亲切的教诲呢？

我和两个弟弟从小就崇拜舅舅，即使是在舅舅被打成“右派”的年月，也没有动摇。每当我们生活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上遇到问题，或是人生道路上需要选择时，就写信向舅舅请教。这时，不管舅舅多忙，都会给我们写一封长长的回信。至今我的日记本上还保留着舅舅看过后用红笔做的记号、写的评语。“文革”中，舅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有察觉，他从“牛棚”出来后，就用通信的方式组织我们两家的孩子学习马列原著。他为我们制定



了一个“基本理论知识自学计划”，编写了辅导材料，然后用工整的楷书复写出来，分别寄给我们，还要求我们学习后写出体会向他汇报。他一再告诉我们，要用“马列是怎么讲的”、“工人农民是怎么看的”、“生产发展了没有”这三条标准来观察现实，作出判断。舅舅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正是舅舅给予了我们永不枯竭的政治营养，将使我们获益终身。

当他患绝症时，我一直期待着奇迹。因为我太相信蕴藏在舅舅羸弱身躯中那顽强的生命力和喷薄的创造力了。好心的朋友为舅舅请来气功师，我多么希望会像有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出现五彩的光环啊！第一次抢救那天正是冬至，我多么希望会像有的人所预言的那样闯过了冬至就会有转机啊！现在，舅舅走了，然而舅舅畅言和力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不可逆转，舅舅为创建和推进付出毕生精力的社会主义事业春光正好。舅舅的生命与春天共生，并将永存。亲爱的舅舅，安息吧！你那追求光明、不屈不挠的伟大战士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我心目中的父亲

蒋 方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3 年了。3 年来，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使我永生难忘。

###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给我们讲述他参加革命，与陈然叔叔一起办《挺进报》的故事。那时，在父亲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陈然叔叔的遗像。每年 10 月 28 日这天，父亲就把我们兄妹几个召集在陈然叔叔像前，母亲在遗像下挂上几束花，全家人向陈然叔叔遗像三鞠躬，默哀一分钟。然后父亲就给我们讲陈然叔叔在全国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油印《挺进报》，向处在白色恐怖下的人们传播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舞人们坚持斗争、迎接解放。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陈然叔叔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关进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陈然叔叔英勇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1949 年 10 月 28 日这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父亲讲完后总要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今天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都是千千万万个像陈然叔叔这样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们应当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努力学习，积极要求进步，长大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 年的冬天，母亲突然告诉我们说，她要调到河南省机械



厅工作，让我们4个子女都跟她一起离开北京去郑州。父亲把家中的书拉到旧书店，还有4个书柜全卖了，共卖了300多元交给母亲。当时我才11岁，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郑州后，没有宿舍，母亲只好带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过了3个月，父亲也从一机部下放到郑州中国第二砂轮厂工作。父亲住在单身宿舍，半年后，我们全家才住进砂轮厂给的家属宿舍。

当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拿回一本刚出版的小说《红岩》给我看。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就读完了这本厚厚的小说。父亲告诉我，小说里的成岗实际上就是陈然叔叔，江雪琴就是江竹筠，我们大家都叫她江姐，他们都是父亲在重庆搞地下斗争时的战友。《红岩》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成岗、江姐以及《挺进报》的故事人人皆知。那时，我也为自己的父亲办过《挺进报》而感到骄傲，于是就在同学们面前大讲特讲：我爸爸和陈然一起印《挺进报》，江姐下乡时还把她的孩子云儿放在我家，让我妈帮她照看，等等。同学们都羡慕我有这么一位革命的父亲。这年正好学校搞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学生开展家访活动。同学们提议到我家来请父亲讲《挺进报》的故事，我满口答应了。晚上回到家，我对父亲说，明天同学们要来家请他讲办《挺进报》的事。没想到父亲听了，脸色沉了下来，埋怨说：“你们老师为什么不事先征得家长的同意，就让同学来呢？”看来，父亲是不大愿意接待同学们，这真使我感到意外。我着急地说：“可是同学们明天一早就来了，现在通知他们别来也来不及了，怎么办？”父亲想了想，说：“既然你们同学已经约好了明天来，那我就只讲陈然叔叔的故事，不讲我自己。”我这才放下心来。

尽管第二天父亲满足了同学们的愿望，使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父亲与陈然叔叔一起办《挺进报》的这段革命经历是光荣的，为什么父亲不愿给我的同学们讲呢？

直到初中毕业那年，我心中的这个谜团才解开了，我才明白



了父亲的苦衷。原来，父亲在 1959 年被打成了“漏网右派”，受到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的处分。当时因为我年纪小，父母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我的老师和同学也不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否则怎么会来我们家进行家访呢？

这年暑假的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们兄妹几个叫到他跟前，如实地讲述了他 1959 年初被打成“右派”的经过。

1957 年我党开展整风运动，父亲是一机部整风办公室理论组副组长。一直到反右运动结束，父亲并不是“右派”。1958 年初，反右运动结束后，党内又开展了一次“交心运动”，即进行自我思想检查。当时宣布“交心运动”是内部问题，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自己检查认识了错误，组织上就不予追究和处分。父亲作为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经支部大会讨论，大家认为他认识得比较好，通过了他的检查。“交心运动”之后，他还受部领导的委托代表部领导到河南去慰问一机部下放那里农村搞“公社化”的干部。回来后，又去西山劳动锻炼了 1 个月。劳动结束他刚回到部里，就突然宣布他停职反省，要他交待与科普协会“彭庆昭反党集团”的关系（父亲曾在 1953 年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时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彭庆昭是科普协会党组书记）。这一下可把父亲弄懵了，他根本不知道“彭庆昭反党集团”是怎么回事。父亲申辩说，他与彭庆昭在科普协会只是工作关系，他没有参加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反党活动。这时，有人便把父亲在“交心运动”中检查并已经支部大会通过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也拿出来批判，还把他从党内转到党外，交给群众批判。在“左”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什么“三不政策”就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然而，搞了 9 个月，审来审去，也没有查出父亲同“彭庆昭反党集团”有什么联系（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才知道，所谓“彭庆昭反党集团”也纯属冤案）。有些人不甘心，就从父亲写



过的几篇文章中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话，硬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给父亲罗列的“罪状”主要有3条：

第一条“罪状”是“吹嘘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8年6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父亲写的一篇题为《谈谈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一切革命斗争的胜利，决定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技术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光荣事业，它的力量源泉同样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技术革命这个伟大任务既然主要依靠劳动群众，那么知识分子还有没有作用呢？知识分子在这个革命斗争中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父亲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将回到生产，回到劳动人民中去，成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可以发挥三大作用：一是总结、提高作用；二是普及、推广作用；三是先锋、桥梁作用。这些话被诬为“吹嘘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二条“罪状”是“污蔑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不懂科学，实质上是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1957年科普协会的一次学习会上，父亲讲了科普宣传工作的方向问题。因为当时有人认为“科学普及只是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还有人认为只有农村需要普及科学知识，而工厂则不需要普及科学知识。父亲在这个讲话中指出，各条战线的各类人员都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工业企业里不仅干部要学科学知识，而且工人群众也要学科学知识；否则，不懂科学知识，就会在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中走弯路。例如，有的工人想发明永动机，但实际上永动机是根本造不出来的，因为它违背科学原理（这个讲话后来以《科学普及工作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题发表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1957年第7期上）。父亲的这些话被说成是“污蔑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不懂科学”，并硬说父亲的这些话“实质上是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

第三条“罪状”是“攻击群众运动是一阵风，只开花不结



果”。

1957年父亲在《学习》杂志第八期发表的一篇题为《企业工作中的群众运动问题》的文章中谈到，几年来工业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群众运动，成绩是很大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运动“一阵风”问题。他指出，不少企业常常是运动一来，一切工作都为了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是运动一过去也就烟消云散，一切如旧了。所以，不少企业的行政领导和管理部门，对于在企业中开展群众运动不太感兴趣，他们怀疑在大工业生产中是否能够靠运动来开展工作。父亲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搞运动，而在于如何使群众运动与日常的企业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父亲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父亲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要解决现实存在的“运动是一阵风，过去就一切如旧”的不正常现象，却被歪曲为“攻击群众运动是一阵风、只开花不结果”。

1959年3月，根据这三条“罪状”，就把父亲定为“漏网右派分子”，并给予“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的处分。父亲要求找部领导申辩，也被拒绝了。最后，父亲要求留在党内，他说：“降职降级降薪再重些也没什么，只是开除党籍这一条，我无法接受。”父亲从内心里根本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同意把自己开除出党。但在“左”的路线占上风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要求都被无理拒绝了，并强迫他在处分结论上签了字。

听完父亲讲的这段不幸遭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家离开北京到郑州，是因为父亲被定为“右派”。怪不得父亲不愿意给我的同学们讲他过去办《挺进报》的事。从这时起，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在思想上长期处于苦闷和抑郁之中。看到我这样，父亲就开导我：“这些年来，我内心也十分痛苦，因为我的‘右派’问题使你们在政治上受到牵连。但你们千万不要因此悲观失望，还是应当继续努力学习，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 忍辱负重，忠心不移

父亲下放到郑州中国第二砂轮厂工作之后，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九车间去与工人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对我们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改造世界观很重要。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按毛主席说的，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父亲在九车间与工人群众一起劳动，逐步加深了与工人群众的思想感情，结交了许多工人朋友。记得那时每逢周末的晚上，常有工人师傅来我家串门，同父亲一起谈工作，聊家常。父亲还放唱片给他们听。工人们爱听豫剧，父亲就专门买了几张常香玉的唱片，他们可喜欢听了，简直百听不厌。有些工人师傅不识字，经常找父亲帮他们写家信。父亲就利用业余时间办起扫盲班，帮助工人学文化。这些不识字的工人师傅在扫盲班学习了几个月，就能自己写家信了，他们都十分高兴地夸父亲办了一件大好事。

父亲还帮助车间搞起了班组经济核算。过去工人领工具、材料和劳动保护用品也不记帐。父亲创造了“本票核算法”，他印了一些带面值的“本票”发给各班组。工人领工具、材料和劳保用品时要按价付“钱”（即本票），到月底算帐，看各班组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各班组之间展开了竞赛，看谁节约得多。这样，工人群众就开始注意节约，例如手套破了，补一补再戴，能不领就尽量不领，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后来，这个办法被一机部发现了，部领导十分重视。父亲所在的班组组长还参加了一机部召开的全国先进班组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搞的“本票核算法”，受到大会的好评并予以推广。

父亲的工作经常受到车间领导的表扬。父亲说，九车间的李锦文书记很信任他，让他帮忙写车间、支部的工作总结。不久，厂里为了落实《工业七十条》，把父亲调到厂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父亲为全厂整理制定了500多项规章制度，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和



好评。

1961年冬，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并没有恢复党籍。他对1959年给他的这个处分，感到十分冤枉和委屈。他觉得自己对党一直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却没想到会被打成“右派”。把他开除出党，更使他痛苦万分。他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党组织重新审议并正确处理他的问题，让自己回到党的队伍。

1962年夏季的一天，砂轮厂政治部的领导突然把他找去，告诉他：“中央现在正在对以往运动中搞错的人进行甄别平反。从你的材料看，算不上是‘右派’。但你的组织关系在一机部，厂里无权处理。你可以向部里提出申诉。”听了这个消息，父亲十分高兴，觉得自己的冤屈有希望得到平反了。他急忙请假到北京，向一机部提交了申诉书。当时，一机部领导同意受理他的申诉，但告诉他，现在正对反右倾运动的错案进行甄别，然后才处理反右运动的问题，要他先回厂里等候通知。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去部里催问，答复说还要再等等。后来，他连写了几封信催问，竟石沉大海，不给答复了。父亲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厂政治部，才知道，由于彭德怀要求平反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都已经停止了。就这样，原来答应要给父亲平反的事也就落空了。

尽管平反冤案的希望没有实现，但父亲并没有消沉，没有自暴自弃。他继续埋头工作，抓紧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虽然他人不在党组织里，但他仍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1964年夏，父亲调到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财会专业主任。父亲对财会专业的教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他的倡议下联合了长春、保定、镇江等一些学校的教师，共同重新编写了新的企业管理教材。在教学上，他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生要掌握好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了加强财会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增加了珠算课和习字课，使学生学会打大小两种算



盘，记帐写字要力求工整规范。他还组织学生到校办工厂去实习锻炼，帮助校办厂“算活帐”，大大提高了学生实际工作的本领。所以，1965 和 1966 这两年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企业工作后，都很受欢迎。

当父亲听说校办工厂因为管理混乱，生产上不去，连年亏损，受到一机部的批评时，他就带着几个教师到校办工厂去帮助整顿。他大胆地提出开展“百、千、万”节约活动（“百”就是徒工和一般人员减少低值易耗品，每年节约一百元；“千”就是技术工人减少废品，提高产量，采购人员减少采购失误和出差次数，计划调度员及时下达计划，合理调度，减少停工待料，每年节约一千元；“万”就是设计人员减少设计失误，每年节约一万元）。这个活动经工厂领导采纳和推行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整顿后使校办工厂转亏为盈，成为石家庄市有名的富裕户，很受学校领导的赞赏。

“文革”前的这两年，父亲除了忙于教学，抓校办工厂的生产整顿外，还利用夜间空闲时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常常学习到深夜。我们要他注意身体，他说：“解放前搞地下斗争，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解放后才开始系统学习。打成‘右派’后，就更要勤奋学习，越学越觉得马列主义确实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我政治上受了冤屈和打击，但无法使我不相信真理。”

## 十年浩劫中的磨难

1966 年的夏天，父亲仍在电机制造学校工作。一场颠倒乾坤的政治灾难降临到中国亿万人民头上。曾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当然也难逃这场浩劫带来的恶运。

这年，我在石家庄第六中学上高中，平时住在学校。“文革”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看到家里一片狼藉，门口、墙上、甚至桌子、板凳上都贴上了大标语，什么“只许左派造反，不



许右派翻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邓拓走卒”等等。母亲神情忧伤地告诉我，父亲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了，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邓拓走卒”。“为什么说他是邓拓走卒？”我奇怪地问。母亲说：“前些日子批判‘三家村’，你爸说他认识邓拓，还说邓拓书法挺好，于是‘造反派’就给他扣上‘邓拓走卒’的帽子。”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去年为了让会计班的学生练写字，与语文老师王育华编了一个习字教材。“文革”开始后，有人贴大字报，把教材中本来互不相连的字硬拼凑在一起，组成什么“国民党好”、“青天白日旗”等语句，说教材是“黑话”，这就成了批斗父亲的又一个依据。母亲还说，这些天“造反派”三番五次来抄家。这个“战斗队”刚抄完走了，另一个“战斗队”又来接着抄，把家里的许多书籍、相册、唱片都抄走了，说是“封、资、修的毒草”。父亲在香港时戴过的一条旧领带，解放后一直没用，扔在皮箱里，被翻了出来，说是“四旧”，还有父亲用来锻炼身体的太极剑也被当成暗藏的武器抄走了。“造反派”每次来都把父亲书架上的书乱翻一通，撒满一地。等他们走后，爷爷和小弟再拾到书架上，每天都要折腾到深夜才能去睡。最可惜的是父亲十分喜欢听的中外古典乐曲包括全套贝多芬交响乐的唱片，都被当作“毒草”抄走了，拿到刚下过大雨的操场上砸得粉碎，还叫父亲去清扫。碎唱片陷在烂泥里，父亲只得从烂泥地里将碎唱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扔进垃圾堆。

不久，我再回家时，母亲告诉我，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不许回家，也不让她给父亲送衣物，只允许小弟弟去送东西。“黑帮队”的人都集中在学校食堂吃饭，父亲写了张字条让弟弟拿回来，说是要粮票，因为“造反派”强迫他们每天干重活。食堂的菜少，又没有油，父亲只得靠多吃点窝头来顶饿。他自己那点儿定量不够吃，可是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票，母亲为这事很发愁，我们全家人只好尽量少吃点儿，匀出一些粮票给父亲。

后来听父亲讲，他被关进“牛棚”后，受尽了各种残酷的折



磨。每天早上，“黑帮分子”都要站在毛主席塑像前长时间地弯腰低头“请罪”，如果受不了，稍动一动，就会被皮带狠狠抽打一顿。每天晚上要到“造反派”那里“汇报”，去的时候，必须从门外爬进门内，不这样做，也要挨一顿皮带的抽打。有一次，“造反派”审问父亲，命令父亲站在板凳上，头上放两块砖，手提两桶水，问话不答，就把父亲连人带桶踢倒在地。他们还哈哈大笑地叫嚣：“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

1967年初，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所谓“抓叛徒”的高潮。江青信口开河，胡说：“罗广斌是叛徒，小说《红岩》是叛徒写叛徒！”“造反派”听说后，便给父亲又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他们审问父亲说：“《挺进报》被破坏后，你为什么跑到香港去了？你不是叛徒是什么？！”父亲当然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于是，“造反派”便说父亲“不老实交待问题”，马上又是一顿毒打。

父亲成了“黑帮”，我们一家人也遭了罪。80岁的爷爷有高血压病，眼睛看不清，被当成“黑帮家属”拉去批斗。我和弟弟、妹妹都被列入“黑八类子女”，政治上倍受歧视。小弟正上小学，一些同学骂他是“黑帮崽子”，用石块砸他，把墨水泼到他身上，吓得他好长时间不敢去上学。母亲也受到批斗。她说，有一次“造反派”来抄家，发现一本历史书上有刘少奇的照片，就训斥说：“让你们烧掉刘少奇的照片，为什么还偷偷保留着？”于是就把她拉去批斗。过了几天又说母亲有“特务嫌疑”，要隔离审查，就把她关起来，不让回家，每天让她打扫女生宿舍的厕所。母亲被折磨得病倒了，后来才放她回家。

196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由于大专院校搞运动停止招生，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当工人。恰好，我所在的国棉一厂的“工宣队”这时进驻了电校，其中有几个“工宣队”队员是我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他们回来对我说：“你爸爸是个有才干的人，还应该发挥他的特长啊！”他们对学校的“造反派”折磨人的行为十分反感，有的工人师傅说：“党的政策不是说



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怎么能乱打人呢？”在“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后，才逐渐制止了“造反派”那些折磨人的残酷行为。

1969年夏天，经过电校专案组的调查，证实父亲的问题与原来历史档案中的结论是一致的，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什么“叛徒”、“黑话”、“邓拓走卒”等罪名都不成立了），这才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父亲才从“牛棚”中解放出来，被安排在校办工厂劳动，他拉小车，当转序工，还管理半成品库，有时还上车床车些小零件活。

1971年9月林彪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有所好转，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父亲白天在校办工厂生产科工作，晚上仍抓紧时间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钻研毛主席著作。他编辑了《矛盾论参考》和《实践论参考》。他认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另外，父亲还注意结合自己在校办工厂搞管理的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出一套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理论。他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工业企业管理概论》的书稿。但由于他是“右派”，出版社不给出版。但他对我们说：“这几十年搞革命，使我形成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想方设法，主动做些有益于革命的事。客观条件不允许，那没办法，但不放弃主观努力。如果主观不去努力，一旦客观条件变化了，条件允许了，那时又能贡献什么呢？主观努力了，如果客观条件不变，仍然没有有效力的机会，自己也问心无愧。”父亲就是这样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依然要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提出要加强和整顿企业管理。父亲便向学院（这时电校已改为“河北机电学院”），提出恢复财会专业的要求，没有得到省教委的同意。但父亲一心要为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做贡献，于是他就和几位财会专业的教师冲破种种阻力，走出校门，协助市机械局和市总工会举办了数千人



次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大大提高了市机械系统企业干部的管理水平，受到市机械局领导和企业广大干部的欢迎和好评。

这期间，父亲从老朋友那里得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落实政策，对“文革”和过去历次运动中搞错的人予以甄别平反的消息后，他又一次向一机部提出了申诉。一机部接受了他的申诉，要他等候处理。

然而，邓小平同志所采取的种种整顿措施，都受到江青一伙的疯狂反对。1975年冬天，他们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自发地组织悼念活动。在北京，许多群众自发地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悼念周总理。而“四人帮”却下令不准群众搞悼念活动，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清明节前夕，北京的群众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再次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和挽联，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父亲得知这一情况，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以北京的妹妹病重为借口，请了假，在4月3日一清早去了北京。

4月7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从电台的广播里听到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并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电台广播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里，我们知道“四人帮”在4月5日晚上对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担心，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不是在那里被“四人帮”抓走了。

过了两天，父亲悄悄地从北京回来了，我们才放下心来。父亲心情十分激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还拿出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抄的几首声讨“四人帮”的诗词给我们看。他说，4月4日那天，他和几个老战友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栏杆上、树枝上挂满了白花。



花圈上贴了不少声讨“四人帮”的诗词，他也抄了好几首。4月5日上午，他们又去了广场，发现花圈、挽联都被收走了。人民群众非常气愤，与执勤的民兵发生了冲突。愤怒的群众烧毁了“四人帮”派去的广播车。那天下午父亲回到亲戚家，所以晚上“四人帮”镇压纪念碑前的群众时，他并不在那里。

父亲对我们说，他这次在北京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他告诉我们：“现在政治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毛主席也病重了，他老人家如有不测，江青一伙正要趁机夺权，那样中国就要搞第二次革命，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你们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但他又说：“现在人民群众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即使江青一伙得逞，日子也长不了，终究要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倒。”

天安门事件之后，父亲仍坚持去市机械局办企业管理培训班。但形势却越来越恶劣，“四人帮”一伙更加疯狂地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停了下来。在这种情势下，父亲的申诉被退回学院，说是不再处理。于是，父亲又被扣上“企图翻案”的罪名，勒令他作出深刻检查，准备接受批判，并要他立即停止去市机械局办培训班，让他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乡劳动。父亲义正词严地表示：“党员对党组织的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这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有什么错？至于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认为不合适。”市机械局领导听说学院要父亲下乡劳动，立即亲自到学院来交涉，学院才不得不让父亲继续去培训班讲课。

回顾以往的经历和遭遇，并联想起1962年因批判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致使自己的申诉未成，父亲对我们说：“我的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我的冤案就没有平反的希望。两次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阻碍了对我的平反。错误路线害了多少无辜的好人啊！”



## 拨乱反正，重见天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的铁拳所粉碎。这一消息传来，我们全家人都欢欣鼓舞。父亲把我们几个儿女都叫回家，全家人共同举杯祝贺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一切工作都转入正轨。这时，一机部孙友余副部长把父亲借调到部里，协助搞企业整顿，特别是企业的质量管理整顿，要求在两年内把一机部系统的企业厂长培训一遍，并拨给1万元作为差旅费。由父亲牵头，和其他几所工科院校的教师组织一个巡回讲课的工作组，奔赴各省市，进行紧张的企业管理培训工作。这期间，一机部还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准备去日本考察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请父亲也参加。然而，当机电学院把父亲出国考察的申请报到省里时，据说某个省领导不同意，说什么：“右派怎么还能出国？”不批准父亲参加出国考察。父亲说：“你们看，要多做点工作是多么艰难啊！”

1978年，中央决定重新开始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父亲再一次向一机部提出了申诉。这年9月，父亲尚未平反就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同年12月，正当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在中央组织部的关怀和催促下，父亲20年的冤案，才终于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的党籍。从此，父亲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当我得知这一喜讯时，高兴得一夜没睡。多年来一直笼罩在我心中的那层阴影终于消失了，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伟大胜利，为父亲获得政治上的新生而欢呼！

##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鼓舞下，父亲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在这十几年里，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建议。他的主张和建议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有的主张和建议还被政府



及有关部门所采纳，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更突出的贡献。1986年底，他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召开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时，他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开幕的那天，当我们全家人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父亲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年来，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得到这样高的荣誉。

1990年春节，我回北京看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有肺气肿病，上三层楼就气喘吁吁，还心跳过速，经常感冒发烧。白天工作那样忙，晚上还要写文章，常常熬到深夜。我劝他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晚上早些休息。他却对我说，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多了，要补回耽误掉的那20年，就要抓紧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991年冬天，父亲咳嗽得厉害，去医院治疗。医生在给他做检查时发现他患了肺癌，让他住院。医生背着父亲通知了我们。我们都十分震惊。过了几天，父亲觉得咳嗽好些了，就要求出院，医生不同意。父亲对医生讲了他的经历和愿望，取得了医生的同情，医生才告诉他患了肺癌。当父亲知道自己患了肺癌，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更加拼命工作。他一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面把病房当成办公室，在医生不来查房和治疗时，就干起工作来。有的同志来向他咨询或是记者采访，他都热情接待，兴致勃勃地与他们交谈。他还常常向医生请假外出作学术报告，参加人大会议，出席中央召开的专家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后，他深受鼓舞，急忙请假回到《改革》杂志社主持召开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的理论研讨会。医生们对父亲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都无奈地戏称他是个“工作狂”。

父亲病重期间，我经常请假来北京陪伴他。这段时间是我与父亲相处最长、理解最深的日子，也是我内心最痛苦的日子。我看到父亲身患绝症，仍忘我工作，心中十分担忧，劝他多休息。他却轻松地对我说：“没关系，我是过五关斩六将过来的人，虽然是



肺癌并不可怕，也不觉得疼痛，不影响干工作。”

父亲的癌瘤在肺部左右两边都有，医生无法用手术切除，只能采取放射和药物治疗来延长他的寿命。因此，父亲抱着多活几年，多做贡献的希望，与癌魔作顽强的斗争。他对医生和亲友们说：“想到陈然、江姐这些牺牲的战友，我现在活到 70 多岁，已经够幸运的了。但我还要多活几年，因为许多工作要做。”

1992 年春节，医生同意父亲出院回家过年。他要写四个条幅给我们留作纪念。我便给父亲准备好笔、墨和纸。他满怀深情地在纸上写下：“历史洪流亿万年，迂回曲折奔向东，大江后浪推前浪，激起层层浪花涌，但愿在前进的浪花里做一粒闪光的水珠。”

三个月后，父亲的癌瘤转移到腿骨，疼痛难忍，他又住进了医院。经过放射治疗，疼痛才有所抑制。党的“十四大”召开后，父亲对我说：“方方，我想写一篇关于市场经济与企业深化改革的文章。我来讲，你来录音、整理，我修改后再送去给报社……。”我安慰他说：“爸爸，您现在喘得厉害，医生要您少说话。等过些天，您好些了再讲，我一定能整理好录音。您就放心吧！”但是，没过几天，父亲的心脏病突发，抢救之后，他整天整夜离不开吸氧和输液，但他仍然惦念着写那篇文章以及他那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工作……。

不幸的日子终于降临了。1993 年 1 月 25 日清晨，病魔终于夺走了我亲爱的父亲的生命。我为失去最最敬爱的父亲而悲痛万分。

回想父亲这几十年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逆境中不灰心、不气馁、不消沉、忍辱负重，仍忠心耿耿地尽力为党多做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又热情忘我地拼搏，做出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精神。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珍贵的遗产——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忠心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爸爸，您安息吧！我们会永远牢记您的嘱咐，在历史洪流前进的浪花里做一粒闪光的水珠。



## 爷爷永远活在我心中

蒋华安

亲爱的爷爷离开我快3年了，我非常想念他。我小时候，因为母亲有病，把我从农村送到石家庄，由爷爷、奶奶照管我。整整18个春秋，我都是生活在爷爷身边。虽然小时候我没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仍然感到生活的温暖和快乐。我感谢爷爷给了我一个难忘的美好童年。

在我刚刚开始朦胧的记忆中，爷爷每天下班回来，我坐在门前等候他。他总要牵着我的小手，逗着我玩，让我拉着他绕过他的双腿打转转儿。他还学几声猫咪叫，我哈哈笑，爷爷也哈哈笑。一天傍晚，爷爷回来，手里提的包还没放下我就扑向他，他一只手拉着我又是打转转，奶奶看见突然叫了起来：“哟，你不能用一只手拉孩子呀！”爷爷赶忙扔下包，把我抱了起来，抚摸我的手腕。晚饭时，爷爷看我低着头不想吃饭，他又握着我的手问我疼吗？我点点头，眼泪流了满脸。爷爷急忙放下碗筷，把我抱到邻居刘才爷爷家，对刘爷爷说：“小安的手腕又脱臼了，是我不小心用力拉的，请您给治治。”刘爷爷望着我说：“好孩子，不要怕疼，我揉一下就会好的。”果然，刘爷爷掐了我的手几下子就不疼了。从这次起，爷爷再不敢一只手拉我了。但他还是常常学猫儿叫逗我玩耍。爷爷每晚在我睡觉前，总是指着我的肋骨说：“看你这个小瘦猴，像根小排骨，不锻炼怎么行呢？”从那时起，我每天早起都到院子里跑步，一年下来，我的体格逐渐好起来，爷爷很高兴地对



我说：“安安快像个男子汉了！”

记得我们从石家庄搬来北京，当时住在爷爷的办公室里。有时爷爷早上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爷爷刚把我送到幼儿园门口，我撒谎说要撒尿，乘机往回跑，爷爷在后面追了很久才把我拉回来。那时爷爷工作很忙，我还给他添乱。提起这事，我很后悔，感到很不应该。日后爷爷说起这事时，竟笑得合不拢嘴，他夸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用得好呀！”当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刚上小学的那年暑假，爷爷有一周的休假。他带我去了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那蓝色无边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海滩上许多的小贝壳和小石子，我乐坏了。那天爷爷兴致勃勃，换上了游泳裤，带着我走到海边。他说要教我游泳，先把我放在橡皮圈里，他走向深水时，可是海水只泡到他的胸前，他停住了，站了一会就往沙滩上走，在沙滩上坐下了。我问他：“爷爷，您怎么不下来啦？您不教我游了吗？”爷爷没做声，我又问他：“爷爷，您会游泳吗？”他笑了笑说：“我从前在漓江里游，还在长江里游，能游好几千米远哩！现在老了，不行了，下水就心慌。”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招待所，爷爷晚上写文章到深夜才去睡。第二天清早，爷爷对我说：“安安，我不能教你游泳了，家里我还有许多事，咱们还是回去吧！”爷爷见我不大高兴，便急忙说：“下次让叔叔带你再来玩吧！”一个星期的休假，只玩了一天就回了北京。我真为这次爷爷没有休好假感到太可惜了！

198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明明和鹏鹏弟弟都由石家庄来北京过暑假。爷爷很关心我们的暑假生活。他要我带头做一个暑期生活计划。我们兄弟3人各自都写了自己的计划。按时作息，按时完成作业，每天练习写字和写日记，还有室外体育锻炼。这年暑假过得很有规律。暑期结束时，爷爷还检查了我们的作业。在我们写的大字本上划上不少的红圈圈。我们在客厅里还布置了一个小型暑期作业展览会，把我们写的字挂满了一屋子。星期天全家



开了评奖晚会，由爷爷主持会，他还夸我们说：“都表现不错，有始有终，成绩很好。”记得爷爷还奖给我们每人一个漂亮的笔记本。这个暑假大家过得很愉快！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毕业的那年。我毕业考试的分数只差一分半，达不到升重点初中的分数线。当时，邻居的徐阿姨来对奶奶说要帮助我们去找区里领导，她说：“蒋一苇老师是区里的顾问，说说就会照顾进重点中学的。”爷爷知道这事后，坚决不让去找区领导。爷爷对我说：“安安，学习好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不能靠走后门，你说对不对？”我说：“对的，不上重点也可以。”我想，爷爷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读初中的3年过程中，在爷爷的教导下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后来初中毕业时考上了重点高中。

1985年，爷爷去西欧5国考察，他知道我喜欢集邮，就每到一处都给我写回来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这些信我至今还保存得很好。我重读这些信，心中感到格外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幸福的童年。当时才10岁的我，能收到爷爷从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寄给我的信，还有我从未见过的那些图案鲜艳的邮票，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和值得骄傲的事啊！

爷爷每次到外地出差回来常常给我带些小礼物，漂亮的铅笔盒或是望远镜，但最多的是送给我的课外书，有《安徒生童话选》、《十万个为什么》、《西游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我常借给同学看。爷爷还给我做了一个小书架。他常对我说：“学习很重要，但不要读死书。要利用课余时间看课外书，很有好处，可以增添许多知识。”我上初中以后，作业很多，但我总要找点时间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上高中以后，作业就更多了，我简直找不出一点时间去读课外书了，一股脑儿埋在课本里。我常常想起爷爷对我说的“不要死读书”这句话。怎样才能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在我脑子里是个难题，我很想找爷爷请教这个难题。可我只有星期天才回家，爷爷总是忙于工作，关门在书房里写文章，晚上还



常常要去办公室加夜班。我也就不愿去打扰他了。

1991年的暑假，爷爷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幸好及时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他住院时，我和叔叔、婶婶、弟弟轮流在医院照顾他。记得我曾给爷爷做过一碗鸡蛋面，那面难吃得很，可他还是吃了下去，并且还耐心地教我怎样才能做得好吃一些。他出院还不到20天就又开始工作。他到丹东讲学，去南京开会，还去了徐州、新沂等地讲学，还领代表团去了韩国，只短短的3个月，爷爷马不停蹄，东奔西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我们真为他的身体担心。他从韩国回来时，我去机场接他，看他脸色很不好，对我说：“爷爷，您太辛苦了，回家要多休息。您做过手术以后也没有好好休息，您太累了。”他笑着对我说：“阑尾切除是小手术，切了就没事了，出差也不累，飞机去，飞机回，我在途中还能睡觉呢，没事！”不久，他又要去西安参加会。因为中央领导要请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他才退了去西安的机票。

这年冬天，爷爷不幸患了肺癌。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忧虑不安。爷爷对自己的病却非常镇静自如。我去医院看他，他对我说：“肺癌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能切除就切除，不能切除就用保守疗法，吃中药，有很多人都治好了，我会好的。”我看到爷爷对自己的绝症毫不畏惧的样子，心里虽很佩服他，但也很为他担心。爷爷那虚弱的身子能闯得过这一关吗？

在爷爷重病住院一年多的日子里，医生们采取各种治疗，千方百计，西药、中草药、放疗等等办法，只能延缓爷爷的生命，病情只能短时得到控制，可是，爷爷的体质一天天下降。我常常在星期日去医院陪他。爷爷总是一心牵挂着他的许多工作。他每天除了治疗，还要看报纸。床头旁边的包里还有许多文件和资料，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和同志每天都有。他也都热情地接待来看望他的人。1992年11月，爷爷的病更恶化了。当我看他骨瘦如柴，每顿饭只吃那么小半碗流汁的食品，有时只吃一点儿水果，整天有10多个钟头是吊瓶输液。他的双手肿得很大，已不能扎进针了。护



士给他改换在脚背上扎针输液，每次在脚上扎针时都很困难，脚背也肿得高高的，而爷爷仍非常耐心地配合护士给他治疗。每次他都要对医生和护士说几句感谢的话。爷爷艰难地与病魔在搏斗，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希望自己能好起来。有一天他突然心跳过速，晕了过去，经医生抢救后逐渐好一些，我们全家人都焦愁万分。我更是盼着爷爷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爷爷在严冬时只有靠每周输两次血浆来勉强维持着。我星期天去陪伴他，坐在他的床前，他握着我的手，久久地望着我，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他想对我说什么又没能说出来。他的目光还是那么有神，那是一种期待的目光，看得出这是他对我的最后的嘱托。我贴近爷爷的耳边，轻声对他说：“爷爷您不要着急，我快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我成绩还不错，我放了假就天天来陪您。”爷爷对我微笑着点点头！

1993年的春节初一早晨，我和弟弟们去医院给爷爷拜年。他见我们4兄弟站在他床前向他祝春节好，勉强坐起来慢慢向我们说：“放假了，好好去玩玩吧！”还把枕边准备好的4个小红包分给我们。初三那天早晨再去医院时，爷爷终于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此刻我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我不能失去亲爱的爷爷！可他终于离开了我，爷爷走得太急了，走得太快了！

向爷爷遗体告别的那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的大厅里，爷爷安详地、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我看到许多人带着沉痛的面容来向爷爷作最后的告别。此刻，我禁不住热泪滚滚，失声痛哭。我大声地哭喊着：“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看不见您了！”但爷爷再也听不见我的呼唤了。爷爷，我是多么希望您再回来啊！爷爷，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您就匆匆离开了我。您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爱，许许多多的教诲。您得病后给我们写的那封信里，嘱咐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真正有用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爷爷，我会永远牢记您的话。亲爱的爷爷，您安息吧！我绝不会辜负您的心愿！



## 社会主义的前途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感谢中央领导的信任，去年7月曾两次邀我参加经济问题座谈会，我因出差在外未能到会。回京后，曾写了一份“汇报提纲”，谈了我对企业改革的一些看法。这次又邀请我参加这个座谈会，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向领导陈述一些个人浅见。但不巧，这几天又住院检查，可能还要动手术，万一参加不了，请把我的发言提纲在会上念一念，以供领导参考。

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感触最深。我今年71周岁，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亲眼看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但做梦也不会想到，到了我们晚年，竟然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发生了剧变。此时此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苏东剧变的教训，从中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启示，实在是太必要了。下面谈几点我个人的见解：

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很多：有内因，有外因；有近因，有远因；有诱发原因，有根本原因。关键是如何在这个纷纭繁杂的现象中，找出它的根本问题，才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航程中掌握正确的航向。

现在，我们在宣传上有一种意见，强调苏东剧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这的确是造成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光讲这一点，或者过分强调这一点，说服力是不

---

\* 本文是蒋一苇同志在199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蒋一苇去世后发表于《改革》1993年第2期，题目是《改革》编辑部加的。



够的。因为人们很容易反问：“帝国主义会演变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演变他们呢？”这就需要从更深层次的问题找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某些人的倒行逆施看成是主要原因。当然这类人物的言行起了重大作用，但过分强调这个作用也说不太通：为什么东欧、苏联的人民群众多数支持和赞成这种变化？是什么客观条件驱使他们选择了歧途？

“和平演变”、“自由化”等意识形态问题是丝毫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但是分析一个重大历史现象，还不能把它当成决定性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事实胜于雄辩，根本原因还必须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去寻找。

1989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从各种材料分析，我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经济上不去，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二是在政治上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采取苏联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说绝对不好。解放初期集中运用有限的资源，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建设，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排斥商品经济……等等，造成经济僵化，束缚了企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东欧某些国家虽然进行了体制改革，但并没有找到一条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真正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路子，特别是苏联长期反对改革，也阻碍东欧的改革。而资本主义国家从60年代以来，生产、科技有很大发展，两相比较，差距明显，这个现实给人民群众心里留下了阴影，才使“和平演变”有隙可乘。

我国之所以能顶住这股逆流，关键就在于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变。如果没有这个现实的存在，再喊多少口号也是没用的。老百姓中流传一句话很公允：“左不满，右不满，回家一看还是满。”

在政治上，苏联、东欧各国党政官僚化都比较严重，先锋队的党脱离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南斯拉夫虽然搞“工人自治”，1985



年我去考察过，他们的理论很好，但具体做法有很多问题，结果工人群众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企业还是受政府直接控制，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党和国家也存在某些官僚化、脱离群众的情况，但有一个很不同的情况，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掌握了生产主动权。这实质上是实行了“经济民主”，它比政治民主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而它又是政治民主的基础。有了这条，决定了8亿农民的态度。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的实施必将进一步巩固农民对党的信心。

在职工群众，包括产业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内的职工群众方面，我认为工作做得不够。这里要讲一点历史过程：1980年波兰出现团结工会的时候，我们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际共运的新情况：工人群众自发起来反对自己的先锋队。并且分析原因认为，关键是工人阶级群众长期缺乏当家作主的权利造成的。当时中央书记处曾把马洪同志和我叫去，研究和起草第一个职工代表大会条例。马洪同志和我建议在部分企业中试行职业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同意，并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进行试点。这说明当时吸取波兰教训抓了职工积极性问题。后来，波兰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表面上被压下去，我们对此也逐渐松懈了，新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有意无意都把职工推向类似雇佣者的地位（如实行厂长个人承包、工人合同制等等）。这些年，我到处呼吁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但人微言轻，始终是少数派。今年5月我发表了《职工主体论》，受到工会系统的广泛欢迎，但我的主张与现行体制是矛盾的。今天我重病在身，再一次向党呼吁，希望认真考虑我在《职工主体论》中所提的建议。如有不同看法，允许我解释或答辩，最好是在少数企业进行试点，用实践来检查真理。如果广大职工群众能把企业作为自己的命运共同体，体会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就有了牢靠的阶级基础，所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不会成为一句空洞的



口号。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采取的对策也就十分明显：一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经济进一步搞上去；二是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采取具体措施，增强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党的向心力、凝聚力。

但这两件大事都涉及理论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受到挑战。苏东政权的失败，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否客观存在？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是姓“社”、姓“资”、还是姓“中”？诸如此类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既要以实践的事实来回答，也需要用发展了的系统的理论来回答。

我们党这十多年在理论上有两大突破：一是明确社会主义还必须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还只是在工作报告或公报中作了简要的论述，没有展开成为系统的理论。鉴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必要在这个基础上，并根据江总书记在党的 7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文化作出比较完整的理论阐述，或者先集中力量把社会主义经济这部分弄出来。这对于指导国内实践和回击国际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都有重大意义。

要做的这件事是件大事，需要及时抓，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挑选一批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有造诣、对现实又了解的同志，人数不要多，成立个研究小组，脱产来抓这件事。如果先搞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先搞这个小组。

第二，研究要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有个初步意见，就开扩大的讨论会，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中央领导同志最好也参加，在这样的内部会上，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百家争鸣。



第三，如果讨论中出现大的分歧，可以分成两个小组，各自把意见系统化，并用实践或实例加以验证。最后由中央拍板选哪一种作为正面的宣传纲要，或者取长补短合成一个统一的论述。

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我还想向中央提两点不一定正确的建议：

第一，希望中央继续提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老传统。如果真决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所发展，需要把那些有较深造诣的同志动员出来参与。有些同志即使出了点毛病，是否就把他扔在一边？甚至某刊物发表一篇他的无所谓的文章，编辑人员就受到追查。我认为这种极左的做法，对党是不利的。如果我们扩大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同志也请来。

第二，希望中央继续保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传统，更多地研究策略问题。前不久发表《人权白皮书》，这一着棋非常好。如果资本主义口口声声讲人权，我们来个针锋相对“反人权”，那就太傻了。我们有我们的人权观，大讲我们主张的人权，这才是真正的针锋相对。

由此我想，对出走的人可以作些调查、分析，如果没有什罪行而想回来的，欢迎他们回来。有些人还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开关于理论的扩大讨论会，是否也可以请他们回来参加，而且允许他们开完会还回外国去。如果采取这种策略，对外可以打那些喊叫人权的人的耳光。对那些出走的人本人来说，也会促使其转变，也许“浪子回头金不换”哩！

因为病，不能多写，许多意思无法表达清楚。我衷心希望党的“十四大”能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91年12月5日夜于空军总医院



# 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 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sup>\*</sup>

## ——应当有科学的历史观

东欧、苏联发生剧变之后，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几乎异口同声，一致宣称：“社会主义彻底完蛋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近似乎有些有识之士，开始对上面这样简单的结论划上了问号。

作出“社会主义彻底完蛋”的结论，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其中一两个，而是好几个发生了剧变；十月革命诞生地的苏联，经历 70 多年的历史，也宣告瓦解。既然新老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同样的灾难，难道不是“事实胜于雄辩”，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上存在吗？

可惜，这只是一个庸俗的“现象逻辑学”，不是科学的历史观。用出现的历史现象，不作具体分析，而作出简单的逻辑推理，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是有足够的迷惑力的。但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就显得缺乏科学的论证了。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能等于社会主义失败吗？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苏联在内，它的所作所为并不都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比方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的结果是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但是都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能够把平均主义的错误归罪

\* 本文原载香港《现代中国经济》1992 年第 1 期。



于社会主义吗？再说公有制，更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但是把公有制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造成种种弊端，应该说也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正是需要进行改革的体制问题。也不能简单得出结论：公有制=低效率。

第二，正由于上述错误的历史观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学者、政治家出于主观愿望，都预测中国必然步原苏联的后尘，社会主义的旗帜也打不长的。可是历史事实并没有帮这些预言家的忙。中国在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经济进一步发展了，成为“没有排队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严肃的学者，应该认真而具体分析一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尽管它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毕竟有它成功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科学分析后，会发现社会主义有它固有的优越性，只是在错误的体制下显现不出来。

第三，我们姑且退一万步，假设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垮台了，是不是就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从此在地球上永远消灭呢？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出来的，它是近代工人阶级意识的体现。当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兴起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以后出现了。如果又回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的时代，当然是历史的巨大曲折。但是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潮就不可能泯灭。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迟早还要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谁能说这样的历史逻辑不存在呢？

新春寄语海内外经济学人，希望大家共同思考一下科学的历史观问题。



## 关于企业改革的系统思考<sup>\*</sup>

增强企业活力，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现在，七中全会和发展纲要都再一次明确提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到2000年，跨入21世纪，这都会是中心课题。这就说明了两点：一是搞好企业确实很重要，经过1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不抓企业这个环节，整个改革是没有依托的；二是要真正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所以还要继续探索，甚至到21世纪。

中央工作会议对企业怎样进一步搞活，怎样进一步改革，提出了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共20条。这20条主要是针对现实的情况和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紧迫的措施。怎样全面地、从根本上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改革，光靠这20条还不够，其根本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问题。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前提下，企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一套什么样的制度，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这里谈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思考。

### 一

第一，关于“放权让利”问题。我认为，这四个字是产品经济的概念，不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理论上有错误，也不大符合实际。改革开始我们搞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就称之为“放权”。“权”有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都

\* 本文是蒋一苇同志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上作的报告摘编稿，原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简称为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这是“权力”。中央集权太多了，地方没权，那就应“放权”；如果地方权力太大，成了“诸侯割据”，那就要“收权”，集中到中央，以免尾大不掉。“放权”应是这个意思，即“下放权力”。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再下放给企业，但企业不是政府机构，不掌握政权。按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原则，企业是经济实体，没有行政权力。政府机构与经济实体完全是两码事。但过去把企业看作是政府附属机构，整个政权组织是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基层，企业成为政府结构中的基层，是第三等级。这是产品经济观念，在商品生产中是错误的。企业没有权力，但有“权利”。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与国家的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有权利，也有义务。比如《企业法》中就规定了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权力”下放和上收问题。因此，确立企业的权利，应是“立权”，而不是放权；或者说是把企业固有的“权利”建立起来，应该叫“还权”，还其本来面目，是立权和还权的问题，不存在放权的问题。概念混淆，作法就不一样了。由于把“权利”当作“权力”，这几年企业的自主权，一会儿放，一会儿收。如果是权利和义务就不存在放和收的问题了。特别是经济遇到困难时，一个个红头文件纷纷收权。《企业法》规定企业有 13 种权利，现在没有完整的统计，据北京市说，真正落实的只有 1 条半，11 条半没有落实。这怎么能讲放权过了头呢？我的看法是远远没有过头。

“让利”概念也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谁让给谁？国家或财政部把利让给企业？利从何来？假若是外国送一批利给财政部，比如说 100 亿，让 50 亿给企业，这才叫让利。利是企业上缴的，它上缴给你，你让什么？本来上缴 50 亿，现在少要一点，只上缴 40 亿，这不叫让利，这是减免税利。因为利不是个固定不变的量，会增长或减少，有的还可能亏。严格讲，让利也是个产品经济的观念，因为在产品经济下，企业的利 100% 上交给国家，少上交就像是国家让给企业。我这样讲似乎是搞理论的好抠概念，但中国的



事，抠抠概念也是需要的，很多事吃亏就在概念不清。去年工经协会受计委委托调查了 193 家国营企业，调查结果是这几年企业留利越来越少。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交到国家的占企业纯收入的 91% 多，留给企业的只有 8% 多一点。财政部门老讲企业留多了，现在搞利税合一，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拼命增税，结果是税挤利，利越来越少。利税加在一起，留给企业的仅有 8%。有的企业人均不到 200 块钱，做医药费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还说让利让多了，不能放权让利了，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关于眼睛向内向外的问题。有人认为，放权让利属于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已经让够了，放够了，因此企业的效益滑坡是内部问题，应当提倡眼睛向内，挖掘潜力。当然，这样讲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对的。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有些企业能想办法，搞得就好一些。这就证明，眼睛向内对企业来说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用这样简单的推理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今天大中型企业不活首先是企业外部问题，而不是企业内部问题。那这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哲学观点呢？这并不违背。我完全同意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个哲学观点。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果它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完全可以讲企业内因为主。如果外部条件变化了，市场疲软了，每个企业都面临同样条件，那就要看企业的内因了。有本事马上换产品，适销对路，就能克服市场疲软。问题是，今天的企业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内部问题很多还是受制于政府，政府一根根的棍子伸到企业的肚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同政府的功能一体化，它独立不起来，政府直接控制企业，这实际上仍然是内因。怎么能把政府的控制列为外因，从而用“内因为主”来解释呢？咱们现在叫“鸟和笼子”，笼子既看得见，还有缝，谁都可以伸一根棍子进去，十几根棍子在里边搅，那鸟还活得了吗？

究竟社会主义企业是什么呢？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社



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个前提下，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这样讲还不够具体。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增强企业活力是个中心环节，并指出，围绕这个中心环节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这两句话都是有附加语的。“正 确确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后有一个附加语，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说明国家与企业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画龙点睛，点出来了。“正 确确立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也有一个附加语，是“保障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这也是画龙点睛。现在我们来探讨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要全面地系统地考虑这两个问题。

现在国营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不高，问题很多。我去厦门，厦门特区的情况也一样，也是外资企业效益最好，第二位是内联企业（特区以外的内地企业在特区开的窗口），最差的是当地的国营企业。为什么内联企业也是内地的国营企业，开个窗口就比当地的国营企业要好？看来说到底就是，政府干预的多少和企业活力的大小成反比。外资企业为什么最活？因为你管不着。你想去管，人家也不让你管。像北京显像管厂你要去参观都不让进去。而国营企业，连街道办事处都能干预一下。外资企业你干预不了。内联企业也是国营的，它从内地跑到特区去，特区政府管不了它，内地政府也不管它，让它在那里自主经营，所以它也活了。当地的国营企业，当地政府要干预，所以它就不活。国营小企业无关紧要，可以少管一点，它也就活一点。越大越得管，越管就越死。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地都在搞试点，许多地方把几家国营企业按“三资”企业进行试点。最早是厦门，找了3家企业，按外资企业办。厦门的市长跟我谈到，他有个很大的忧虑，他说现在厦门不管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利税，外资企业占了大部分，国营企业比重越来越小，而且不活，效益差。所以找3个企业来试点。我对这两点都不太赞成。我认为特区本来就要引进外资，多点儿怕什么？即使厦门外资为90%，在全国也只是个小数点。这是特区的



任务，怕什么？关键是国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对比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说外资企业是汪洋大海，把厦门给淹了，国营企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浮在大海上的灯塔，光芒四射；一种是淹没在海水里的礁石。国营企业有其优越性，不但与外资企业平起平坐，而且有更多的优越性，那就不错，不一定以多取胜。如果外资企业是汪洋大海，国营企业是淹没的礁石，抬不起头，就是问题了。现在特区就有这种现象，到外资企业工作的人走出来都神气，在国营企业的抬不起头。所以关键不在于数量多少。那么，按外资企业来试点，我也不大赞成。一是好像就是外资企业好；二是试成功了也只是多几家外资企业，有什么了不起。应该是“你有我有”。外资企业有哪些本事，有哪些条件，我们国营企业也得有。还要加上一个“你无我有”，你做不到的地方，我能做到，比如职工当家做主，调动人的积极性，等等。形象一点讲，如果外资企业有十八班兵器，我一班也不能少。我还要有十九班，这第十九班可能是“杀手锏”，更厉害。

## 二

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怎么搞，还需要大家来探讨。现在我提出一个“一四五”的主张，即一个目标，四个分开，五项制度。改革要有目标，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使企业成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句话可以分解为两段：“社会主义的”和“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这两段我有一些看法。社会主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大同小异。在这一方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什么姓“社”姓“资”。但是前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又说明企业有姓“社”姓“资”之分，问题是什么范畴的问题必须区分。于是就有一个哪些该分，哪些不该分的问题。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共性，个性在哪里？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深圳特区有个同志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这个特区就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就像一个篮球



场一样，欢迎外国的篮球队、内地的篮球队都到我这里来赛球，但要按国际篮球规则赛。把他这段话拿来说明我的上述看法很恰当。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国际国内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共性，必然按国际通行的规则行事。它不能区分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这个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买主要主要问性能怎么样，质量怎么样，价格怎么样，能不能按期交货等等，然后决定买不买，而绝不会问，你这个商品是公有制企业生产的还是私有制企业生产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你们企业内部的事，与这个商品没关系。买这个商品，作为商品经济的行为，应该是一样的，否则我们怎么进入国际市场？因此，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这些都是共性。那么，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区别何在呢？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不同。就像打球，各国球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组织方式是不同的，这些方面必然有区分。所以，企业改革的目标，应分成“社会主义的”和“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两段来分析。

怎么才能使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呢？我认为应实现四个分开，其核心是政企分开，同时还要实行政资分开、利税分开、投贷分开。只有实现这四个分开，企业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怎么才能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呢？要在企业内部建立五个制度：即产权制度、劳动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领导制度，这五个制度都与生产关系有关。上述设想统起来可称为“一四五”，但还只是个原则，要变为具体的条条，还需要充实完善。

政企分开这个原则能不能具体化？政企分开后，政府对企业的职责是什么？能不能具体化？“政”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政府机构很多，有两类：一类是综合管理机构；另一类是行业主管部门。更直接管企业的是主管部门，但现在主管部门的身份模糊。从它实行政管理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婆婆”；而从它行使所有权的角度讲，它又是“老板”。所以现在的主管部门既是“婆婆”，又是“老板”。“婆婆”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是政府管企业。资



本主义政府也要管企业，但它不是老板。“老板”是投资者、所有者。所有者的职能和政权机构管理企业的职能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我们却把它们混在一起。这正是我们不能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原因。

要实现政企分开，前提是政资分开。所谓政资分开，是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的分离。现在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国有资产管理局究竟怎么管，还莫衷一是。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行政机构，我们应该走建立投资公司的路子。投资公司也是企业，但它是经营资产的企业。假如搞个医药投资公司，专门对医药产业进行投资，把现有的医药工厂统统划给它，假设共有 100 亿元，我们可以规定医药这个行业资金利润率，如 10%，到年终投资公司就须完成 10 个亿的收益。这样，投资效益本身就会成为投资公司的指标。而现在企业的主管部门，因为它是行政政权机关，它关心的是“权”，不是“资”，是厂长是否听话（不听话的就免职），是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等等。它倒反而不关心投资效益。所以政资分开就是婆婆归婆婆，老板归老板。当然，政府必然要管理企业，最典型的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它一视同仁，不管是国营、集体、外资企业，都得到它那里去领执照，但它不去干预企业的内政。政府职能都应该类似于工商行政管理局。

对于国家投资的国营企业，由于政资分开，必然应该实行利税分开。税交给政府，利交给所有者，这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企业为什么反对呢？实际上不是反对利税分开的原则，而是反对具体的办法。财政部讲利税分开后所得税率降到 33%，然后实行税后还贷。企业一算帐觉得更吃亏了，所以抵制。可见是税率高低的问题。像特区——深圳、厦门等地，所得税率只有 15%，那个地方从来就是利税分开的，没有一个企业反对，因为所得税率低。利税不分，严格讲，是产品经济观念衍生出来的。为什么利税合一呢？从财政部门看，税是交给我的，利也是交给我的，何必两



边算帐呢？干脆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就无法理解，税是交给政府的，利是交给老板的，怎么会利税合到一起去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国家的财产是国家的，所以统统合在一起。但从理论上、概念上是混淆了，一混淆就出毛病。现在出现大量以税挤利现象，税越来越多，利越来越少。利可以分成，可以留给企业，税就不能留给企业了。所以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税越加越多。而且我们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没有监督，这是涉及宏观管理的大问题。我主张将来由全国人大监督这件事（外国的国会都管这个事）。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必须由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不能随意增减。据1990年工经协会调查，现在企业的税有20多种，改革以前只有两种，现在“税”和“费”加在一起有60多种。所以现在应适当控制税收。税就是给政府作行政开支用的，利应该交给投资者，是国家投资的，由国家的投资公司收取红利；不是国家投资的，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第四个分开是投资和贷款分开。我们以前进行的一个改革叫“拨改贷”，也有不合理之处。本来投资是国家拨款，为了刺激企业少要投资，把拨款改为贷款，贷款是有利息的。其实，如果不具备其他机制，企业照样还是尽量要贷款，因此并没有达到拨改贷的目的。把“拨”和“贷”混为一谈，这概念是错误的。“拨”是投资，“贷”是借钱，这两个经济范畴不但不同，而且是截然对立的。这到企业破产时最为明显。一个企业资不抵债，宣布破产，这时贷款者是债权人，是来要债的；投资者则是债务人，是还债的。两者截然对立。现在“拨改贷”，政府的投资者究竟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呢？说不清。现在阻碍企业破产的原因，除了不具备社会保障条件外，首先银行就怕企业破产。一破产，帐面上就少掉了一大部分，所以宁愿维持，保住挂在帐面上的钱，也不让企业破产。这就是“贷”和“投”混为一谈的坏处。而且把流动资金也全部改为贷款，使企业背上了很大的利息。现在有的企业借款利息已占成本的百分之十几，这是很不正常的，也带来了一系列



列产权关系的不明确。有很多企业是负债经营的，特区有的国营企业100%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企业认为这钱都是自己搞的，国家没给投资呀，怎么算你国家的，所以主张搞企业所有制。这当然与国家矛盾很大。有的特区政府提出：由于当初政府是贷款担保者，所以企业的财产应属于国有。但实际上担保者成为所有者，也讲不通。所以产权关系弄得稀里糊涂。而且由于不允许搞企业所有制，现在一些企业就以各种办法转移资产，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

### 三

下面谈谈我对试行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问题的看法。关于股份制，现在概念上也很模糊。赞成的人不见得都理解，反对的人也不见得理解。一说股份制，就卖股票。卖股票，就是私人买了，不是私有化了吗？再就是卖股票就是投机，那不把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都引进来了？实际上，股份制不等于都是挂牌卖股票。股份制有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卖股票，而是内部分股。我看将来大量的企业可以改成这样的。企业集团更得实行这样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是多元的投资者，只能用股份制。即使都是国有的，但有的是中央各部所有，有的是省里所有，有的是市里所有，有的还是县里所有。我们的国有，往往是“条条”所有，“块块”所有，不都等于国务院所有。所以，只有用股份制的办法才能把这多方面的所有者联合起来。李鹏同志也讲了，企业集团不搞股份制是不行的，股份制是企业集团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他企业要不要搞股份制，有争论。但至少可以试行。实行股份制，除了明确产权关系以外，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有利于规范股东的行为。因为股份制有一套规矩，买了股票也好，内部分股也好，作为股东，行使所有权只是在股东大会上，不是天天都在那里行使所有权、当老板。他是把资投给企业，授权企业经营他这资产，这个资产就成了法人资产，然后由法人代表来经



营。如果股东是多元化的，那就由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机构，而股东会一年开一次，不能天天开，真正实行经营决策的是董事会。这样就把股东的行为规范化了，同时政企也就分开了。首先政资分开，投资者充当所有者，所有者就得按这种规范来行使所有权。所以股份制从现行体制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使得政企分开、“两权”分离能够规范化、普遍化。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逐步试行，逐步推广。但首先推广的将是有限责任公司。现在国务院正在起草公司法，据说也是先搞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法。

我这里没有提到承包。现在往往是把股份制和承包制作为两种对立的制度来看待，赞成股份制的人就说承包制怎么怎么不行，赞成承包制的人就说股份制怎么怎么不行。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是一回事，根本就没有相互排斥的关系。承包是一种经营方式，不涉及所有权的问题，股份制则涉及所有权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恐怕全国的多数企业现在还只能搞承包制。但承包制谁是发包者、谁是承包者不清楚。现在发包者变成了主管部门，这是政资不分。如果政资分开，资产属于投资公司，企业承包应该是向投资公司承包，而不是对政府承包。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像工商行政管理局一样，不存在什么承包不承包的问题。所以应该是经营者对所有者承包。如果实行股份制，也可以搞类似承包。什么叫类似承包呢？就是国有资产投到企业，我也不准备控股，因为你这个企业无关紧要。我也不准备过多地考虑企业问题，但是我要求你这个企业保证我国有股的红利。股份制里头有个办法叫优先股，优先股就是赚了钱优先给优先股分红；其它叫普通股，普通股是参与企业决策的，优先股是放弃决策的。优先股有优先分红的权利，破产了，剩余财产也有优先分的权利，但是他就放弃了在股东会上的表决权。那么国家可以作为优先股，甚至可以定好协议，我在你这里有 100 万资产，每年得保证给我 10 万的红利，但是你企业怎么搞我不管，这样也就类似于承包。不采取优先股而采取承包也可以，反正是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关系。但承包制谁



向谁承包，应该规范化。现在是向主管部门承包，主管部门成为发包者，这就使政企更不分了，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关系，而且还成为利益共同体了。因此很多主管机关成了发包者后，也根据发包以后“创收”多少而发奖金。这样就把政府的职责和股东的职责混淆在一起了。

## 四

现在大家都在提转换经营机制，但是如果不理顺产权关系，不解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企业就不可能真正转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自主经营有两个方面的自主权，一个是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一个是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简单再生产就是日常的生产，这涉及到计划权、定价权、销售权、采购权以及指令性计划的问题。特别是大企业关系国计民生，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主张，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直接定货。现在搞指令性计划，国家有权而无责，指令性计划需要的条件不具备，国家也就不管了。如果变成直接定货，由物资部门、商业部门和外贸部门按照国家的计划，向生产企业签订定货合同，就可以把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计划行为变成商业行为，这样才符合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指令性计划越多，企业越高兴，因为这样企业生产的产品销路是有保证的。但国家的物资、商业部门必须与企业签订合同，合同上写明产品名称、规格、价格等，如果需要给什么条件，也在合同里面写明。国家的物资部门、商业部门还应该利用定货，使之成为宏观控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现在我们讲经济杠杆指的都是利率、税率、汇率等等，忘了一个最重要的杠杆——物资。物资本身是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杠杆。50年代，我们就运用过这一杠杆。在粮食丰收时，国家拿出钱收购，到粮食缺、涨价时，国家把粮食抛出来。国家手里拿着一批物资，通过这部分物资的吞吐来影响市场的供求和物价，这样就发挥了国家调控市场的作用。如果能够实行这个办法，国家直接向企业



定货，企业都会希望国家多定货，以求可靠的市场了。陈云同志讲过，市场有两种：一个是国家市场；另一个是自由市场。对企业来说，如果能够争取到国家市场，那就有保证了。总之，要解决企业的生产计划权，必须对指令性计划本身进行改革，这对企业、国家都有利。当然要实现这一条很不容易。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很大一部分资金用来吞吐物资，平抑市场供求与物价。

企业还应该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利用积累进行新的投资，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集中于国家，由国家统一安排；另一种是企业自己也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涉及留利问题。税后的利润应该怎样分配，其中应该有一部分给企业作为自我积累用，现在叫生产发展资金。利润不能全部上交，这样的企业才有自我积累。企业有了自我积累才可能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这是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许多条管子把企业吸干了，企业根本没有自我积累的能力，就没有后劲。这是我们企业搞不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必须解决企业自我积累的问题。

关于外贸经济技术合作。当然不可能允许所有的企业都直接对外，但至少应该扩大直接对外的企业范围。可是一扩大就出现互相残杀，肥水外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近几年外贸体制改革来改去，一会儿收，一会儿放。我主张是放，在放的同时，采取民间组织的形式，例如行业协会等来解决统一对外的问题，不一定非得通过国家来统制。日本就是这样，同行内几家联合起来对外。我们也可以采取横向联合的方法，还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造外贸公司，使外贸公司吸收生产企业入股，这样的联合体可能解决外贸与企业间的矛盾。

## 五

关于企业的劳动制度问题。我主张，企业劳动制度应该根据马克思讲的企业是“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这一原则来制定。我对现在的劳动部门搞的合同制不太赞成。许多企业都对用工制度能



不能自主非常关心，好像通过合同制能解除合同，才能解决某些调皮捣蛋的人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采取另一种方式同样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采取简单的开除、解雇的方法。因为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劳动部门的合同制，多多少少是运用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管理方式。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也强调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在劳资对立的条件下，千方百计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是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重发生了变化。现在美国脑力劳动者占 60%，预计 2000 年将达到 80%。就是体力劳动者用脑、用体的比重也倒过来了，他们也是按电钮、操纵计算机，而不是流大汗、卖苦力。脑力劳动的比重越大，越需要劳动者的自觉性。只有自觉自愿才能有主动性、创造性。因此，日本的许多企业都实行终身雇佣制，以安全感、归属感吸引职工。本来我们社会主义最有条件调动人的主动性，但是，我们有些厂长、经理经常有资本主义早期小老板的心态，以为有权解雇人，才能管好企业。

我主张三种工并存：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一个企业总得有一批正式工，作为本企业的主体。正式工也得有契约，这个契约是自己民主制定的劳动公约。新招的工人可以当合同工，但合同不是厂长、经理为甲方，新招的工人为乙方，而应该是劳动集体（本企业的全体劳动者）为甲方，乙方是新的工人。经双向选择，合同期满要么解除合同，要么转为正式工。现在合同制职工不能转为正式职工，全部合同化是短期行为，谁以厂为家？谁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合同工应当是预备工，期满合格可以转正。还有一部分临时工，这一部分人可以参加招工，招工合格，成为合同工，合同工好好干，合同期满转正，成为正式工。对于解雇问题，我建议将来在职业代会底下建立劳动委员会，专管招工和解雇问题。如果正式工违法乱纪，经劳动委员会讨论，可以按劳动公约把他改为合同工；合同期间，他改正错误，积极劳动，合同期满再转成为正式工；合同期间还不好好干，那么解除合同，



当临时工。三个台阶可以上，也可以下，会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内凝力。这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符合现代管理原则。诸如此类，我们应该有一套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体制，由企业自己来掌握。

再一条，干部工人应该打通。现在首钢已经打通了，不分干部、工人，都是职工，叫首钢工作者。他们工资等级都是统一的，这样就符合劳动结构的变化。应该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是工人阶级，都是职工。

关于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的问题。我认为激励不单单是物质的刺激。物质的刺激，在分配上给予激励是很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尊重不尊重人，对工人是至关重要的。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受到尊重，能感觉自己是主人，就会有积极性。我们可以采取几个办法，一个是吸收职工入股。吸收职工入股是搞私有化吗？不是。这种股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这种股应该叫职工合作股，相当于合作社性质。因为他既入股又参与劳动，价值都是集体创造的，按劳分配之外再按股分红。按股分红如果是等额的，或者是接近的，都是自己创造的价值，没有占有别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不能算是私有化，而是公有性质。所以，我建议这种股不要叫个人股，而应叫职工合作股。一个企业多少亿的财产，职工入不了多少股。东北朝阳重机厂最早进行试点，职工的股份不到1%，很有限。有的人认为这起不到作用，我看不见得。我见到有一个工厂资金短缺，要搞技术改造，所以硬性规定每个职工入股500元，集中了30万元，找安装公司安装设备。安装公司的工人野蛮操作，拿起大榔头又敲又打。平时生产工人对基建根本不管，而这回有三个青工过去进行干预说：你不要乱打乱敲，这里面还有我的500块钱呢。可见连股连心，不在于数量大小，职工会感觉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有自己一份。如果有条件，再建一个职工集体股更好。职工集体股不是靠个人入股。有些企业集体福利费比较多，把它作为投资，成为职工集体所有的，那更是公有制了。所以一个企业搞有限责任公司，至少除了国有



股，还有集体股，还有职工合作股。这样的话，就使得职工群众能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

在分配上，我主张两级按劳分配。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不可能由社会直接对个人分配，社会只能够承认这个商品提供多大劳动而给予分配。然后企业拿到这个分配的总额，在内部再去按个人分配。现在有的企业工效挂钩——工资总额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就是两级按劳分配的道理。但我主张不能只限于工资，应该是整个消费基金总额和效益挂钩。消费基金总额在企业内部的分配，国家不应该管。现在国家还一杆子插到底，哪一年调级等等都要等劳动部门发令。这是企业缺乏自主权的典型表现。

最后，关于企业领导制度问题。应该建立合理的党政工群的关系。现在企业有核心、中心、民心，“三心”要是不合拢，就成了“三心二意”。这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讲党委集体领导，厂长统一指挥，职工民主管理。分开讲都不错，问题是怎样结合到一起？现在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厂长兼党委书记，这倒是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这里提的是另一种办法。首先有一个前提：职代会对企业重大的生产经营问题有决策权，有审定权，可以使党工群通过职代会进行民主管理。一般的生产经营问题则由厂长、经理全权负责。如果自愿的民主投票，可以选党委书记作为职代会主席，工会主席作为职代会副主席。这样，党依靠工会作为助手，领导职工群众当家作主，重大的决策由职代会通过。党委的保证监督通过职代会来体现。行政方面提出一个正确的东西通过后，动员全体职工保证实施，不正确的就进行监督。一个是事前监督，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改好了再通过。通过后执行中有问题，事后批评、事后监督。党工群形成一个民主的方面；厂长、经理形成集中指挥的方面。这样把党政工群的关系在民主集中制中统一起来。我这个主张，四川某些企业已实行，效果很不错。但是现在很多县不是按我的主张，而是自发的，包括深圳特区现在逐步也走这条



路，就是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相当于党委书记兼职代会主席一样，通过人大领导群众当家作主，作出一些重大决策，县长统一指挥。党政工群的内在关系客观上存在着这种关系。如果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三心”是可以变成“一心”的。



##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搞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全国人大将讨论修改《工会法》，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但全国工人群众关心它，而且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国际友人也会关心：中国工会在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将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我国的工会在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和组织职工群众起来为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斗争。革命胜利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应当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和组织职工群众学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履行作为主人翁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工会在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

我提出以上建议，有如下理由：

第一，近年来，国际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受到严峻挑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再一次强调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作为方针、原则是不会有人反对这句话的。问题是这一方针如何具体落实？落实这一方针，首先应当让职工群众在他们每天生活的企业里，感受到自己的确处于主人翁地位，使他们和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可能有的同志会认为，落实这个方针，主要要靠对职工群众加强主人翁意

---

• 本文是蒋一苇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原载1992年2月25日《工人日报》。



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思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人的思想意识毕竟是客观的反映。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空泛的口号喊多了，反而会引起职工群众的反感，而起相反的作用。

第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公有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公有制才能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使企业从“物”（资本）统治“人”（劳动）的现象，变为“人”（劳动）统治“物”（资本），从而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力。因此，企业是以资本为主体，还是以职工为主体，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遗憾的是，在实行高度集中和以行政指挥为特征的旧体制中，职工并没有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体，而是处于类似“国家雇佣”的地位。这是国营企业活力不足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个问题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

第三，1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应当承认，在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方面进展不大。有些改革措施，如实行厂长（经理）个人承包制，实行用工合同制等等，在某些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促进职工增强主人翁意识方面，却起了消极作用。其实，对这些改革措施，只要稍作变更，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例如，把个人承包改为全员承包，像首钢的承包制，吉林省推行的“两段承包”，江苏省推行的“共保承包”等等，都是全员承包或向着全员承包发展，在观念上就大不一样。又如用工合同制，如果合同以企业的劳动集体为甲方，劳动者个人为乙方，就不会形成老板雇工的观念。关键在于我们制定各项改革措施，是否依据社会主义企业以职工为主体这一根本原则。

第四，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重要论断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又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围绕增强企业



活力这一中心环节，必须正确确立两个关系问题：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时至今日，我看要解决的仍然是这两大关系问题。正确确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关键是贯彻政企职责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正确确立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关键在于确立职工群众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当家作主的作用，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企业本来最有条件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但是，过去许多做法适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劳资根本对立的条件下，却实行“人本主义”的现代化管理，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他们的做法和早期资本主义完全两样了。而我们有的同志却有意无意地想把早期资本主义的一套东西搬来搞社会主义企业。现在各地都在进行的“破三铁”，使职工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是非常必要的，但也还要有措施鼓励职工“以厂为家”，把企业的工作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如果我们的企业里有部分职工长期对企业忠心耿耿，又做出了突出贡献，经职代会通过而授予“终身职务”，实行这种鼓励性的措施会有很大好处。改革应当允许从多方面大胆试验、探索，在破旧框框时，不能又用新框框捆住人的手脚。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抓企业改革试点，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提出了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但在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这方面的有力措施还不多。我在这里谨向全国经济机关和企业界呼吁，要把职工当家作主的问题在深入改革中认真研究一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道路。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能否在企业中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工会系统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但是在整个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工会往往孤掌难鸣。因此我建议，在《工会法》里把“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行使民主管理权利，履行作为主人翁的义务与责任”列为公有制企业里工会的首要任务。这



样，工会就会在推动企业民主管理，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工会的良好形象。



## 搞活企业要治本\*

搞活企业是我们10来年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抓的问题，有不小进步，但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对企业不活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它的根本原因，从治本上进行改革；而往往是就事论事，采取一些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措施。如果要治本，我认为有四个问题必须研究解决：

### 一、抓住政企不分这个关键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增强国营企业活力问题，当时曾指出：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职工与企业这两大关系问题。我看，今天仍然是需要解决这两大关系问题，首先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要解决政企分开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搞活企业要强调“眼睛向内”、“练内功”，这话有道理，但见效不多。实际上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在许多方面直接干预企业的“内政”。这就使企业的“内”和“外”连在一起，眼睛向内又有什么意义？例如分配问题，政府一杆子插到底，规定了企业内部的分配办法，企业没有分配自主权，眼睛向内又能起什么作用？可见，如果政府干预企业内政的机制不彻底改变，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只能是句空话。

\* 本文原载《经济日报》1992年5月2日。



## 二、政企不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资不分”

政企分开为什么老实现不了？这几年我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发现政企不分的一个重要根子是“政资不分”。什么叫“政资不分”？就是说，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混在一起。企业的政府主管部门既是“婆婆”，又是“老板”，即使表面上实行了政企分开，主管部门也可以以“老板”的身份，照样实行“婆婆”的干预。

政资分开这几年不能说没有进展，如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但如何进行管理仍然莫衷一是。实际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如果仍然是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问题依然解决不了。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削减行政机构，建立各种类型的投资公司。这种投资公司也是企业，是经营投资的企业，它们必然要讲求投资效益，实现资产的增殖任务。由它们作为生产性企业的老板或股东，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原则，对被投资的企业行使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责是对这些投资公司进行管理，而不是直接成为生产性企业的老板。国有资产的管理形成上述体系以后，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都是面对各种所有制（不限于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就像现有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一样，它不可能去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现在财政上实行复式预算是一项重大改革，它有利于上述的政资分开。但是，财政的建设性预算包括什么范围要进一步研究，属于生产性企业的投资应当由各类投资公司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建设预算，应当只管基础设施的建设。

## 三、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是增强国营企业活力的力量源泉

资本主义企业以人格化的资本为主体，包括厂长、经理在内



的全体雇员和雇工都是企业的客体。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特征是以劳动者——全体职工为主体，如何把社会主义这一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是企业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目前企业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当然，劳动用工、人事、分配制度是应当改革的，但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我们应当允许职工能进能出，但不宜鼓励职工自由流动，似乎流动得越快越好。如果职工都是“飞鸽牌”的，又靠谁以厂为家呢？在社会保障未完善之前，大搞解雇或变相解雇，可能引起什么后果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劳动人事制度如何改，才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企业现代管理原则，需要认真研究，并通过不同形式的试点进行对比，找出合理的途径，不应草率进行，更不能刮风。

在企业实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不能只限于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应该在企业中实行广义的民主管理，包括吸收职工入股，实行产权制度民主化；改个人承包为全员承包，体现经营制度民主化；实行两级按劳分配，体现分配制度民主化；在职代会下设劳动委员会，民主管理人员的增减、进出，体现劳动制度民主化等等。这样，国营企业才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

#### **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关键在于 对指令性计划的改革**

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国营企业承担指令性计划的问题。现在的措施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把企业推向市场。我认为真正的改革不在于缩小或扩大指令性计划，而在于对指令性计划本身进行改革。

指令性计划的特点是以行政命令向企业下达任务。它是一种行政行为，因此它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必然不协调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似乎没有指令性计划就失去宏观调控手段。我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把宏观调控的行政行为改变为商业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把国家对物



资的直接调控改为由物资部门、商业部门、外贸部门根据国家计划向生产企业直接定货（不是现在的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定货）。这些部门向哪些企业定货，可以选择，由这些部门和企业签订合同。这些企业有优先完成这种国家定货的义务，但定货合同的条件则由上述部门与企业协商决定。上述三个部门应当拥有一笔基金，进行物资商品的储备，像 50 年代那样发挥物资蓄水池作用。根据市场情况，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商品进行吞吐调节。这样，国家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用物资储备手段，对市场供求以及物价进行调节。从这种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看，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还是完全合理的，它是把计划与市场具体结合的体现。而且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拥有雄厚的国有资金，才可能对市场进行这样调控，这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



## 破“三铁”之我见

目前各地都在开展破“三铁”的改革，这是一个好现象。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这“三铁”的弊端是人所共知的，但10多年的改革未能把它破掉，现在下决心把它破掉，当然是件大好事。可是，我在这里却要提出一点异议请大家考虑。

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形成一种传统，很容易一阵风、一哄而起，而且习惯“齐步走”、“绝对化”。“三铁”既然是破的对象，它当然是个坏东西，谁还能说“三铁”并不绝对坏呢？事实却真是如此，“三铁”在一定场合不但不坏，甚至是好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对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化，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具体分析。

“铁饭碗”绝对不好吗？我们现行的体制是，只要你取得全民职工的资格，这个饭碗就一辈子铁到底，甚至长期请假搞个体户，铁工资也照拿不误。像这样的铁饭碗有什么好处？当然不好。但是日本企业为什么盛行“终身雇佣制”呢？前些年我国开始推行职工合同制的时候，我到日本出席一个会议。许多日本企业经理就问我：“我们实行终身雇佣，你们为什么搞短期雇佣？”当时我们有的报纸发表短评称赞合同制，讲“失去安全感才有积极性”，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失业后备军”的理论吗？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有失业后备军，对在职职工形成威胁，才能使在职职工遵守纪律。列宁则把这种纪律称之为“饥饿的纪律”。遗憾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也已屏弃了这种办法，而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即

• 本文原载1992年3月14日《经济日报》。



用安全感和归宿感来激励职工的积极性，这就是日本企业为什么广泛采取“终身雇佣制”的原因。资本主义的现代管理思想是“人本主义”，他们在劳资对立的条件下，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激励职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内聚力。奇怪的是我们作为以职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企业，却有意无意采纳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失业后备军理论。

一个企业可以有临时工，也可以有合同工，但必须有一批对企业忠心耿耿而且做出贡献的骨干，被企业授予终身职。这种有条件的铁饭碗，不同于取得全民身份就有了无条件的铁饭碗。我们要打破现行的这种无条件的铁饭碗，但并不是绝对否定铁饭碗。由企业自己规定（而不是由国家统一规定）一种鼓励性的终身职，它会成为职工的奋斗目标，而大大加强企业的内聚力和向心力。这种铁饭碗不但符合社会主义职工当家做主的原则，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原则。其实这项改革的关键是破掉国家统一规定的铁饭碗制度，同时允许企业自己制定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现代管理原则的企业劳动制度。现在各地都在抓试点，应当允许有一部分企业进行上述这种以安全感、归宿感为动力的劳动制度试点。

铁交椅该不该破？现行这种走遍全国都适用的职务等级制是必须破的，但也不能绝对化。在一个企业内部可不可以软交椅与铁交椅并存而以铁交椅为职工奋斗目标呢？我看完全可以，而且有很大好处。这里也举一个外国例子供参考借鉴。1979年我到美国去考察，了解了他们几所著名大学实行聘任制的办法。这几所名牌大学，至少要取得博士学位才能任教。开始聘任为助教授，聘期5年，5年期满经过评议，只能有一半的人提拔为副教授，另一半的人不被提拔就必须离开学校，以便吸收新的人才。副教授聘期也是5年，5年期满也只能有一半的人提拔为教授，其余一半不被提拔的也必须离开学校。经过10年的竞争和筛选，有四分之一的对象被聘为教授，教授则为终身职，工作一定的时间后在学校里退休。因此还未聘为教授的人，都不敢在学校附近买住房，一



且聘为教授才买房子定居。因此教授的终身制（铁饭碗）也成为激励教师进取的目标，这种有条件的铁饭碗有什么不好呢？这项改革的关键也是破掉国家统一规定、统一任命的铁交椅，但应当允许独立经营的企事业单位自行制定一套能激励上进的职务体制。至于政府系统的公务人员，如何考试选拔，如何考核升迁以及离退休，当然应当由国家人事部门统一管理。

铁饭碗、铁交椅是国家高度集中并直接干预企业内政的产物，把这两方面的国家统一规定破掉了，与它们相适应的铁工资势必也会破掉。如果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工效挂钩办法，国家只控制工资总数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比值，企业内部的具体分配，完全还权给企业自主，铁工资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但也不尽然。为了保障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平，世界许多国家都立法规定职工最低工资的限额，如果低于限额就算违法。这种统一规定是必要的，如果我国今后也实行，也算一种法定的“铁工资”吧。

以上说了这些，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改革是为了破掉不合理的一些旧框框，但在破的时候要具体分析，不要绝对化。不能像小孩看电影那样，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非此即彼。如果这样，很可能跳出旧框框，又掉进一个也不尽合理的新框框。



## 关于股份制的若干认识问题<sup>\*</sup>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实行股份制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几年来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因此股份制的气候反复变化：一会儿晴转阴，一会儿又阴转多云间晴……。目前不但转晴，而且大有出现“股份热”的趋势。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得很快，而且取得显著成效，股份制之出现可以说是必然趋向。但是对长期生活在所谓“产品经济”中的人来说，毕竟是个十分生疏的新事物。赞成的、反对的，往往对股份制都缺乏必要的常识，却凭着字面的理解，甚至主观的臆断，对股份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我主张试行股份制有六七年了，也不敢说已对股份制有确切的理解。可喜的是有一批勇士大胆投入实践，并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成为现阶段的行家。下面谈几点个人的粗浅认识，就教于海内外的里手与行家。

### （一）股份制并不都是股票挂牌上市

究竟什么是股份制？不论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否则争论起来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不少人一说股份制，指的就是发行股票而且挂牌上市，褒贬都从此而来。其实股份制并不都是股票挂牌上市。我认为，股份制是对企业产权进行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方法。它无非是将企业的资本金划分成等额的股份，然后进行“定性”和“定量”。所谓定性，就是说这些资本金属谁所有？然后还要定量，确定谁有多少股？从而明确了

\* 本文原载于1992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产权关系。

股份制企业按国际惯例，有两种公司形式：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由一群所有者分别出资认股，形成公司内部的股权分配。这种公司并不发行股票，更不挂牌上市，但它是股份制企业，具体条件在《公司法》中加以规定；另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公司经过批准注册，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发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委托金融机构出售股票，这种出售即所谓“一级市场”（柜台交易）；另一种是经过证券或股票交易机构严格审查，符合条件的由交易所“挂牌”交易。这种股票本身成为“商品”，服从商品供求规律，求大于供就涨价，供大于求就跌价，这种交易即所谓“二级市场”。国外成千上万的股份有限公司，但被批准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是极少数。我们国家批准在上海、深圳两市进行这种股票交易的试点，被批准的上市公司才几十家，今后也不可能无限扩大。但采取柜台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适当扩大；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股份制企业更可以扩大。

## （二）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姓“中”

这几年股份制时热时冷，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纠缠不清。其实，它作为一种处理产权关系的方式方法，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的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服务。私有制企业如果所有者是多元的，“亲兄弟明算帐”，当然要算清彼此的股权是多少，实行股份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公有制企业如果所有者只是一个，就没有必要实行什么股份制；如果所有者也是多元的，例如组建跨部门、跨地区以及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如果要把产权关系弄清楚，也只有采取股份制的方法才能解决。

有人说，如果股票公开发行，允许私人买股票，等于搞“私有化”，还说不姓“资”吗？允许不允许私人持股是国家政策问题。今天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的政策允许少量私有



制作为补充成分而存在并适当发展，因此也必然允许私人购买公开发行的股票。对于股票本身来说，它既未长眼，也未长腿，不会自己跑去找私有者，它躺在交易所的柜台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股票本身仍是中性的事物。我们在海外的国有公司，同样可以去买资本主义企业的股票，这种股票被我国国有企业买了，也就成为我国国有的股份了。

### （三）能不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

当然可以。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完全由公有制股东组成；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向社会公开出售部分股票，也可以公有的股份为主，占多数，公开出售的股票占少数。问题是企业里哪些股份算公有股？

第一，国有股（包括中央或地方投资的）。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公有股份。

第二，法人股（包括公有企业法人投资的和公有社团法人投资的）。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公有股份。

第三，集体股（或称职工集体股）。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在我国已存在几十年，它的资产为职工集体所共有。如果吸收它的投资，或者这类集体企业加入企业集团，就产生既非国有也非职工个人所有的集体股。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无疑这种股也是公有股份。

第四，职工合作股。合作社是公认的公有制成分。如果合作社投资，当然也是公有股。如果吸收本企业职工入股，并规定有一定限额，记名，又不能出售的，这种股份的性质和合作社性质一致（即职工既入股，又参与劳动），它和社会上私人购股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笼统叫“个人股”，应当叫“职工合作股”，划入公有股份范围。

以上这四种公有股份如果在企业里占主要部分，然后吸收少量私有股份，这个企业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

### （四）国有企业向社会发行股票是出卖国家财产吗



有人反对股份制，更反对国有企业卖股票，认为国有企业卖股票，就是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了。这是一种对商品经济缺乏起码常识的大笑话。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拥有国有资产 600 万元，现在向社会发行股票 400 万元。卖出去的只是若干万张的纸（股票），收进来的却是 400 万元股金，不但原有的国有资产 600 万元不损一根毫毛，而且国有股占了控股的地位，也就是说，从社会集资来的 400 万元，被控股者所支配，国有股以 600 万元的资本，做 1000 万元的买卖，这对国有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其实社会上投资的股东都是小股东，国有资本并不需要占总资本 51% 就可以控股。

再退一步来说，如果国家认为对某个企业不必要直接控股，而把这个企业里拥有的股份“卖”掉，只要卖价合适，卖掉股份，收回资本，另投别处，也没有什么吃亏的。相反，我倒是主张国家把国有资本适当集中使用，这样做，可能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五）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有什么好处

好处很多，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好处：

第一，明确产权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横向联合，特别是组建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才有可能突破“三不变”（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财税渠道不变），真正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

第二，有利于集资，进行企业的改造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而增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吸收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的投资。这些集资方式，比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都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三，吸收职工入股，联股联心，是调动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十分有效的方式。

第四，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组织规范化，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对资产的法人占有权相分离，是促使政企职责分开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真正转换企业的经



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 (六) 国有资产如何管理，才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

国有资产如何管理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目前虽然设置了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但如何管理还缺乏合理的方案。现行体制由政府的所谓主管部门充当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造成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混淆在一起（即“政资不分”），是不可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从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资本和资金必然也要成为商品。势必要产生以投资为职能的“资本经营者”。这种资本经营者可以是不同类型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也可以是企业集团的本部。这种资本经营者要对投资效益承担责任，它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生产性企业之间的中介环节。如果没有这些中介环节充当国有资产的经营者，而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生产性企业的资产，一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可能对大量的企业进行直接管理；二是即使勉强这样做，也必然再现政企不分的弊端。如果有这样的中介环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任务可以是制定投资政策，并通过对这些中介环节的管理、监督而实现既定的投资政策。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一个重要的标志将是股份制企业的大量出现和国营投资公司的普遍建立与完善。

#### (七) 推行股份制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股份制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但目前不论是股份制企业，还是投资公司，都不宜一哄而起；股票市场更不可能普遍建立。因此股份制的推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应当通过试点，由点到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一般来说，可以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先发展一级市场（即柜台交易），后发展二级市场（即挂牌交易）。企业集团或其他企业联合体应当用股份制使其逐步规范化，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集团公司承担经营国有资产的权责；与此同时可以进行建立综合性



或专业性投资公司的试点。

不论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都要重视本企业职工持股，并可从职工持股开始股份制的建立，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的特色。



## “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同志前不久的谈话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把我们从姓“社”姓“资”的困扰中解放了出来。这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会出现姓“社”、姓“资”的困扰呢？问题在于某些人手里拿着姓“社”、姓“资”的大棒，高举“大批判”的旗帜，给你戴上姓“资”的帽子，你就成了搞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嫌疑分子。比方说，股份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主张搞股份制，就等于在宣扬、提倡资本主义。这里就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有它的具体而特定的含义，例如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等。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则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事物，这种事物的内涵很广泛，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组织形式等等。这些事物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但它本身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干。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指出管理有两重性，属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力的组织范畴的管理方法，也没有阶级性。这些事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就像资本家也吃饭、穿衣一样，我们不能把被资本家吃的“饭”和被他穿的“衣”，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得出谁

\* 本文原载《经济学家》1992年第3期。



吃饭、谁穿衣，谁就是资本家的荒谬结论。

就拿股份制来说，它的确是资本主义发明创造的事物，但它是一种科学处理产权关系的方式方法：把企业资产划成等额的股份，明确谁占有多少，就拥有多少股权。用这种方法可以处理私有制的产权关系，同样也可以处理公有制的产权关系。一个由若干公有制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不用股份制又有什么办法能确定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呢？

股份制企业并非都挂牌卖股票。有限责任公司也是股份制企业，但并不卖股票。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卖股票，但也不是都有资格到交易所去上市交易。许多人往往连这些基本常识都没有，却在大肆批判股份制，说股份制就是卖股票，卖给私人就是搞私有化等等。其实，我们改革中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少量私有制存在并得到适当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决定的历史进程。因此允许不允许私人买卖股票，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问题。至于股票本身，它躺在柜台上，谁买都行。公家买去就成为公股，私人买去就成为私股，它本身仍然是个中性事物。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是商品经济，都在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许多共性的事物。这些共性的事物都是中性的，既可为资本主义服务，又可为社会主义服务。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实践中创造出的一些成功而有效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按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统统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它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都可以放手拿来。在概念上明确了“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等于“资本主义”，就不会再犯上述“左”倾幼稚病了。



## 给 家 人 的 一 封 信

大美、真妹：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正好这几天有空，写个回信给你们，也是给孩子们的。

中央的会推迟到月底。我的咳嗽靠吃药老不好，干脆利用这个空档，还是到空军总院来吊瓶，可能要好得快一些，在这里可以有时间为月底的会作些准备。

你们关心我的身体，道理和心情我哪会不理解，而且很感激。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要逐步采取措施，既要考虑身体，又要考虑工作的部署。重庆和深圳的事，我正在逐步转移。为什么又办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我打算逐步把自己的活动转到北京来。

事情不可能随心所欲，想用就用，想退就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逐步过渡。

我的一切努力，无非是想对中国的改革起点积极作用。这几年如果不开辟重庆、深圳这些摊子，我被关在家里，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充其量写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不到处活动，连文章也会空空洞洞，毫无用处。

这几年又是我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中央几次开会都找我去，说明我还被适当重视，也就可以发挥点作用。如果这几年我不这样开拓前进，待开的花也会萎缩了。当然，如果不这样，可以有

---

\* 本文是蒋一苇身患绝症时写给他的夫人陈曦（即大美）和他的妹妹蒋真的一封信的摘要。



时间打打太极拳，养身体。但是否身体就一定比现在好，也不见得。

生命在于运动。我没时间搞体育运动。但据说，脑力劳动也是会带动全身活力的运动，会促进各器官的新陈代谢。当然，一切事过了头就会适得其反，不能过头。你们看到我晚上去加班等等，认为过了头，其实不然，各人有各人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对我来说，并不因此而感到疲惫。

我的病是肺气肿，这是身体器官机能的老化，休息可能有好处，但并不能治此退化病。我作报告连续几小时，对别人来说是重劳动，应当很累。我不然，由于有节奏的讲话呼吸，反而感到气顺得多。所以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

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说：你的事业心，你对党对国家的忠诚，这些我们都理解，而且都赞成，我们强调注意身体恰恰是希望你能为党为国家做更大贡献。也就是说，要“细水长流”。

关于“细水长流”，我考虑得不比大家少。问题是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讲，应当“细水长流”，但要看时机，在某种时机情况下，还必须采取“有水快流”的方针。拿目前情况来说，外部时机是国家处于重要的关键时刻；从我自己来说，现在脑子还管用，但有用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从外部到内部条件来看，这两三年必须采取“有水快流”的方针。所谓“有水快流”，当然不是要一下子流完，而是抓紧这个时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效果要比慢慢来大得多。

你们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从内心来说是感激的，而且反过来觉得我对孩子们的关心很不够，甚至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这并非我内心就不关心，而是权衡轻重的结果。党和国家的命运并不是与大家无关的小事。看看苏联、东欧就可体会到它的严重性。我如果拿很多精力去帮助你们取得某些小利，又怎么样？又有多少大意思？

我这条命是偶然机会捡来的，否则，早就和陈然、江姐一起



牺牲了。解放后又有许多坎坷，但毕竟活过了 70 岁，已经是占很大便宜了。人的生命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有意义。

我们的几对孩子（包括儿媳和女婿），我认为都是好样的。好就好在都是正派人，走在路上不会被人在背后指着议论。由于客观条件，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都是对社会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人。这一点我很自豪，也很放心。希望第三代也能继承这个传统，要好好教育引导他们。我不可能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留下的精神财富应当说不少，希望你们好好消化。

最近有一位对我十分崇敬的同志，要我为他个人写一个条幅作留念。我想了半天，写了下面这几句话：

“历史洪流曲曲折折奔向东，但愿在前进的浪花里，做一颗闪光的水珠。”

我想为孩子们每一家也写下这幅字，以作为共勉。

全球人口几十亿，一个人只是几十亿分之一；历史千万年，人只活几十年。所以不论你在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也只是洪流中的一粒水珠。

历史是发展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面有水阻住后面的进路，就激发出浪花。做一个人，应当做一个符合发展方向的进步者，所以说但愿在前进的浪花里，而不应归随到逆流中去。

同样是水珠，可以有不同的闪光。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所以要做前进的浪花里闪光的水珠。至于能闪多么大的光，要看各人的条件。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有五分热就争取发五分光。你们现在都是小人物，就发小光。我的条件比较好一点，可以多发几分光，下一代也许有人比我发更大的光。但不论闪光大或小，只要能在前进的浪花里闪光，就都是好样的。这种水珠多了，人类历史就前进得快一些。

如何辨别历史的前进方向是个大问题。多数人一哄而起走的路，不见得就是正确的方向。历史是曲曲折折的，但它最终是奔向东。可能出现一股逆流奔向西，我们宁可当少数派也不能同流



合污。识别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而提高的，一时辨别不清，也不要紧，但要时常独立思考，从善如流。

归纳以上所说，我希望孩子们记住三点：

第一，不论职务高低、能力大小，希望大家都做一个对社会有益而不是有害的正派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决不要成为一个只顾私利的庸俗的人。

第二，世界在变。现在是人类历史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什么是人类历史的大方向，不易识别。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是小人物，就不去关心大方向。要拿一定的时间学习、思考，并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以上准则传给第三代。不能只关心他们的身体、生活，要关心他们交结的朋友和他们的思想品质的趋向。在他们之中也许会出现闪光更大的人物，但必须首先像你们一样，是个正派人。

这封信请大家传看，有机会聚会时议论议论。祝大家好！

一苇

1991年11月27日于空军总医院



责任编辑 苏全义

责任校对 孟赤平

##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

《改革》杂志社 编

---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327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7 - 80118 - 146 - 8/F · 146

定价：22.00 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